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资料丛编之四

巴黎公社



中國人民大學



2 024 9143 7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资料彙編之四

巴 黎 公 社

中国人民大学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編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1 9 5 7 年 · 北 京

巴黎公社

中国人民大学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編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印刷

(北京西便門大街25號)

*

1957年8月第1版

1957年8月第1次印刷

1809—Ⅱ · 787 × 1092 1/32 · 5 $\frac{3}{4}$ 印張 · 117,000字

1—1764(1732+32)册

定价(7):0.48元

几 点 說 明

- 一、这套“彙編”是为配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課程的教学，根据我們自己草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綱目(草稿)編輯的，按照历史順序和專題分册出版。
- 二、这套“彙編”中的每一本書均分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資料索引”，这是我們可能搜集到的資料；第二部分是“資料选印”，这是“索引”中一些不常見的但又是重要的或有参考价值的資料。
- 三、凡是选印的資料，在“資料索引”中都沒有注明出处；“索引”中同一种書出現几次者，只在第一次出現时注明出处与出版時間。
- 四、資料搜集的範圍，基本上以本室所藏为限，从数量上和質量上說都是很不够的，有待以后补充；在編輯上也难免有錯誤或不妥之处，均希讀者給以帮助和指正。
- 五、这套“彙編”中所收集的資料不一定是正确的、可靠的，其中某些作者的政治立場，不一定是革命的、进步的，希讀者使用时注意。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

1957年5月

目 录

資料索引	1—6
資料選印	7—161
公社的性質	馬克思 7
1870——1872年馬克思与恩格斯演說的記錄	17
对“公社史”一頁的意見	恩格斯 20
致1881年3月21日為紀念巴黎公社周年而 舉行的斯拉夫人的群众大会	馬克思、恩格斯 24
紀念巴黎公社20周年	恩格斯 26
紀念巴黎公社21周年	恩格斯 28
為紀念巴黎公社23周年致法国工人党民族 委員會的信	恩格斯 30
閱讀公社材料的提綱	列 宁 31
“巴黎公社与民主專政的任务”一文的結語	列 宁 35
公社的教訓	列 宁 36
紀念公社	列 宁 40
巴黎公社70周年	季米特洛夫 45
巴黎公社的綱領性文件	53
1871年的巴黎“康妙恩”	李大釗 59
巴黎公社	柯柏年 69
論巴黎公社	雅洛斯拉夫斯基 78
公社时期的巴黎工人	阿·莫洛克 88

从孤單的独唱到雄偉的合奏	濼 棋	136
——紀念巴黎公社73周年		
1871年巴黎公社司法委员会	A. T. 巴热諾夫	148
“法蘭西內战”	大百科全書选譯	158

資料索引

“公社的性質”，馬克思著。

“法蘭西內戰”，馬克思著，載“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1卷，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社1954年中文版，第425—525頁。

(人民出版社的單行本中有編輯部的注釋可參考。)

“致顧格曼論巴黎公社的兩封信”，馬克思著，載同上書，第2卷，第463—465頁。

(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法蘭西內戰”一書中有此兩信及其注釋。)

“對‘公社史’一頁的意見”，恩格斯著。

“1870—1872年馬克思與恩格斯演說的記錄”。

“致1881年3月21日為紀念巴黎公社周年而舉行的斯拉夫人的群眾大會”，馬克思、恩格斯著。

“紀念巴黎公社20周年”，恩格斯著。

“紀念巴黎公社21周年”，恩格斯著。

“為紀念巴黎公社23周年致法國工人黨民族委員會的信”，恩格斯著。

“閱讀公社材料的提綱”，列寧著。

“‘巴黎公社與民主專政的任務’一文的結語”，列寧著。

“列寧在‘馬克思致顧格曼書信集’俄譯本序文中論巴黎公社”，載“法蘭西內戰”，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13—119頁。

“公社的教訓”，列寧著。

“紀念公社”，列寧著。

- “論巴黎公社的政權性質”(“論兩個政權并存的局面”前几段),
載“列寧文選”兩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3—
24頁。
- “1871年巴黎公社的經驗。馬克思的分析。恩格斯的補充解釋”
 (“國家與革命”一文的第3、4章),載同上書,第190—231頁。
- “列寧在‘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一文中論巴黎公社”(該
文的前兩題與附錄二),載同上書,第427—444,513—520頁。
- “論巴黎公社的歷史意義”,載“列寧文集”,第6冊(“在共產國
際第一次代表大會上關於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的
提綱與報告”一文的第5、6、19條),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
第188—189,196頁。
- “關於巴黎公社的無產階級專政”,載“斯大林全集”,第1卷(“無
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一文第3章的一部分),人民出版社
1953年版,第333—336頁。
- “倍倍爾對巴黎公社的態度”,載“倍倍爾自傳”(第18章第2節),
三聯書店1956年版,第187—192頁。
- “巴黎公社70周年”,季米特洛夫著。
- “巴黎公社的綱領性文件”(三件)。
-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巴黎公社”,江宗植輯,載“歷史教
學”1955年2月號,第15—20頁。
- “巴黎公社”,蘇聯大百科全書選譯,三聯書店1956年版,第1—13
頁。
- “馬克思在巴黎公社時期”,載梅林:“馬克思傳”(第14章第3、4
節),三聯書店1956年版,第493—506頁。
- “恩格斯在第一國際和巴黎公社時期”,載斯捷潘諾娃:“恩格斯
傳”(第7章),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31—167頁。

“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载苏联科学院历史院编“近代史教程”，第3分册（第1篇），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第1—65页。

“普法战争与巴黎公社”，载赫伏斯托夫等：“近代世界史”，下册（第1、2章），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版，第1—25页。

“普法战争与巴黎公社”，载赫伏斯托夫主编“近代世界史教学法”，下册（第1、2章），人民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第11—35页。

（对公社中几个出色的活动家有简略介绍。）

“巴黎公社”，尼基甫洛夫著，载“世界通史讲义”，中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第157—168页。

“巴黎公社经验的理论总结”，载亚历山大洛夫主编“新编‘哲学史’”（第5章第2节），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95—103页。

“1871年的巴黎‘康妙恩’”，李大钊著。

“纪念巴黎公社”，吴克坚著，载“群众”，第1卷，第14期，1938年3月，第243—244页。

“巴黎公社”，柯柏年著。

“纪念巴黎公社72周年”（社论），载“群众”，第8卷，第5期，1943年3月，第111页。

“论巴黎公社”，雅洛斯拉夫斯基著。

“巴黎公社的事业是不朽的”，杭特日著，载“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1951年4月中文版，第85期，第15—16页。

“纪念巴黎公社80周年”，张子凡著，载1951年3月18日“人民日报”。

“巴黎公社的原则一次又一次地胜利了”（纪念巴黎公社84周年），熊锡元著，载“政法研究”，1955年第2期。

“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和教训”，马赛译，载“群众”，第4卷，第8期，1940年3月，第209—210页。

- “历史底教训”(在反法西斯侵略战争下纪念公社),徐冰著,载“群众”,第7卷,第5期,1942年3月,第94—95页。
- “从‘巴黎公社’看法国底明天”,李溥著,载“群众”,第9卷,第6期,1944年3月,第246—249页。
- “法蘭西的复活”(纪念巴黎公社73周年),淳耀著,载“群众”,第9卷,第6期,1944年3月,第255—258页。
- “巴黎公社底国际意义”,莫最烈夫斯基著,载1952年1月4日“大公报”;“世界通史参考资料”,第2辑,近代史部分,中国人民大学版,第94—102页。
- “巴黎公社对德国社会民主运动的影响(1871—1872年)”,阿列克谢耶夫一波波夫著,载“史学译丛”,1954年第2期。
- “第一国际与巴黎公社”,载舍斯达柯夫:“苏联历史讲话”,生活书店1939年版,第155—160页。
- “第一国际与巴黎公社”,李纯武著,载“历史教学”,1956年11号,第22—24页。
- “马克思与巴黎公社”,高放著,载“新建设”,1953年5月号,第16—20页。
- “马克思论巴黎公社”,杜昆著,载1955年3月18日“光明日报”。
- “斯大林与巴黎公社”,莫洛克著,载1953年3月18—20日“大公报”;“世界通史参考资料”,第2辑,近代史部分,中国人民大学版,第71—93页。
- “公社时期的巴黎工人”,阿·莫洛克著。
- “怎样在‘1871年巴黎公社’一课中阐明人民群众的決定作用”,莫洛克著,载“历史教学”,1956年2月号。
- “从孤单的独唱到雄偉的合奏”(纪念巴黎公社73周年),蘆蕪著。
- “1871年巴黎公社司法委员会”,A·T·巴热諾夫著。
-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奠基者论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关助夏著,

- 載“新史學通訊”，1955年第7號。
- “巴黎公社失敗的原因”(對關助夏同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奠基者論巴黎公社失敗的原因”一文的商榷)，徐泰來著，載“人文科學學報”，東北人民大學印，1956年第2期。
- “從巴黎公社說到鎮壓反革命”，高放著，載“新建設”，第4卷，第3期。
- “從巴黎公社與十月革命的歷史吸取鎮壓反革命的經驗教訓”，高放著，載“科學集刊”，第2集，中國人民大學版，第55—70頁。
- “法蘭西內戰”，蘇聯大百科全書選譯。
- “論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勞辛著，載“新中華”，第13卷，第6期，1950年3月16日，第28—30頁。
- “巴黎公社”，林壽晉著，載“歷史教學”，1953年2月號，第25—28頁。
- “有關巴黎公社的一些問題”(及補正)，喜變高著，載“歷史教學”，1953年10月號，第36—38頁；12月號，第17頁。
- “巴黎公社的故事”，柯柏年著，載1943年3月18日“解放日報”。
- “普法戰爭中法德兩國工人的反戰鬥爭”，江宗植著，載“歷史教學”，1956年第11號，第28—29頁。
- “巴黎公社革命”，載平心：“各國革命史講話”，光明書局1946年版，第120—127頁。
- “普法戰爭與巴黎公社”，載周慶基：“新編世界史”，下冊(第10篇第1章)，自由出版社1953年版，第166—171頁。
- “普法戰爭與巴黎公社”，載焦敏之：“近代國際政治史”(第16章)，上海棠棣出版社1948年版，第373—388頁。
- “巴黎公社”，載朱新繁：“社會革命之思想與運動的發展”，上海聯合書店1930年版，第332—347頁。

- “巴黎公社”，江常師譯，載“歐洲近百年革命運動史”，亞東圖書館1933年版，第116—127頁。
- “历史上的第一次無產階級革命——巴黎公盟”，任卓宣著，載“新青年”，第5號，1926年7月25日，第1—6頁。
- “第一次無產階級革命——巴黎公盟”，趙麟著，載“嚮導”週報，第192期，1927年3月，第2079—2082頁。
- “巴黎公社”，載李季：“馬克思傳”，下冊，神州國光社1949年版，第161—201頁。
- “巴黎公社”，載高希聖：“社會運動全史”，上冊，社會經濟學會1936年版，第1—20頁。
- “法國1870年革命”，載王純一：“西洋史要”，上海南強書局1936年版，第397—421頁。
- “巴黎公社”，載沙比羅：“歐洲近代現代史”，世界書局1933年版，第352—354頁。
- “巴黎公社”，載卡爾第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及無政府主義”，下冊（第18講第4節中的一部分），新生命書局1930年版，第341—351頁。
- “普法戰爭與巴黎公社”，載有賀長雄：“歐美19世紀外交史”（第9—15章），北京新社會月刊，1920年版，第72—230頁。

【附注】索引中有些標題是我們加的或改的。——編者。

資 料 选 印

公 社 的 性 質

——“法蘭西內战”第一次草稿的一部分

馬 克 思

今年3月为馬克思逝世70周年，又为巴黎公社紀念月，法国“社会出版社”正在編印新版的“法蘭西內战”，不久可望出版。新版的“法蘭西內战”除了原有內容外，还增添了下列三种資料：一、馬克思逐日彙編的英、法报纸上关于公社消息的摘录；二、馬克思的第一次草稿；三、馬克思的第二次草稿。这两次草稿的基本思想与定稿相同，但草稿中有些論点也發揮得很詳尽。法国“新批評”月刊編輯部特征得“社会出版社”的同意，把第一次草稿的一部分先發表于本年“新批評”3月号，标题为“公社的性質”。据“新批評”編者的說明，1934年莫斯科出版的“馬恩文庫”曾刊过以上三种資料，但以后任何国家均未發表过，在我国也还没有見到譯文，特为譯出，以供讀者研究。如譯文有誤，希讀者多多指正。

——譯 者

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就是說以它复杂的、具有广大权力的軍事、官僚、僧侶和司法等机构，像纏繞人的蟒蛇一样，把社会有机体捆得紧紧(包圍起来)的。这种国家机器在君主專制时代即

已形成，它是作为新兴的近代社会在封建制度下求得解放的一种斗争武器的。中世纪贵族、城市与僧侣的封建特权变成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的属从品。这个统一的国家政权以雇佣的国家官吏来替代封建的达官贵人，它把中世纪地主贵族与城市行会的僕从手中的武器夺下来，转交给一支常备军，它用那具有系统和等级分工的国家政权的严密组织系统，来替代经常冲突不已的中世纪列强扰攘攘攘的（五光十色的）无政府状态。因此，负有建立民族统一（即建立民族国家）任务的第一次法兰西革命，就得把一切领土的、城市的和省分的地方性自治摧毁掉。第一次法兰西革命既然继续君主专制所已进行的事業，势须进一步加强国家政权的集中化和组织化，扩大其范围和职权，增多其机构，增强其独立性及其对现实社会的超自然的控制（这种控制事实上替代了中世纪超自然的神权）。任何由社会集团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的个别的少数人的利益与社会本身就此分了家，而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借口下，成为与社会不相干且与社会对立的利益。而国家利益至上，那是安置在恰如其份的各级职权上的国家政权拥护者所极力维护的东西。

这个移植于社会身上的寄生“赘瘤”，自以为是社会理想的反响，在拿破仑第一统治时代是达到了全面的发展。复辟与七月王朝只是对于这个寄生的赘瘤加上一个更扩大的分工而已。随着社会内部的分工产生出新的牟利集团，从而给予国家干涉以更多的借口，这种分工就更形发达。法兰西议会制度共和国和整个欧洲大陆各国的政府在反对1848年革命的斗争中，不得不采取镇压人民运动的各种措施，以加强这种政权的活动和集中化。因此，一切革命的结果，只是改进了国家机器，而不是摒棄了这个窒息的恶魔。统治阶级的各党各派轮流着争逐优势，都把占有、（控制）、（监督）和领导这庞大的政府机器视为主要的战利

品。这个政府机器的主要职责是在建立庞大的常备军，制造大批国家寄生虫的你争我夺的场面，造成巨额的国债。在君主专制时代，它是近代社会反封建的斗争工具，这个斗争在法兰西革命中是有成就的。但到了拿破仑第一时代，它不仅被用来压制革命，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而且成为法兰西革命用以对外攻击的一种工具，为了法国利益，或多或少依照法国样式在大陆上创建了一些国家，以替代封建王国。而在复辟和七月王朝时代，它不仅成为资产阶级实行阶级暴力统治的工具，而且由于保证了资产阶级家族可以从国家方面获得高额薪金，在直接的经济剥削以外，形成对人民剥削的第二个手段。最后，在1848年革命斗争时代，它成为扑灭革命与扼杀人民群众对于解放的要求的工具。但是，这个寄生国家只是到了第二帝国时代，才发展到顶峰。政府权力由于它的常备军、强大的官僚制度、愚民的教会和奴性的司法系统，变成与社会本身如此不相干的东西，以致任何一个庸俗的冒险家率领了一伙贪婪的冒险家就可以执行政权了。这一政权已无需乎用旧时的欧洲武装同盟，来反对1789年革命所创立的近代世界，借以证明它的存在是合理的了。这一政权已不再当作一个服从于议会制度内阁的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出现了。这一政权在它的权力下，甚至连统治阶级的利益也损害到，它把它自己挑选的立法团体及用钱收买的参议院来代替那作为统治阶级的装饰品的议会。它从普选中获得了对它绝对权威的认可。有些人宣称，国家政权是维持“秩序”所不可缺少的东西，这就是说，为维持地主和资本家对生产者的统治所不可缺少的东西。它用伪装的破旧外衣来掩盖这个最肮脏的寄生阶层，即诈骗的财阀们今日的极端贪污行为和他们的胜利。它听凭过去的一切反动势力任意猖獗。这个政权是藏奸纳污的巢窟，等它到了第二帝国时代，也便到了它的最后并且是最高表现了。表面上

它好像是政府权力对于社会已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而实际上却是，这社会里的一切腐化分子得以恣所欲为。在粗浅的观察家看来，好像这是行政权战胜了立法权，好像是自以为超社会政权的阶级统治形式战胜了自以为社会自治的阶级统治形式。但实际上，这只是这个阶级统治最后的、堕落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它对统治阶级本身、和处在他羈絆下的工人阶级是同样有害的。

9月4日的行动仅是要求恢复共和国、反对扼杀共和国的下流冒险家的表现而已，而公社是真正与帝国相反的，即是说与国家政权、集权行政（第二帝国只是集权行政的确定形式）相反的。其实，这个国家政权就是资产阶级的产物，它最初作为一个粉碎封建制度的工具，继而作为压制生产者——工人阶级要求解放的工具。一切反动和革命，只是用来把这一有组织的政权，从这一只手转移到那一只手，从这一派统治阶级转移到那一派统治阶级而已。而这一有组织的政权，只是将劳工羈留于奴役状态的有组织的力量。它对统治阶级说来是奴役和牟利的一种手段。它在每一次新的变动中吸取了新的力量，当劳动阶级进行了战斗，并接受了命令把这个政权从这一压迫者集团转移到另一压迫者集团之后，这个政权却被用来粉碎一切人民起义、压制劳动阶级了。而公社，它不是一个反对这一种或那一种政权形式（正統的、宪法的、共和的或帝国的）的革命，而是一个反对国家本身——这个社会的超自然的先天不足的嬰兒——的革命。这是人民把他們自己的社会生活夺回来为人民服务的行动，这不是为了要把这政权从这一派统治阶级转移给那一派统治阶级而进行的革命，而是为了要粉碎这个阶级统治的凶惡机器本身而进行的革命。这不是阶级统治中行政形式和议会形式之間所进行的無聊的斗争，而是对这两种形式都加以否定的革命，因为这两种形式根本糾纏不清，而议会即是行政用来欺騙人民的附屬

品。第二帝国是篡夺国家的完成的形式，公社对它是明显的否定，从而它是19世纪社会革命的开端。公社不论在巴黎的命运如何，它定将遍及世界。公社好像是一个具有魔术的力量，足以解除痛苦的名词，它立刻受到了欧美工人阶级的欢呼。相形之下，普鲁士征服者往年的光荣和行动仅是过时的浮云而已。

唯有工人阶级才能够用“公社”这名词来提出这个新的要求，并以巴黎公社的斗争来实现这个新的要求。第二帝国所体现的政权形式，这一政权的最后形式，尽管有辱统治阶级的体面，尽管它把统治阶级议会自行治理的妄想抛在一边，它仍只是阶级统治最后可能的形式。尽管在政治上它剥夺了统治阶级的地位，而在经济上、社会事务上，他们政体所带来的丑恶行为仍得以恣意猖獗。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经济生活条件的限制，是不可能发动一个新的革命的，他们或是跟着统治阶级走，或是追随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曾是第二帝国消极的经济基础，一个与社会分离的、不相干的国家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获得它的胜利的。无产者受到新的社会任务的鼓舞，这个任务即是他们对全人类负有的任务，亦即是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统治的任务。惟有他们才能够粉碎阶级统治的工具，即国家，才能够粉碎这个集权的和有组织的政权，而后者靠了篡夺手段，成为社会的主人而不为社会服务。第二帝国就是在统治阶级积极进行反无产者的斗争中，而在农民阶级消极容忍下所产生的，第二帝国是中世纪教会的替身——国家最大的成功，同时也是国家最显著的娼妓行为。第二帝国是为了反对无产者而产生的，是为无产者所摧毁的。所以摧毁它，并不是因为它是政权的某种特殊形式（中央集权），而是因为它~~是~~政权中最强大的现实，尽管表面上这个政权与社会没有任何联系，而是因为它也是政权中最娼妓化的现实，自上至下充满了丑恶行为，对内极端贪污、对外极端昏

庸。

但这种階級統治形式直到行政權、即國家機器成為革命進攻唯一的、主要的對象時，就告崩潰了。

議會制度在法國已經到达了它的終點。它的最後時代、極盛時代是1848年5月到政變這一階段的議會共和國時代。而扼殺議會制度的帝國正是議會制度自身的產物。帝國時代的議會制度，雖設有立法會議和參議院——普魯士和奧地利的軍事王國亦以同樣形式加以翻版——那只是一幕滑稽劇，只是最橫暴的專制制度的附屬品而已。議會制度在法國是壽終正寢了，工人階級的革命一定不會把議會制度從灰燼里起死回生的。

公社意味着社會重行掌握國家政權，國家政權從此成為社會的生命力，而不再成為統治社會、駕馭社會的力量。這意味着人民群眾自己起來奪回了國家政權，人民群眾以自己的力量替代壓迫他們的有組織的力量。公社是人民群眾獲得社會解放的政治形式，這一政治形式替代了服務於人民群眾的敵人、用以壓迫人民群眾的人為力量。（已為人民群眾的壓迫者所竊奪，原為人民大眾自己的力量竟被用來反對和打擊他們。）這種政治形式顯而易見，正如一切大事物一樣。在過去一切革命中，歷史發展所需的時間總是虛擲，甚至在人民勝利之日，每次當人民放下了勝利的武器，這些武器就回過頭來反對人民了。公社則一反過去革命的習慣，以武裝的人民來替代軍隊。“自9月4日以來，共和國空前第一次從敵人的政府中解放出來……共和國替本國公民建立保衛公民、反對權力（政府）的武裝的人民，而不再^是保衛政府、反對公民的常備軍。”（3月22日中央委員會宣言）（只要在全國規模內着手組織這種武裝的人民，就可根絕常備軍，這是一切社會進步必不可少的第一個經濟條件；人民的武裝組織立刻杜絕了捐稅和公債的根源，也杜絕了階級統治篡奪政府的經常危險——

不管是一般形式的階級統治，或是自称拯救各階級的冒險家的統治。)人民的武裝組織同時也是抵禦外國侵略者的最可靠的保證，而這在其他各國是辦不到的，因為他們須有一個糜費的軍事機器。取消常備軍可使農民免納苛稅，而且農民從此不再成為一切國家捐稅和一切公債最豐富的泉源了。僅就這一點來說，公社對農民已是一個大希望，“公社”就是農民解放的第一個口號。何況，它還取消了“獨立警察”，並以公社勤務員來代替這班壞蛋。普選截至現在一直被任意濫用着，它不是被當作神聖的國家政權的認可議會的工具有，就是落在統治階級的手中成為它的玩物；而普選對於人民只是每隔一個或長或短的時期、用來認可議會制的階級統治(選擇此種統治的工具)一次而已。而現在這一普選已導向其真正的目標，由各公社選出它們自己的行政和立法的公務員。這實在造成了一個錯覺，就是：行政和政府故弄玄虛地把高級職務說成只能交給一批國家的老于此道的寄生蟲、享受高俸厚祿的騙子、教士來掌握，使這班人得以竊據高位，僧占群眾的智慧轉以對付下層的群眾。然而，公社完全擺脫了政治上的等級制，而把隨時可以罷免的勤務員來替代騎在人民頭上的達官貴人，以真正的負責制來替代虛幻的負責制，因為這些受委託的人是經常處在人民監察下進行工作的。他們所獲的報酬只相當於一個熟練工人的收入，每月12鎊。最高薪資每年也不超過240鎊，據一位科學界權威赫胥黎教授的估計，亦只略高於倫敦教育委員會一位雇員的工資的五分之一。所有國家的神秘、自說自話等一套花樣都被公社揭穿了。公社主要是由普通的工人所組成，它組織了巴黎的保衛工作，對波拿巴特的禁衛軍作戰，保證了這巨大城市的糧食供應，擔負起原先由政府、警察廳與縣府所分別擔任的一切職務；在最艱苦、最複雜的環境下，公開地、明快地進行了它的工作；它好像米爾頓寫他的“失樂園”一

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工作，并不自以为是，不埋头在文牘主义的官僚制度中，不以承認自己的錯誤为耻而勇于改正錯誤，而所得报酬只是几鎊。公社同时执行着一切职务——軍事、行政管理、政治，把职务作为真正的工人职务，使这些职务不再成为一个專業階層的秘密專利品。（在內战和革命的紊乱情况下維持秩序），（采取全面恢复的措施）。公社的每一件措施固然都值得贊許，但公社最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公社本身的組織形式，它一面要对付外国敌人，一面又要对付階級敌人。公社以它的存在表现了它的活力，以它的行动証实了它的理論。它的出現，就是对征服法国胜利者的一个胜利。瀕于淪陷的巴黎以大無畏的气魄重新起来领导欧洲，但这并不是依靠暴力，而是靠了它一行当先地充当社会运动的先鋒，并使各国工人階級的願望成为现实。

如果所有大城市都以巴黎为榜样組織起公社来，則任何政府均將不能出其不意，以突然的反动行动来鎮压这个运动。而这些准备的措施，可以贏得培养实力的時間，而这是运动發展的保証。全法国均將組成公社，自决自治，人民的武裝將替代了常备軍，国家寄生虫队伍將被排除，教师將替代了僧侶制度，国家司法要改为公社机构；全国代表的选举也不再成为强有力的政府耍花样的借口，而成为各个組織起来的公社有計劃的表现；国家的职责將精简为几个符合于普遍性、全国性目的的职务。

公社就是如此。它就是社会解放，就是把劳动从壟断生产工具的那批人的篡夺（奴役）下解放出来的政治形式，而劳动工具是劳动人民自己創造的或自然所賜予的。正如国家机器与議會制并不構成統治階級的真正生命，而只是他們統治的一般机构、旧秩序的政治保証、形式和表现一样，公社也不是工人階級的社会运动，从而也不是全人类复兴的运动，而仅是工人階級行动的

有机的工具。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通过阶级斗争努力消灭一切阶级，从而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因为公社并不是代表某个特殊利益；公社意味着“劳动”的解放，而“劳动”解放是一切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的和自然的条件；惟有巧取豪夺以及欺騙詭詐等行为，才允许少数人侵犯多数人的此项劳动解放），但公社创造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可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来进行。公社可能是激烈反动的一个起点，也可能是激烈革命的起点。公社以肃清国家寄生虫不生产的和作恶的事业开始它的劳动解放（这是它的伟大目标）：一方面它拔除了把国家收入很大一部分供养国家恶魔的祸根，另一方面它以工人工资的待遇进行着地方性和全国性行政的实际事业。由此可见，公社一开始即在改革经济和改革政治方面进行了大规模的节约。

等到公社组织在全国范围内牢固地建立起来之后，它可能遭遇的灾难只是旧奴隶主们分散的暴动。这些暴动尽管暂时能阻挠和平进步的事业，但结果只是给社会革命增强武装，从而加速运动的发展。

工人阶级知道他们须经历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段。工人阶级知道以自由联合的劳动条件来替代劳动被奴役的经济条件，须经过相当时间才能实现。工人阶级必须进行的经济改造，不仅是生产品分配的改造，而且是新的生产组织的改造，即是就目前劳动组织中已经存在着的生产分配和生产组织（近代工业所产生的）上，去掉奴役关系，去掉原有的阶级性，最后，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实现这些形式的和谐合作。工人阶级知道这个复兴事业将不断由于传统利益和阶级自私的反抗而受到束缚和延迟其进展。工人阶级知道：经过了新条件发展的长远过程之后，目前“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自然法则之自发行为”只

能被“自由联合劳动的社会经济法则之自发行为”来替代，正如过去的“奴隶经济法则的自发行为”和“农奴经济法则的自发行为”都被替代了一样。但工人阶级同时也知道：靠了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目前就有迈步前进的可能，而为了工人阶级自己和为了人类，开始这一运动的时间已经到来了。

（译自法国“新批评”月刊，1953年9月第44期，凌其翰译，赵少侯，孙源校）

（选自“新建设”，1953年7月号）

1870——1872年馬克思与 恩格斯演說的記錄

【关于巴黎公社的报导】

恩格斯公民描述了巴黎的事件情况。他說，塞拉耶已經提到的这个星期內收到的从巴黎的来信說明了以前不清楚的事情。造成了一种印象，仿佛一些人突然地夺取和掌握了若干門大炮。整个报界和所有的記者都異口同声地断言，应当采用武力来反对这些人，但法国政府迟疑不决，期待良机。从我們的巴黎委员会获得的情报說明，国民衛軍为制造这些大炮出了錢，于是打算把它們留归自己。在选举后他們明白了，选出来的議会有那样的成分，共和国决不是处在危險之中。后来普魯士軍进入了巴黎，大炮就被移往城的另一部分，使它們处在普魯士軍火力之外。此后政府就表示占有这些大炮的意图，并企圖从国民衛軍手中繼去。奥列尔·德·巴拉丁被任命为国民衛軍总司令和警察总监^①。在拿破侖当权时，他是宪兵長和僧侶的信徒。按照奥尔良的主教杜邦的吩咐，他在他的軍隊与德軍作战失利的时候到教堂做了5个鐘头的祈禱。这一切使政府的意图昭然若揭。

于是国民衛軍就准备抵抗了。260个营里面的215个营官兵一同組織了中央委员会。每連选举一个代表，由代表組成区或街

^① 在1871年3月28日举行的下一次會議上恩格斯声明，在3月21日他的演說記錄中有一个錯誤：被任命为警察总监的不是奥列尔·德·巴拉丁，而是瓦連登。
——俄文版編者。

坊的地方委员会，再由它們选举中央委员会。

20个区只有5个区沒有选举代表。当議會迁往凡尔赛后，政府企圖肅清巴黎的革命者并繳去他們的大炮。准备利用剛剛到达巴黎的由維魯阿指揮的軍隊，1851年国家政变时兵士們就是在他的命令下在街道上向民众开槍的。軍隊在拂曉时取得了局部的胜利，但是当国民衛軍發現了所發生的事情，就来夺回了大炮，而兵士們則和人民联欢了。城市現在在人民手中；沒有走到人民方面来的軍隊被調回馬賽，議會不知道如何是好。中央委员会委員沒有一个是有名的人——其中沒有菲立克斯·皮埃^①以及类似他的人，——但他們在工人階級中却是人所共知的。委员会中有4个国际會員。

公社將在最近一天选出。宣布应当遵守出版自由，但不是对于腐朽的波拿巴主义报刊的自由。通过了的決議中最重要的決議說明，应当遵守和平的先决条件。普魯士軍还离得很近，如果能使它們站在斗争的旁边，胜利的机会就会增加。

【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演說】

馬克思公民說，他因生病而不能完成他答应写好的宣言^②，但他希望能在下星期二写成。他在談到巴黎的斗争的問題时說：“他担心結局已經临近，但如果公社將被击潰，只是使斗争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則將永生不灭；只要工人階級尚未达到解放，这些原則將一再大声疾呼。巴黎公社是被借助普魯士軍鎮压下去的，普魯士軍充当了梯也尔的宪兵。俾斯麦、梯也尔和法佛勒商定了消灭巴黎公社的陰謀；俾斯麦在法蘭克福說，梯也尔和法佛

① 皮埃 (Пиз, Феликс, 1810—1889)——法国剧作家和政治活动家，1848年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的参加者。表现在皮埃的政治活动与创作中的小资产阶级局限性曾受到馬克思的坚决批評。——譯者。

② 指“1871年法蘭西内战”。——俄文版編者。

勒曾請求他这样做。結果表明，为了帮助他們，他准备尽力而为，只要不使德国兵士遭受重大冒險，——这不是因为他珍貴他們的生命，他們的生命并不能使他得到絲毫好处，而是因为他希望这样削弱法国，使他能够榨取更多的东西。他允許梯也尔拥有比協定規定更多的兵士，但允許巴黎只能运入数量有限的粮食。这一切仅是旧历史的重演。上層階級总是联合起来奴役工人階級的。11世紀时，法蘭西和諾曼地騎士們之間發生战争，农民們就举行了起义。騎士們馬上忘却自己的不和而联合起来压制农民运动。为了証明普魯士軍干着警察的事情，可以提到被普魯士軍占領的盧安，5百人被逮捕了，借口是說他們参加了‘国际’。‘国际’使人生畏。在法国国民議會中，饒伯尔伯爵这位于枯殆尽的木乃伊，1834年的大臣，以捍衛反对报刊的措施而聞名的人物發表演說，他說在恢复秩序后政府的第一項責任应当是迫害‘国际’的活动并將其歼灭……”

（黃良平譯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3卷，第2部，第653—656頁）

对“公社史”一頁的意見^①

——1870年10月30日梯也尔先生的休战

恩 格 斯

除非参加9月4日行动的人們極端愚蠢和虛偽透頂，才能把这次休战的消息称为“吉利的消息”。这一消息对普魯士人說来，才真是“吉利的”……

麦茨的投降立刻使6个普魯士軍团(12万人)重新获得行动自由。只有特罗修和法佛勒这样的人才会看不见，在这支新的軍队必不可免地来到法国中心以后，解救巴黎的一切企圖几乎成为不可能了；才会看不见，这不是締結休战協定的时刻，而是作最大軍事努力的时刻。要作最大的軍事努力，一共只剩下15天功夫；但这是極其宝贵的15天，这是战争中的紧急关头。

情况是这样的。

为了实现对巴黎的封鎖，德軍必須动用除3个步兵师以外的一切軍队。他們已經沒有任何后备軍了，因为这3个师在占領了奥尔良和沙朗以后，由于受到罗亞尔^②軍队的牽制而丧失了后备軍的作用。在西方、北方和东方，只有騎兵一支；它要在辽闊的土地上进行偵察和巡邏，但沒有能力守住辽闊的土地来抗击步兵。

到了10月底，包圍巴黎的德軍战綫已經从城市方面很好地

① 參看李察格內著“1871年公社史”，布魯塞尔1876年版，第29頁。

② 法国河名。——譯者。

巩固起来了；但是任何的外部袭击必将使普军也要在曠野措手不及。只要有5万人出现，即使是当时法国所拥有的那种年轻的军队，就能突破封锁并使巴黎和全国恢复联系。但我们认为行动必须迅速，而结果则如下述。

巴黎政府同意休战(10月30日)，休战的时间虽然很短，却给为了封锁进行种种工作和夜間行动而弄得疲憊不堪的德军以喘息的机会。

奥列尔·德·巴拉丁却在11月2日把自己的军队集结在维尔逊，打算调往波桑西，从那里渡过罗亚尔河，并在占领沙托登的普鲁士军(第17师)和占领奥尔良城的巴伐利亚军之间穿越过去。从维尔逊到波桑西的路程约有45公里长，这段路程两天内完全可以走完。但是，如果可以相信德国来源的话(“Militärische Gedanken und Betrachtungen” etc)^①，甘必大^②竟天真地认为，4万人的大军沿着铁路可以开得和一个普通乘客一般快。于是他就命令将军不得越野行进，而把自己的军队沿着铁路从维尔逊调往都尔，再从那里调往波桑西。将军表示抗议；甘必大则一意孤行。罗亚尔军队完成的不是两天的共45公里的越野行军，而是沿着铁路作了180公里的旅行，为时共5天，而且未能漏过敌人视线。一直到7日，这支军队才在波桑西集结准备行动。但已经失去3天宝贵的时间，而敌人则已从这次行军得到警报。

而且那几天又是何等不平常的日子！11月3日是最紧要的一天：整整一个旅的普鲁士骑兵在10支人数众多的志愿部队的追击之下不得不放棄曼特而退往维尔。另一方面，法国各兵种的大量兵力在从庫尔维尔利向沙尔特方面行军中暴露了目标。如果罗

① “军事思想与意见”等。——原编者。

② 甘必大(Гамбетта, Gambetta, 1838——1882)——资产阶级的“第三共和国”的首领。——译者。

西亞軍隊不在車廂中徐緩行進，而在4日實行進攻（這是它完全可以做到的）；如果它在巴伐利亞軍和普魯士第17師之間突破（這是容易完成的）；如果它利用自己在數量上的巨大優勢以各個擊破，然後進軍巴黎，——就可以有把握說，巴黎本可獲得解救的。

即使毛奇[⊖]也遠不是看不見危險的；所以他決意在必要時象拿破侖在孟都亞那樣行動：取消封鎖，犧牲在維利庫布列修筑的圍城炮兵障地，集結軍隊便於在曠野之地行動，僅在勝利後即當麥茨軍隊開來後再重新封鎖。凡爾賽大本營已整裝待發；一切準備就緒，只待套馬了（據在場的瑞士上校戴爾拉所說）。

如果普軍不得已而取消對巴黎的封鎖，就可能引起歐洲的壓力並導至光榮的和平。無論如何，這個事實就會首先對歐洲，然後特別是對法國，最後在反面的意思上對德國人給予巨大的道義上的影響。而這個事實的物質上的後果！巴黎至少就能有15天至20天的功夫從來自南方和西方的各條鐵路儲備糧食，這等於是延長防禦一兩個月。外省的軍隊也可以贏得同樣多的時間來整頓組織，它們就再不必紀律松懈、未經訓練、缺乏裝備、幾乎赤手空拳地去迎擊敵人。為使法國重新獲得勝利的希望，只需要贏得時間；11月3日和4日有了達到這點的機遇；但這個機遇卻被錯過了。

且接着談事件吧。巴黎甚至沒有出擊。一個星期的時間內，從西部迫近巴黎的軍事力量沒有作任何進攻的嘗試。這並不足為奇。這些兵力一定相當軟弱；甘必大授權德克拉特利先生組織西部軍隊的指令是10月22日發出的！

剩下只有羅西亞軍隊了，它於11月7日在波桑西地方整隊。直到9日奧列爾才進擊庫里梅埃的巴伐利亞軍；當巴伐利亞軍眼

⊖ 毛奇 (Moltke, 1800—1891) ——普魯士元帥。——譯者。

見来自沙特拉的普魯士第27师免不了撤退，它們就朝都尔退却，次日即11月10日，这个师与它們会合。奥列尔再也沒有行动了。这时，从麦茨来的6万人的3个軍团以强行軍从塞納逼近了。另外两个普魯士师（第3师和第4师）从麦茨沿铁路行进，已經进抵巴黎。这时毛奇就能够把普魯士第17师开往都尔，第17师于12日到达。于是約35,000人的4个德国师就列陣以对罗西亞軍，罗西亞軍再不使它們惶恐不安了。

而在11月14日大股法軍从德列(Dreux)，由凡尔赛分兩路行軍开往胡頓^①。毛奇在这方面仅握有騎兵，不能进行有力的偵察以發現在这些先遣部队之后是些什么兵力。当天他就打算离开凡尔赛并取消封鎖(勃蘭)。

但这一回决定事情的已不是几天，而是几小时了。从麦茨来的軍团中的第一个(第9)軍团当天抵达封騰布罗，第3軍团应当在16至18日抵达勒慕，而第10軍团于19日应抵达依昂納的苏安尼。毛奇把第17师調往蘭布依，第22师調往沙尔特，巴伐利亞軍調往昂諾(Auneaux)，即由他讓路开往巴黎的罗西亞軍与从西部威胁凡尔赛的軍隊之間的地方。这一次奥列尔本身按兵不动挽救了他。假如他突进他面前的缺口，就会被兩支准备进击他侧翼的德軍击破。11月19日，普魯士第2軍的3支兵团連同其在依昂納的后备占領了封騰布罗和勒慕。11月20日，第1軍在曼特菲里的指揮下集結在瓦索河上从康片到盧昂一綫；麦茨来的軍团从北方和南方保衛巴黎的封鎖綫。取消这个封鎖的最后机会错过了，它是因为特罗修、甘必大、奥列尔而錯过的，他們彼此的錯誤互相加深，真是象普魯士營队的准确行动那样值得夸獎的。

(应震象、黄良平譯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5卷，第360—365頁)

① 恩格斯的手稿中胡頓(Houdan)为胡布朗(Houblon)。——原編者。

致1881年3月21日为紀念巴黎公社周年 而举行的斯拉夫人的羣众大会[⊖]

馬克思、恩格斯

公民們！

我們不得已而極為遺憾地告訴你們，不能夠出席你們的大會了。

当〈約10年前〉巴黎公社在遭到“秩序”的拥护者制造的野蛮屠杀而被镇压时，胜利者决沒有想到，为时尚未10年，在遙远的彼得堡就在發生这样一个事件，它經過斗争〈可能是長期而殘酷的斗争〉后結果必將建立俄国的公社。

他們决沒有想到，包圍巴黎而迫使当权的资产階級去武装人民，从而准备了公社的普魯士国王，他本身过了10年竟被社会主义者圍困在自己的首都，只有宣布自己本国的首都柏林处于戒严状态才能保持自己的王位。

另一方面，大陆上的各国政府在公社复灭后实行迫害，而迫使国际工人协会放棄自己形式上的、外在的組織，这些政府以为能够用各种法令和非常法来摧毁偉大的国际工人运动，它們决沒有想到，10年之后，这个国际工人运动較之以往任何时候都为强大，它席卷了不仅欧洲、而且美洲的工人階級，为爭取共同利

⊖ 被恩格斯删节的重要字句以〈 〉表示。——俄文版編者。

益反对共同敌人的共同斗争把工人们团结在一起，团结为一个新的更广泛的自行产生出来的(spontaneous)国际，它愈来愈超过一切外在的协会形式（这些形式本身既是自行产生出来，又是不具任何形式的）。（本来建立了一个更广泛的国际，它比以前有着委员会组织形式的国际对于现存社会还要危险些）。

总之，旧世界列强认为已被扫除的公社现在是空前地强大，所以我们可以和你们一起高呼：Vive La Commune！（公社万岁！）

（黄良平译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5卷，第552—553页）

紀念巴黎公社20周年

(致“社会党人报”編輯部的信)

男女公民們！

整整20年前，工人巴黎如同一个人一样挺身奋起，反对梯亥尔领导的资产者和乡紳（des ruraux）的罪惡侵犯。無产階級的这些敌人看到巴黎工人为了保衛自己的权利而自行武裝和組織起来，便吓得混身顛抖。梯亥尔企圖夺取他們的武器，而这些武器是他們如此光荣地曾經用来反抗外来侵入、以后又以更大的光荣用来反抗凡尔賽雇佣軍的攻击。为了扑灭起义的巴黎，农民和资产階級央求普魯士人給予帮助，并取得了这种帮助。經過英勇的斗争，巴黎被优势的敵軍击败了，解除了武裝。

巴黎工人已經20年沒有武器了。各地的情况也是如此；在一切文明的大国中，無产階級都丧失了物質的保衛手段。工人階級的敌人和剝削者到处都拥有大量的武裝力量。

但是，結果如何呢？

結果是：在每一个健康的男子都經過參軍鍛煉的今天，这支軍隊开始越来越反映人民的情緒和思想；这支軍隊，这一强大的压迫工具一天天变得更不可靠了。各大国的領導者已經胆战心惊地預見到，掌握武器的战士終有一天会拒絕殘杀自己的父老弟兄。我們曾經在巴黎看到这种情况，当时唐金人胆敢覬覦法蘭西共和国總統的职位；現在我們在柏林看到这种情况，那里俾斯麥的承繼人向国会要求經費，以便通过用金錢收买的士官来加

強軍隊中的服从精神，因为士官中的社会主义者涌现得太多了！

如果类似的現象層出不窮，如果軍隊中也有了曙光的照耀，那就意味着旧世界的末日已近在眉睫了。

願必不可免的事情實現吧！讓走向沒落的資產階級离开政权或死亡吧，無產階級万岁！国际社会革命万岁！

恩格斯（簽署）

3月17日于倫敦

1891年3月25日在“社会党人报”第27期上用法文發表。
（应震象譯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6卷，
第2部，第95—96頁）

紀念巴黎公社21周年

男女公民們！

自从巴黎人民举起紅旗，立即向飄揚在凡尔塞^①的法国三色旗和飄揚在普軍所占領的炮台上的德国三色旗挑战以来，今天已滿21周年了。

紅旗——这是站在消灭了胜利者与被战胜者之間界綫的高地上的巴黎無产階級^②。

公社的高度国际主义性質及其向資产階級沙文主义的一切情緒所作的勇敢挑战，使公社具有偉大的历史意义。各国無产階級並沒有在这里犯錯誤^③。讓資产者去庆祝他們的7月14日或9月22日吧。無产階級的节日到处都是3月18日。

正因为如此，所以卑鄙無耻的資产階級^④在公社的坟墓上撒滿了無耻的誣蔑。正因为如此，所以只有国际工人协会一个組織始終敢于把自己看作是巴黎的武裝起义者，以后又把自己看作是战敗了的無产階級。真的，当公社垮台时，国际也就無法再繼續存在下去。在“打倒公社社員！”的叫囂下，国际就在欧洲各地被推毀了。

① 恩格斯的手稿中是：“在凡尔塞資产者手上飄揚的”。——俄文版編者。

② 手稿中删去“国际無产階級的代表”字样。——俄文版編者。

③ 恩格斯的手稿中是：“各国無产階級很清楚地懂得这一点”。——俄文版編者。

④ 手稿中是：“卑鄙無耻的国际資产階級”。——俄文版編者。

自从蒙馬特尔高地上的大炮再度被夺回以来，今天已是21周年了。1871年出生的孩子，今天已成了成人，由于統治階級的蠢愚，他們当了战士，他們學習使用武器的本領，學習組織工作的艺术，學習手持長槍保衛自身的艺术。被人認為業已槍杀了的公社，被人認為永远复灭了的国际，——它們仍然在我們中間活着，而且比1871年更強大了20倍。几百人的位子由几千人来坐；响应我們号召的，現在已不是几千人，而是几百万人了。过去第一国际只能預見和筹备的全世界無产階級联盟，今天已成了事实。而更重要的是，曾在1871年占領过公社的巴黎近郊炮台的普軍战士的兒子，目前正成千成万地站在最前列上，同巴黎公社社員的兒子并肩作战，为实现工人階級的完全和徹底的解放而斗争。

公社万岁！

国际社会革命万岁！

弗利德里希·恩格斯(签署)

1892年3月17日于倫敦

1892年3月26日在“社会党人报”第70期上用法文發表。
恩格斯的手稿保存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档案內。

(应震象譯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6卷，
第2部，第283—284頁)

为紀念巴黎公社23周年致法国 工人党民族委员会的信

我同你們一起为国际3月18日节日的迅速来临而干杯，这一节日將帶來無产阶级的胜利，將消灭阶级对抗和各民族間的战争，將在各文明国家中实现和平与幸福。

恩格斯(签署)

1894年3月18日于倫敦

1894年3月25日在巴黎“社会党人报”第183期上发表。

(应麟象譯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0卷，第2部，第402頁)

閱讀公社材料的提綱〔1〕[⊖]

列 寧

1. 公社的历史概要。

拿破侖第三統治下的法国。帝国主义的基础；資產階級已經不能，無產階級則还不能〔2〕……

拿破侖第三的冒險主义。表面威風、战争的必要性。

2. 1848年6月后無產階級的成長。1864年的国际工人协会。拿破侖第三对它的迫害。

法国工人(7月12日，巴黎的国际會員，第16頁)和德国工人(7月16日在不倫瑞克举行的工人群众大会，黑姆尼茨城的工人大会，柏林的国际會員，第18頁)对战争的抗議〔3〕。

3. 色当：1870年9月2日和1870年9月4日共和国的宣布。自由派惡棍夺取政权。

自由派律师和双重的保皇党人：梯也尔。

4. 国防政府等于叛国政府。特罗修：防御巴黎的“計劃”。防御的喜劇。巴黎工人的英勇精神。1871年1月28日的投降。

5. 俾斯麦指定8天内召开国民議会的条件(第34頁)以解决战争与和平的問題。梯也尔与保皇党人的陰謀。

地主議院(乡紳會議)。630名議員的波尔多国民議會=30名

⊖ 这个“提綱”另有柯柏年的譯文，名为“关于巴黎公社的講演提綱”，載“解放”杂志，第126期(1941年)。——編者。

波拿巴主义者 + 200 名共和派 (100 名温和的和 100 名激进的) + 400 名保皇党人 (200 名奥尔良党人 + 200 名合法王朝党人)。

梯也尔和法魯的談判。

6. 巴黎的挑畔：任命保皇派的大使；取消国民衛軍兵士的“三十苏”；巴黎的警察总监瓦連登，国民衛軍長官奥列尔·德·巴拉丁等 (特列坡夫和瓦西里契科夫!!) [4]；国民議會迁往凡尔賽；共和派报纸遭到镇压等等。將战争費用轉嫁到穷人身上的企圖 (第35頁)。武裝的巴黎工人和保皇派的議會。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7. 馬克思的警告⊖：1870年9月9日国际总委員會的第二个建議：“不要被1792年的民族傳統迷住”，加强“自己階級的組織”，不要打算推翻政府 (“絕望的蠢举”)；第25頁。国际 (总委員會) 書記叶夫盖尼·杜邦1870年9月7日对法国写的是同样的道理 (Weill, 第134頁) [5]。

8. 最后一次挑畔行动。1871年3月18日国民衛軍的大炮被夺去。梯也尔的騙人的証据。陰謀未遂。国民衛軍中央委員會宣布成立公社。巴黎公社和凡尔賽政府之間的国内战争开始了。

9. 公社中的派別：甲、布朗基主义者。布朗基早在1880年11月在“Ni Dieu ni maitre”⊕上就否認階級斗争的理論和無产階級利益与民族利益之划分。(Weill, 第229頁) (不把工人和革命資產階級分开)。乙、普魯东主义者 (相依論者) “組織交換和信用”。

工人階級的革命本能不管錯誤的理論而發揮出来。

10. 公社的政治措施：

(1) 消灭常备軍。

⊖ 反对在1870年成立了“祖国在危險中”的布朗基。(注意)。

⊕ “既不要上帝也不要老谷”。

(2) 消灭官僚制度：甲、全体官吏經选举产生；乙、薪金不超过6,000法郎。

(3) 教会与国家分离。

〔最近綱領〕

(4) 免費教育。

公社与农民。3个月內一切本来会不同的！（第49——50頁）[⊖]。

公社与“国际”。弗蘭克尔，波蘭人（世界共和国的旗帜）。

11. 公社的經濟措施：

(1) 禁止面包工人打夜工。

(2) 禁止罰款。

(3) 登記关闭了的工厂，移交工人协会，按中央委员会規定給以报酬（第54頁）。

注意！没有接收銀行。没有实行8小时工作日Weill, 第142頁。

(4) 禁止拍卖典当物。推迟付款（房租）。

12. 失敗。組織的缺点。防御的立場。梯也尔和俾斯麦的勾結 { 俾斯麦的作用等于雇佣的凶手 }。1871年5月21——28日流血周。

流血周的慘禍，流放等等。污蔑（第65——66頁）。兒童与妇女……

第487頁：街上被打死的兩万人，死在牢里的3千人等等。軍事法庭：至1875年1月1日为止被判罪的13,700人（內有80名妇女，60名兒童），流放，監禁〔6〕。

13. 教訓：資產階級不惜一切。今天是自由派、激进派、共和派，明天是叛卖，槍杀。

⊖ 揭穿“秘密”：特罗修的勾当，修道院中的“制度”（第54頁）。已經做到的还很少！

無产阶级的独立組織——階級斗争——国内战争。
我們全体在现在的运动中都担负有公社的責任。

[1]“閱讀公社材料的提綱”是列宁于1905年3月5日(18日)在日内瓦为俄国政治流亡者团体作的关于巴黎公社报告的提綱。

[2]恩格斯在給馬克思的“法蘭西内战”写的导言中分析1848年6月起义后法国的局势时写道：“如果說無产阶级还不能管理法国，那末资产阶级却是已經不能管理法国了”(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社1954年中文版，第1卷，第455頁)。

[3]这里和后面列宁是引証1891年在柏林出版的馬克思的“法蘭西内战”一書。

[4]列宁在这里对比了屠杀1871年巴黎公社的劊子手和屠杀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的劊子手。

特列坡夫——彼得堡的总督，他指揮对第一次俄国革命实行镇压。

瓦西里契科夫，公爵——沙皇政府的將軍；1905年1月9日(22日)指揮駐在彼得堡的沙皇政府軍隊槍杀和平示威的工人。

[5]这里和下面列宁引証Weill(威利)：“1852——1902年法国社会运动史”，巴黎1904年版。

[6]公社牺牲者数字引自1896年在巴黎出版的Lissagaray “Histoire de la Commune de 1871”一書(李薩加勒：“1871年公社史”，米赫科夫“鐘声”書店，莫斯科1905年俄文版，第522頁)。

(黃良平譯自“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8卷，
第180—182頁)

“巴黎公社与民主專政的任务”

一文的結語〔1〕

列 宁

这个文件首先教导我們，社会主义無产階級的代表和小資产階級一同参加革命政府，在原則上是完全可以允許的，而在一定条件下則是完全必要的。其次，这个文件向我們說明，公社面临的实际任务首先是实行民主專政，而不是社会主义專政，即执行我們的“最低綱領”。最后，这个文件提醒我們，自己在吸取公社的教訓时，我們不应重蹈它的錯誤（沒有夺取法国銀行，沒有向凡尔賽进攻，沒有明确的綱領等），而是要摹仿那些指出了正确道路的实际成功的步驟。我們要向1871年偉大战士學習的不应当是“公社”的字样，我們不应当盲目地重复他們的每一个口号，而应当明确地提出符合于俄国实况和由下面的話所表达的綱領的和实际的口号：無产階級和农民的革命民主專政。

〔1〕这一篇是为未署名作者的“巴黎公社与民主專政的任务”一文写的結語，上述文章的手稿由列宁作了重要的校訂。文章發表在1905年7月17日（4日）“無产者”报第8期上。第一篇的标题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加的。

（黃良平譯自“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9卷，第120頁）

公社的教訓〔1〕

列 寧

在結束了1848年革命的国家政变之后，法国陷入拿破侖政制的桎梏达18年之久。这个政制不仅使国家在經濟上破产，而且还遭受民族屈辱。起义反对旧政制的無产階級承担了兩項任务——民族的任务和階級的任务：使法国从德国的侵扰下求解放和使工人从資本主义制度下求得社会主义解放。兩項任务这样結合就是公社的最突出的特征。

資产階級当时組成了“国防政府”，于是無产階級就应当在它的領導下来爭取全民族的獨立。其实这是一个“叛国”政府，它認為向巴黎無产階級作斗争是自己的使命。但無产階級并未覺察这点，因为它被爱国主义的幻想弄得眼花缭乱了。爱国主义的思想根源于18世紀的大革命；这个思想使公社的社会主义者向往，例如布朗基这位無可怀疑的革命家和社会主义的热烈拥护者竟認為自己报纸最合适的名称莫过于資产階級的号叫“祖国在危險中！”

結合含有矛盾的任务——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乃是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致命錯誤。早在1870年9月，在国际的宣言中，馬克思就警告过法国無产階級不要迷恋于虛假的民族思想〔2〕：从大革命以来發生了深刻的变化，階級斗争尖銳化了，如果当时向整个欧洲的反动势力作斗争的任务團結了整个革命的民族，那末現在無产階級則已經不能够把自己的利益和敌对階級的利

益結合在一起了；讓資產階級對民族屈辱負責——無產階級的事情是為使勞動從資產階級桎梏下求得社會主義解放而鬥爭。

資產階級的“愛國主義”的真正底細確實很快就暴露出來了。凡爾賽政府與普魯士人締結可恥的和約之後，就着手於自己直接的目的，對它覺得可怕的巴黎無產階級的武裝實行襲擊。工人們以宣布公社和國內戰爭作回答。

雖然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分為許多的宗派，但公社是一個光輝的典型，說明無產階級能夠何等同心協力地實現資產階級只能宣布的民主任務。奪得了政權的無產階級未經過任何特別複雜的立法手續，而切切實實地實行了社會制度的民主化，廢除了官僚制度，實行了官吏由人民選舉產生的制度。

但是兩個錯誤葬送了光輝勝利的果實。無產階級半途而廢；無產階級沒有着手“剝奪剝奪者”，而醉心於在國內樹立由全民族任務結合的最高公正的幻想；銀行等機構未被奪取，普魯東主義者關於“公平交換”等等的理論還在社會主義者中間占統治地位。第2個錯誤——無產階級過於寬大：本應當殲滅自己的敵人，而無產階級卻極力從精神上感化他們，輕視了國內戰爭中純粹軍事行動的意義，沒有向凡爾賽堅決進攻以取得在巴黎的勝利，而是行動遲緩，使凡爾賽政府有時間收羅黑暗勢力來準備五月的流血周。

但儘管有這一切錯誤，公社仍不失為19世紀偉大無產階級運動的偉大典范。馬克思給予公社的歷史意義以很高的評價——如果當凡爾賽匪幫對巴黎無產階級的武裝實行偷襲時工人不戰而聽任解除武裝，那麼，由這種軟弱而給無產階級運動帶來的士氣沮喪的危險意義，就會比工人階級在為捍衛自己武裝而鬥爭中遭受的損失嚴重得多〔3〕。不論公社的犧牲何等巨大，這些犧牲却由公社對於無產階級共同鬥爭的意義所彌補；公社在

歐洲激發了社会主义运动，公社表明了国内战争的力量，公社驅散了爱国主义的錯覺，打破了对资产阶级的全民族意願的天真信任。公社教导欧洲無产阶级具体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無产阶级获得的教訓是永远不会被人忘却的。工人阶级將运用这个經驗，正如在俄国12月起义中已經加以运用了那样。

俄国革命前的准备时期与法国拿破侖統治时期有某些相似的地方。在俄国，專制制度集团也使国家陷入經濟破产和民族屈辱的灾禍。然而革命很久都沒有能够爆發，——当社会發展还没有給群众运动創立条件时，尽管英勇斗争，对政府的零散进攻在革命前的时期碰到人民群众的冷淡而烟消云散。只有社会民主党才以坚持和有計劃的工作教育群众提高到最高的斗争形式——群众性的發动和国内武装战争。

社会民主党能够打破年輕無产阶级身上的“全民族的”和“爱国主义的”迷惑，在社会民主党直接干預下从沙皇手中爭得了10月17日宣言之后，無产阶级就热情奋發地着手准备革命的下一个必不可免的阶段——武装起义。由于無产阶级摆脱了“全民族的”錯覺，就把自己的阶级力量集中在自己的群众性組織——工兵代表苏維埃等的手中。尽管俄国革命面临的目的与任务和1871年法国革命比較有种种不同，俄国無产阶级应当采用巴黎公社开始了的同一种斗争方式——国内战争。俄国無产阶级記取巴黎公社的教訓，他們知道：無产阶级不应輕視和平的斗争工具，这些工具为無阶级的日常利益服务，它們在革命的准备时期是必要的，但是無产阶级一刻也不应忘記，阶级斗争在一定的条件下要采取武装斗争和国内战争的形式；在一定的时刻，無阶级的利益要求在公开的战斗中坚决無情地歼灭敌人。这一点已由法国無产阶级在公社中最初指出，并由俄国無产阶级在12月起义中光輝地証明了。

尽管工人阶级这两次宏伟的起义都遭到了镇压，新的起义必将来到，在新的起义面前成为弱者的将是无产阶级敌人的力量，在新的起义中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必将获得完全胜利。

〔1〕“公社的教训”一文是列宁的报告稿，发表在1908年3月23日“国外报”第2期上。该报编辑部给文章加了如下的按语：“3月18日在日内瓦召开了纪念3个无产阶级事件的国际大会：马克思逝世25周年，1848年3月革命60周年及巴黎公社纪念。列宁同志在大会上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讲话，他谈到了公社的意义”。

〔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13卷，第2部，第99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社中文版，第476页）。

〔3〕关于公社的历史意义的估价（“新社会的先声”），见马克思“法蘭西内战”一书及马克思1871年4月12日和17日致留·库格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社中文版，第469页；第2卷，第463—465页）。

（黄良平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13卷，第437—440页）

紀念公社^①

列 寧

从宣布巴黎公社以来已有40年了。法国無产階級按照已定的習慣举行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来紀念1871年3月18日革命的活动家；5月底無产階級重新向惊心动魄的“5月流血周”的牺牲品、被槍杀的公社社員的陵墓敬献花圈，在他們的墓前再次宣誓，要不懈地斗争，一直到他們的思想完全胜利，他們遺留的事業徹底完成。

为什么無产階級（不仅法国無产階級，而且全世界無产階級）認為巴黎公社的活动家是自己的先驅者呢？公社的遺產何在呢？

公社是自發地产生出来的，誰也未曾有意識和有計劃地准备它。对德战争的失利，被圍的痛苦，無产階級的失業和小資产階級的破产；群众对上層階級和絲毫無能的長官的憤慨，不滿現狀和追求另一种社会制度的工人階級的模糊的激憤情緒；国民議会的令人為共和国命运担忧的反动成分，——这一切和其他許多原因交結在一起，推动巴黎居民举行3月18日的革命，这个革命突然地把政权轉归国民衛軍手中，轉归工人階級和接近他們的小資产階級手中。

这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事件。以前政权总是处在地主和資

① 另有徐冰譯文，見1940年3月出版的“群众”周刊，第4卷第8期，第206—207頁。——編者。

本家手中，即处在他們的組成所謂政府的代理人手中。而在3月18日的革命之后，梯也尔先生的政府連同自己的軍隊、警察和官吏逃出巴黎，这时人民就成了局势的主宰，于是政权就轉归無产階級了。但是在現代社会中，經濟上受資本奴役的無产階級如果不击碎使他受制于資本的鎖鍊，就不能在政治上占統治。因此公社的运动就必然帶上社会主义的色彩，即开始力圖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也就是資本的統治，推毀現代社会制度的基础本身。

开始这个运动是一种成分極其复杂和不固定的运动。参加这个运动的有希望公社恢复对德战争并將其进行到胜利結束的爱国者。支持运动的还有小店主，如果期票和房租的交納不延期，他們就有破产的危險（政府不願給他們延期，而公社却給予了）。最后，在最初一个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同情运动的还有資產階級共和派，他們害怕反动的国民議會（“乡紳會議”，野蛮的地主）会使王朝复辟。但在这个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当然是工人（特別是巴黎手工業者），在第二帝国[⊖]的最后几年，他們中間进行了切实的社会主义宣傳，而且他們中間的許多人甚至参加了国际。

只有工人才始終忠实于公社。資產階級共和派和小資產者很快就和公社决裂了；有的被运动的革命社会主义、無产階級的性質吓坏了；另一些人看見运动必然失敗时就与公社分手了。只有法国無产者才無所畏懼和不知疲倦地支持了自己的政府，只有他們才为了这个政府，即为了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为了全体劳动者的美好未来而战斗和牺牲。

被昨天的同盟者拋棄和無人支持的公社必不可免要遭到失敗。法国的整个資產階級，所有的地主，交易所老板，工厂主，大

[⊖] 第二帝国（1852——70）——拿破侖第三統治的时期。第二帝国在普法战争时1870年9月4日革命的打击下而崩潰。——譯者。

大大小小的賊棍，所有的剝削者都联合起来对付公社。受俾斯麦支持的这个資產階級联合（俾斯麦从德国的俘虜中釋放了十萬名法國兵士來征服革命的巴黎）挑動了愚昧落后的農民和外省的小資產階級來反对巴黎無產階級，并層層包圍了半个巴黎（另一半被德軍包圍）。在法國的某些大城市中（馬賽，里昂，聖·埃特耶，底桑等），工人們也作了夺取政权，宣布公社和拯救巴黎的嘗試，但這些嘗試很快就以失敗而告終。于是第一个举起無產階級起义的巴黎只得自力更生，終于免不了失敗。

胜利的社会革命至少要有两个条件：生产力的高度發展和無產階級的準備成熟。但在1871年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法國資本主义發展还很薄弱，所以法國当时主要是一个小資產階級（手工業者，農民，小店主等）的國家。另一方面，還沒有工人政黨，工人階級还缺乏準備和長期的訓練，大多數工人甚至还不很清楚自己的任务和實現這些任务的方法。既沒有無產階級的嚴肅的政治組織，也沒有廣泛的職工會和合作社……

但公社最缺少的就是熟悉現況和着手實行自己綱領的時間和自由。公社還沒有來得及着手工作，盤踞在凡爾賽的政府就在整個資產階級的支持下对巴黎开始了軍事行动。于是公社首先就不得不考慮到自衛。一直到5月21至28日最后時刻为止，公社都沒有時間認真考慮別的事情。

尽管条件这样不利，尽管公社存在的時間短促，公社却仍然來得及采取了一些足夠說明公社的真正意圖和目的的措施。公社用人民的普遍武裝代替了常備軍这个統治階級手中的盲目工具；公社宣布教會与國家分离，廢除了僧侶的生活費（即國家給神甫的薪俸），使國民教育具有純粹俗世的性質，这就給了身穿袈裟的宪兵以有力的打击。在純粹社会方面，公社只來得及作了不多的事情，但這些不多的事情已足夠明显地表明公社是一个

人民的、工人的政府的性質；禁止面包鋪打夜工；廢除了罰款這種法定的掠奪工人的制度；最後，頒布了有名的法令（指令），規定把一切無人過問或停業的工廠和作坊轉交給工人協作社以恢復生產。好象是為了強調自己真正民主的、無產階級的政府的性質，公社決定行政機關和政府全體官吏的薪金不應高於正常的工人工資，並且決不應超過6,000法郎一年（每月少於200盧布）。

這一切措施足夠明顯說明，公社是對於立足于奴役和剝削之上的舊世界的致命威脅。因此，當巴黎市議會飄揚着無產階級的紅旗時，資產階級社會就不能安然入睡。當有組織的政府力量終於占了組織薄弱的革命力量的上風時，被德軍打得一敗塗地而對付戰敗的同鄉則威風凜凜的波拿巴的將軍們，這班法國的連涅康普夫和麥列爾—查康麥里斯基們^①進行了一次巴黎空前未有的大屠殺。約3萬巴黎人被野獸般的兵士殺死，約4萬5千人被逮捕，其中許多人後來被處死，被流放去作苦工和移民的數以千計。巴黎總共損失了約10萬子弟，包括所有各行業的優秀工人。

資產階級心滿意足了。“社會主義長此休矣！”，資產階級的領袖、嗜血的侏儒梯也爾在他和他的將軍們向巴黎無產階級製造了大流血後這樣說。但這些資產階級的烏鴉的叫喊是徒勞的。公社被鎮壓後過了6年，當公社的許多戰士還在苦役和流放中困苦不堪時，新的工人運動已經在法國開始了。由自己前輩的經驗豐富了閱歷，但絲毫沒有為他們的失敗而意志沮喪的新的社會主義一代，舉起了從公社戰士們手中掉落的旗幟，並在“社會革命萬歲！公社萬歲！”的喊聲中滿懷信心和勇氣百倍地舉着它前進。又過了兩年之後，新的工人政党和它在國內發起的鼓動迫使

^① 連涅康普夫與麥列爾—查康麥里斯基均系沙皇軍隊的將軍，屠殺1905—1907年革命的劊子手。——譯者。

統治階級釋放了尚在政府手中的被俘的公社社員。

不僅法國工人，而且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都在紀念公社的戰士。因為公社不是為某種地方性的或狹隘的民族任務而鬥爭，而是為全體勞動人類、全體被損害和被侮辱的人們的解放而鬥爭。作為社會革命的先進戰士，公社在凡是無產階級遭受痛苦和進行鬥爭的地方都博得同情。公社存亡的情景，在兩個多月的時間奪取和保持了世界上的一個首都的工人政府的面貌，無產階級英勇鬥爭的場面及其在失敗後的苦難，——這一切都鼓舞千百萬工人的精神，激起他們的希望並吸引他們對社會主義的同情。巴黎的炮聲驚醒了無產階級中酣睡的最落後的階層，到處推動革命社會主義宣傳的加強。因此公社的事業並沒有滅亡；這個事業至今活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

公社的事業是社會革命的事業，是勞動人民求政治經濟的完全解放的事業，是全世界無產階級的事業。在這個意義上公社的事業是永垂不朽的。

（黃良平譯自“列寧全集”，俄文第4版，第17卷，第111—115頁）

巴黎公社 70 周年

——1941年3月

季米特洛夫

70年前——1871年3月18日——巴黎革命群众的战斗呼声：
公社万岁！震动了法蘭西与欧洲。

巴黎的無产階級以無限的英勇与自我牺牲为神聖的巴黎公社与国内外的强大敌人斗争了兩個多月。巴黎公社社員用他們的鮮血，在工人階級解放斗争的历史上，添上了最光荣最輝煌的一頁。

巴黎公社是工人階級为自己爭取政治权力，創設自己政府，建立無产階級專政的第一次严肃的企圖。

巴黎公社是新型無产階級国家的雛形；它是苏維埃的原型。

巴黎公社表現了国际無产階級的利益及其最殷切的希望，并成为無产階級国际主义的旗帜。

巴黎公社是群众自己的作品，是他們富于創造的积极性和他們的革命热忱的果实。

巴黎公社是对于法国資产階級叛变1871年的战争，对于資产階級陰謀消灭共和国恢复君主制度之义憤的汹涌爆發。它是对于資产階級地主的反动，企圖解除巴黎工人武装，粉碎法国人民，并迫使他們負担拿破侖第三的失敗冒險战争的費用，偿还苛重的賠款之直接答复。

改組后的国民軍中央委员会在其3月18日的宣言中写道：

“巴黎的無产階級在統治階級的失敗和叛變中了解到他們把公共事務的管理拿到自己手里頭以挽回局勢的時候已經到了。……他們了解奪取政府的權力，使自己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是他們的重大責任和絕對權利。”

馬克思、恩格斯，科學共產主義的創始者，曾經熱情的積極的保衛公社，給巴黎公社擁護者以一切可能的援助；在公社受血腥鎮壓之後，他們對巴黎公社創時代的意義有着豐富的見解。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解釋公社的缺點與錯誤，一方面特別強調它的“積極”成就，而且首先是強調它歸根到底是工人階級的政府，它代表勞工能夠得到經濟解放的政治形式。馬克思在1871年4月寫道：“工人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及其國家的鬥爭，因巴黎的鬥爭而進入一個新的階段。不管其直接結果如何，一個有世界歷史重要性的新出發點是已經取得了。”

馬克思從巴黎公社的經驗中找到了他在理論上已提出來的問題的具體的實際的解決。這問題：無產階級革命拿什麼來代替資產階級的国家機器，在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期中，新型的国家制度是什麼。公社證明工人階級不能簡單的奪取現成的国家機器使之為自己的目的工作，而必須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公社並不是為了把政權從一部分統治階級的手中移轉于另一部分統治階級手中的、反對這一個或那一個国家政權形式底革命，而是一個目的在打碎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統治機器的革命。馬克思寫道：“因此，不管它在巴黎的命運（公社的命運）如何，它的威名將傳遍于全世界。歐洲及美國的工人階級立即歡迎它，把它看成是解放的神妙詞句。”

馬克思死後，恩格斯必須與機會主義者進行激烈的鬥爭，他們與資產階級一塊企圖抹殺巴黎公社的意義及其偉大教訓，使無產階級離開他們的革命道路。1891年巴黎公社20周年的時候，

恩格斯写道：“近来德国庸人又是一听到無产階級專政就吓得大喊救命。諸君，你們想知道無产階級專政是什么嗎？請看看巴黎公社吧。这就是無产階級專政。”

列宁，我們时代最偉大的思想家与革命家，不但对巴黎公社的意义評价很高，而且光輝的利用了它的經驗。列宁、斯大林热烈的关心并深刻的研究全世界被剝削者与被压迫者的一切革命运动，始終努力而且知道如何由其中得出必要的教訓，以便在思想上、政治上及組織上更好的武裝俄国及国际無产階級。

列宁曾写道：“公社已經教导無产階級如何具体的处理社会主义革命的問題。”列宁在1911年着重指出：“作为社会革命的先进战士的公社，在一切有無产階級斗争与受苦难的地方都得到同情。它的生活与死亡的圖画，夺取世界資本并保持在其手中两个多月的工人政府的景象，無产階級英勇斗争及失敗后的苦难的情景——这一切曾經提高了千百万工人的情緒，喚醒他們的希望，并吸引他們的同情到社会主义方面来。”1917年3月24日，当列宁还在苏黎支的时候，他曾經写道：“沿着1871年巴黎公社及1905年俄国革命所指出的道路前进的無产階級，必須組織并武裝所有人民中最貧苦的受剝削的部分，使他們自己能够把一切国家政权机关拿到他們手里头，使他們自己能够組成这些机关。”1917年4月中旬列宁着重指出：“公社的实質不在于資产階級所通常找求的，而是在于它建立了特殊形式的国家。这种国家在俄国已經存在，即工人兵士代表苏維埃！”

斯大林同志在1924年4月对公社的历史意义作了詳細而又簡明的解釋，他写道：“苏維埃共和国就是那个久經寻找而終於找到了的政治形式，在这个形式底范圍中也就应当实现無产階級底經濟解放，社会主义底完全胜利。

巴黎公社是这种形式底萌芽。苏維埃政权是这种形式底發

展和完成。”

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先决条件，是它以1905年革命的形式所进行的总演習。胜利的决定条件是無产階級为战斗的徹底革命的政党布尔什維克党所領導，这是巴黎公社所缺少的主要的东西。列宁与斯大林批判的研究并运用从世界各国無产階級斗争历史、首先是巴黎公社及1905年的苏維埃所得到的教訓，使俄国無产階級对于十月已有准备。在光荣的列宁、斯大林党領導之下，胜利的無产階級以它对敌人毫不倦怠的斗争，以它的偉大的創造性的热情，能够在最短的历史时期內克服巨大的困难，消灭剝削階級，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并进入过渡到这个社会的更高阶段共产主义的道路上。

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了并論述了無产階級專政及無产階級国家問題的一般輪廓。列宁与斯大林必須在这一方面在理論上与实际建設工作上，更进一步發展与丰富馬克思主义。然而这一方面最复杂最困难与最新的问题，已經为斯大林同志所策划与解决。反映与記錄苏联所已經历与已取得的東西的苏联“斯大林宪法”，是这些問題不但在理論上而且在實踐上已經光輝地被解决了的不可置辯的証明。

曾經充滿了人类中最精敏最远見的头腦之思想，曾經鼓舞巴黎公社的战士之思想，过去与現在充滿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头腦与夢想之思想，即沒有人剝削人，人压迫人，沒有一国压迫另一国的社会——已經活生生的在偉大的苏維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實現了。

巴黎公社被凡尔賽資產階級所粉碎与殘酷的踐踏。公社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無产階級夺取了政权并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后，采取了等待的态度，对于凡尔賽人采取防禦的态度。公社社員極力想避

免挑起国内战争的责任，沒有对凡尔赛反动分子采取及时的猛烈的军事进攻。当时所必须作的事情，正如馬克思所說的，是应该防止敌人集中他們力量，是应该毫不延迟的开到凡尔赛去。领导巴黎群众武装起义的改組后的国民軍中央委员会“把他們的权力放棄得太早……”。公社社員極力想避免被非难以用暴力夺取了权力，他們在选举公社的事情上失去了宝贵的時間。因而他們給凡尔赛人以机会来集中和組織他們的軍事力量，并获取主动，进攻巴黎。

第二、巴黎工人对他們的階級敌人凡尔赛人和他們的代理人太过于寬容。公社沒有采取特別措施以解决他們的敌人，却允許反动派在巴黎的腹心組織他們的力量。公社社員沒有使他們的敌人及他們所逮捕的間諜再也無力作危害行动，却企圖對他們施以精神上的影响，而且幼稚的相信他們所进行的“光荣工作”。工人們的寬容对公社有非常致命的結果，对凡尔赛棍徒們是一件再好沒有的工作。

第三、巴黎工人們沒有夺取国家銀行。沒有采取必要的步驟瓦解凡尔赛反动者的經濟力量。

“無产階級在十字路口停住了，他們沒有繼續前进‘剝夺剝夺者’，却讓他們自己为在国内建立由全国任务所团結的最高正义之夢想所迷醉；如像銀行等等的机关沒有被夺取，蒲魯东主义者关于‘交換銀行’等等的理論在社会主义者当中还很流行。”（列宁）

由于犯了这些錯誤，公社放过了增加它的存在与斗争的物質資源之可能性，放过了給敌人最薄弱的地方以粉碎的打击之可能性。

然而公社最基本的缺点是它缺少真正的工人階級的共产党。沒有这样一个政党，巴黎的無产階級不能得到充分的准备与

訓練，甚至對於他們面前的任務以及完成這些任務的方法，沒有清楚的觀念。巴黎的工人階級因為沒有這樣一個政黨，就不能成為各省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的革命行動的組織者與領袖。因為缺少這樣一個政黨，與農村的聯繫薄弱的巴黎公社，不能爭取法國全國的巨大農民後備力量，並領導他們戰鬥，反對資產階級、地主、凡爾賽的反動分子。

這樣一個真正革命的工人階級政黨布爾什維克黨的存在，使無產階級、農民與被壓迫民族的共同革命行動，能够在極其廣大的領土上得到勝利。布爾什維克黨保證了十月革命的意志一致、行動一致與目的一致。

十月革命之獲得勝利，主要是由於一個政黨——共產黨的不可分割的領導，而巴黎公社之失敗，首先是因為它是為兩個政黨所領導，這兩個政黨都不是共產黨。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教訓，是斯大林同志在他的關於“十月革命與俄國共產黨人底策略”的著名著作中指出來的。

斯大林同志寫道：“總之，一個黨，即共產黨獨占領導，是十月革命準備工作底基本要點，——這就是十月革命底特徵，這就是十月革命準備時期內布爾什維克策略底第一個特點。……十月革命與法國1871年革命不同而優勝於它的地方，因為在法國1871年革命中，革命底領導是由兩個黨所分擔，而且無論其中那一個黨都不能稱為共產黨。”

今天法國正經歷着不幸的日子，法國的勞動人民正遭受着不可言狀的患難。在1870年9月資產階級的“國防政府”篡奪了政治權力，並且為了鎮壓法國人民，利用他們所有權力與手段一直到組織“賣國”的程度。在1939年9月法國的資產階級統治者和他們的主子，於剝奪法國人民一切自由並麻痺他們的意志後，把他們拋入戰爭中。統治階級把他們的階級特權與反動計謀置于一

切之上，由于他們的貪婪，唯利是圖，愚蠢与腐化，使这个战争走向了失敗与灾难。現在凡尔賽人的后代正利用着失敗，企圖迫使法国人民負担战争与失敗的費用，給外国占領者償付經費，忍受破產的結果，資產階級企圖激怒無產階級，它正瘋狂的發動着沙文主义与排犹运动，正大肆迫害法国人民的真正代表与社会民族解放的战士——共产党。然而法国人民曾經经历許多考驗，曾受到許多教訓，而且主要的是已經开始了解誰是他們的真正朋友，誰是他們的敌人。不愧为公社社員的子孙与他們的工作的繼承者之法国共产党，正由他們那里學習教訓并避免他們的錯誤，正运用着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經驗，与掌握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說——在这个党里头，法国無產階級將找到能够使他們为自由与社会主义的斗争得到無可置疑的胜利的力量与領袖。在劳动人民国际团結的援助之下，这个胜利是可能的。法国無產階級記得国际主义的旗帜是巴黎公社社員的旗帜。公社的法令，一切它的活动，它的成分，它的存在，它的口号，它的战士的热烈呼声，他們的最后遺囑——这一切都充滿着国际主义的精神。

公社是永垂不朽的。“以为已經被遺忘的公社，以为已經永久被毀灭的公社——它存在于我們中間，而且比在1871年增強了20倍。”这就是恩格斯在1892年巴黎公社21周年紀念之际所說的話。今天我們更有無限的根据宣稱：公社存在着！

23年前获得胜利的苏維埃政权，成为近2万万人的强大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公社是巨大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与精神力量。它是全世界劳动人民为自由、为和平、为各民族間的友愛、为社会主义而斗争之最大的堡壘。今天有千百万資本主义国度的無產階級、农民、劳动人民以及殖民地人民对这个輝煌的公社——苏維埃国家，表示最热烈的同情，并对胜利的社会主义的偉

大国家寄以最大的希望。

3月18日，当我们纪念伟大的巴黎公社社员——我们的光荣革命先驱者的时候，我们共产党人宣示我们坚毅的布尔什维克誓词：以一切方法加强伟大社会主义国度——全世界劳动人民的祖国的力量；更加不屈不挠的以国际无产阶级团结一致的精神训练群众，更高的更坚决的举起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苏维埃爱国主义便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生动的体现，为巴黎公社的不朽工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伟大工作在全世界的完全胜利，毫不倦怠的把全世界劳动人民战士的队伍结合在一起。

（选自“季米特洛夫文集”，解放社1949年版，第62—70页）

巴黎公社的綱領性文件

下列3个文件說明了巴黎公社的社会政治綱領，表述了工人階級在1871年革命中的領導作用的思想，指出了巴黎公社社員肩負的双重任务：保証法国自由和民族独立，使法国劳动群众摆脱资本主义压迫而爭得解放。

(一)“3月18日革命”公告(摘錄)

昨天尚不为人所知曉的默默無聞的無产者，瞬息間將名震全球。他們在酷愛公理和正义并無限忠誠于法蘭西和共和制度的热情的激励下，在这种崇高的感情和久經鍛煉的勇气的影响下，决意拯救遭到奴役的祖国和受到威胁的自由。这就是他們对同时代人和对后代的偉大功績。

首都的無产者鑒于統治階級的欺騙和叛卖行为，深知自己掌握社会事务管理权以挽救局势的时刻已經到来了。……

無产階級面对着它的权利受到經常威胁和它的一切合法要求遭到漠視的情况，看到祖国瀕于毀灭、自己的一切希望瀕于破灭，深知無可推卸的天职和絕對的权利要求它掌握祖国的命运并执掌政权来保証自己的胜利。

这就是它之所以用革命来回答那个不惜在敌人入侵和占領的情况下發动內战的倒行逆施的万惡政府的瘋狂罪惡挑衅行动的原故。……

(摘自巴黎公社“政府公报”，1871年3月21日)

(二)公社“告法國人民書”(摘錄)

巴黎所要求的是什麼呢？

承認并巩固共和制这种唯一符合人民权利和社会正常自由發展的政体。

在法蘭西全境实行公社的充分自治，这种自治將保證每一个公社拥有自己的全部权利，保證每一个法国人作为一个人、一个公民和一个工作者，能充分發揮自己的体力和智力。

公社的自治权將只受到同它發生联系的一切其他公社的同一种权利的限制，公社的联盟將巩固法蘭西的統一。

公社的不可剝夺的权利是：

批准公社的收支預算；确定和攤派捐稅；管理一切地方公益事宜；組織法院、民警和国民教育事宜；管理公社的财产。

通过选举或竞选，任命公社的負責官吏和各种公职人員；这些人員都应当是負責的、經常受到監督的，并随时可以撤換的。

充分保障人身自由、信仰自由和劳动自由。

使公民通过自由發表意見和自由保衛本身利益來經常參加管理公社的事务；公社应保障这种自由，因为它是唯一負責監督和保證集会权和出版权正确自由行使的機構。

組織城市防衛工作并組織国民軍，国民軍自己选举將領，它是負責維持城市秩序的唯一力量。

此外，巴黎并不要求任何更多的地方保證，这里当然有一个条件，这就是她能够通过中央行政機關——加盟公社代表大会——切实实现这些原則。

但是由于巴黎拥有自治权和行动自由，她还保留这样一項权利；在她認為必要时可以实行巴黎居民所要求的行政改革和

經濟改革；設立一些促使教育、生產、貿易和信貸發展和普及的機構；根據時間的要求、有關人士的意願和經驗的積累，使得人人都能參加政權和取得財產。

我們的敵人污蔑巴黎，說她企圖把自己的意志或自己的領導權強加在國內其他地區的頭上，說她要建立一個危及其他公社的獨立和主權的獨裁；他們這樣說如果不是以訛傳訛，便是有意欺騙國人。

他們說巴黎要破壞我國革命所建立起來的法蘭西的統一，也就是要破壞我們的來自舊法蘭西各地的先輩在聯合節^①上一致同意的統一。他們這樣說如果不是以訛傳訛，便是有意欺騙國人。

迄今以來帝國、君主制和議會制強加給我們的統一，無非是暴君專制的、不合理的、胡作非為的、不堪忍受的中央集權制而已。

巴黎所要求的政治統一，是一切地方主動性在一個共同目標下的自願聯合，是一切個人能力在一個共同目標下的自由自願合作，這個共同目標就是：人人幸福、自由和安全。……

這是舊的政界和教界的末日，是軍國主義、官僚主義、剝削制度、投機倒把、壟斷操縱和特權地位的末日，是一切給無產階級帶來奴役和給祖國帶來災難和不幸的丑惡現象的末日。

讓我們偉大的、敬愛的、受到謠言和誹謗蒙蔽的祖國得到安寧吧！……

至於我們巴黎公民，那末我們的使命就是要完成一次現代革命，這將是以往在人類歷史上發射着光芒的歷次革命中最廣泛和最有效果的一次革命。

^① 指1790年7月14日聯合節（攻破巴士的獄一周年紀念日），那一天，法國各地公社的代表在全國統一的号召下歡度了這個節日。

我們的天職是斗爭和戰勝！

巴黎公社

1871年4月10日于巴黎

(摘自巴黎公社“政府公報”，1871年4月20日)

(三)公社“告農村勞動者書”(摘錄)

巴黎公社低估了農民作為同反革命勢力作鬥爭的同盟者的意義，某些公社社員甚至表示不相信能把農民吸引到革命方面來。公社對於聯合農民的意義估計不足，資產階級和富農對廣大農民階層的影響，以及巴黎同外省聯系的困難都使得凡爾賽政府易于展開污蔑公社的宣傳以策動農民反對無產階級。城鄉勞動者之間沒有建立聯盟是公社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約·維·斯大林指出：“法國1848年革命和1871年革命所以失敗，主要是因為農民後備軍站在資產階級方面。”（“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4頁）

下面是公社告農民書的節錄，它說明，公社的某些活動家畢竟意識到了吸引農民到革命方面來的必要性，並提出了一個符合農村勞動居民群眾的利益和需要的綱領（宣言刊登在1871年4月10日“公社報”上，後來印成傳單散發）。

兄弟們，人家在騙你。我們的利益是一致的。我所要求的，也正是你所希望的；我所爭取的解放，也就是你的解放。在城市里，生產世界上一切財富的人却無衣無食，流連失所，他不能指望得到任何人的救濟；可是，農村中又何嘗不是這樣呢？所謂剝削者：富有的地主或工廠主又何嘗有什麼兩樣呢？你和我一樣，起早摸黑辛辛苦苦地工作，甚至不能糊口。你也和我一樣，沒有

自由，沒有閑暇，沒有有益于身心的生活。你和我都仍然是貧困的奴隸。

農民，貧苦的短工！人們已經向你反復說了將近一百年，說什麼財產是勞動的神聖的果實，而你竟也信了這句話。可是你睜開眼睛看一看你的四周，看一看你自己，那你就會恍然大悟，這是一片鬼話。如果你是一個老人，你勞碌了一輩子，整天從早到晚拿着鋤頭、鐮刀操勞，可是你畢竟發不了財，直到衰老的殘年連一片麵包都沒有。你的全部收入都用來扶養了孩子，他們有的被征去當了兵，有的娶妻成家，也過着牛馬般的生活，他們也將像你一樣死于貧窮之中；因為當你的精力被榨干後，就再也找不到工作，你將因你的年老力衰而成為兒孫的累贅，於是不得不背上乞袋，低着頭，在屈辱和酸辛中一家一家地請求捨施。……

這是不公道的。正因為如此，所以巴黎群情激奮，舉行起義，要求修改那種使富人掌握對勞動者的統治全權的法律；可是你却輕信一貫騙你的人的謊言，責難巴黎。巴黎要求使農民子弟受到同富人子弟一樣的教育，而且是免費教育，因為科學是人們的共有財富，它對於生活之必要，不亞於眼睛對於觀察事物之必要。

巴黎要求今後不再有那個每年向人民搜刮3千萬法郎以自奉，此外還供養一大群家族和僕從的國王；巴黎要求在取消這類龐大開支之後，大大地降低捐稅。巴黎要求今後不再設立年俸2萬、3萬和10萬法郎的職位，因為這種情況使得一人全年的花費，足夠維持許多家庭的生活；單單這一筆節約就為建立工人養老院提供了經費。

巴黎要求，沒有財產的人不繳一文錢的稅，只有一所住宅和園地的人也不繳稅，擁有少量財產的人從輕征稅，全部捐稅重擔應落在富人的肩上。

巴黎要求，50亿法郎的賠款由众議員、參議員、波拿巴分子、战争禍首來付給普魯士，為此需要變賣他們的財產，以及王室的財產，因為現在王室並不是法蘭西所需要的。

巴黎要求，訴訟對於需要進行訴訟的人將不收任何費用，法官應由人民從公社的正直人士中選任。

最後，巴黎希望，你們這些農業工人、窮困的短工、受高利貸者盤剝的小有產者——佃農、田莊耕種者、農場耕種者，總之所有一切汗流浹背地播種、收穫和勞動，但把自己勞動產品的最好部分交給不勞而獲者的人，請你們牢記，巴黎希望歸根到底做到農民擁有土地，工人擁有勞動工具，人人都有工作。……

巴黎勞動者

（摘自“巴黎公社文獻資料集”，第272—274頁）

（李嘉恩節譯自“近代史文選”，第2冊，莫斯科1953年俄文版）

1871年的巴黎“康妙恩”

李大钊

50年的回顧

社会革命的先声

距今恰恰50年，就是1871年的3月18日，巴黎人民起来反抗一个卖国的政府，并且宣告了市府的独立，自由，自主。

这回中央政府的推翻，并没有经过普通革命的阶段，没有动炮火，没有流血。当人民武装起来，出现于街衢间的时候，那一班统治者早已逃走；政府的军队早已退出巴黎城，那民政官吏们，早已携着他们所能携的东西急忙退到凡塞儿 Versailles城去了。这样演成的变动，巴黎的人民，在“巴黎康妙恩” (The Commune of Paris) 名义之下开始了一个自由的新时代。

这个事变，是起在普法战争将要终结的时候，普法战争的發生，固然不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原因，而由经济上去解释，这次的战争实是两个资本主义国的斥候战。法国对普宣战。法国对普宣战是在1870年7月15日，普国得德意志联邦各州的援助军事非常的浩大，以数计之的有85万人，一举而侵入法境，连战连捷，围拿破仑于塞塘，由开战之日起不过6星期间，使拿破仑不能不树降旗。

9月4日此消息传到巴黎，政府惊愕万状，巴黎的群众则在卜郎魁派 Blanquists 导率之下，占领了下院，宣布共和，于是中产阶级共和党和温和的共和党出而组织政府，但普军乘胜仍长驱

而圍攻巴黎。

当时法国正在产业发达的过渡期，各阶级间的利害关系，极其复杂，农民军队和大资本家结为王党，都会的小工业者和工人则结为共和党，共和党中又分为绅士党，急进的议会派共和党，工人半革命的共和党和极左派的共产主义共和党。（卜郎魁派）当帝政废止的时候，率领群众执行直接行动的是极左派，而政权则落于右翼的共和党手中。

法国国民自卫的政府方在游戏的时侯，巴黎已被围困，继续着到了冬天，政府的防备极其缓慢，似乎他怕劳工阶级的实力比伯德军的侵入还甚，劳动阶级才悟新政府与旧政府没有什么区别，于是屡谋颠覆之，而“康妙恩”逐渐接近。

在巴黎“康妙恩”的大悲剧以前，巴枯宁预备了一个喜剧的揭幕者。无政府主义并不奇怪，这里昂 Lyons 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康妙恩”才是奇怪，1870年，巴枯宁 Bakunin 李嘉德 Albert richard 同着布澜 Gaspard Blanc，带了很多的徒党，侵入了里昂，占据了一个名叫 Lyons Hotel de Ville 的旅馆，宣告国家已被废止，地方工厂的工钱提高到一日3佛郎，然而还未出这一天，这国家已以中产的国民军的形式回来了，巴枯宁派遂从那个旅馆逃走了，这一幕喜剧，就是这样的告终。

次年(1871)1月28日，政府私与普军结休战条约。正在爱国的愤怒中的巴黎，以是被激怒了巴黎国民军，——民主的组织成的市民军——认为卖国而大起反对。2月8日，一个缔结平和的议会被召集了，介尔士 Thiers 实执其牛耳。这个会议议定的临时和约，于2月26日在凡塞儿签字，普法战争算是告结束了。

新选的国民议会，只巴黎及其他二三都会，共和党占优势，此外各地方则到处都是王党占了胜利，700议员中王党占450人。新就政府首位的介尔士得国民议会的承认，采取巴黎与地方间

的分离政策。他先任命复辟派的將軍为巴黎国民軍司令官，国民軍則表示反对，而自选中央委员会以指揮权异之，拒受將軍的命令。議會方面則拒絕共和国的承認，把首都由巴黎迁到臥塞儿，制定种种法律，在經濟上予以重大的打击，劳工階級的生計全失，巴黎破产革命的机运迫在眉睫了。

3月17日介尔士秘令他的部將夜襲国民軍，而謀夺取他們的大炮，并占領城中各要地。按照与普軍訂立的休战条約，大炮应交普軍，而国民軍不肯，只把这大炮夺去，介尔士便可以吧国民軍打得粉碎，以后便可以高枕無憂了。魯昆德將軍受了密令，3月18日拂曉率步兵一联队并补充軍隊攀登坂道，夺取大炮，午前6时，果然沒有有什么抵抗，便把那有名的大炮捕获了。是3月的早晨，寒光凜冽，街上沒有人影，所以沒有什么人知曉，这大炮便眼看着要被他們搬去了，但是大炮很重，沒有馬，亦沒有炮車，由高坡往下运，很是費事。此时紅日东升，街上漸有人影，其中亦有在襲击的时候仅免于难的国民軍兵士，到了7点半鐘的时候，教会的鐘丁丁的乱打，沈默忽然破了在邱陵的麓际召集国民軍的大鼓亦冬冬的响了，喇叭的声音亦起来了，一刹那間国民軍出現了，馳馬身着武裝，整队而行，魯軍的周圍看熱鬧的人們多是妇女与小孩，像黑山一般的来相集合。

声势汹涌的群众兩次为魯軍所威吓而退却，中間队伍有为群众遮断者。魯昆德將軍大惊，隨即發令向群众开炮。兵士方在躊躇，群众中的妇女此时喊着，向兵士說，“諸君，向我們向我們的丈夫和小孩开炮嗎？”士官威吓伊們，忽有一軍曹喊着說，“棄了武器吧！”。魯軍皆棄武器群众喊声大震，而突进魯軍与国民軍握手了，这是午前9时的事。

魯將軍被捕了。午后在解往他处的途次为震怒的群众所杀。攻击巴黎的总司令威諾阿見勢不佳，狼狽而退，逃向塞奴河对岸

去了。政府当局者惊愕不知所措，倉皇向臥塞儿逃走。

巴黎政府的官吏逃走后，經了兩三日的混乱，国民军的中央委员会以外沒有权威了。但他們未能理解这新事实的意义，中央委员会下給总司令刘立耶 Lullier 的命令極其普通，不顧那命令怎样能够实行，所以刘司令不能閉塞城門，不能解散反革命团体；不能占領扼巴黎西部的窪雷里昂要塞。mont Valerien 委员会到二十一二日頃，尙不自覺他自己是唯一的巴黎的支配者；看他为那替政府謀画的市長等所操縱，便可以知道他是怎样的旁觀，怎样的沒有組織的权力了，委員和市長等商量举行巴黎市会的选举，極力置重和他們一致，至任他們把那选举延期到26日。当这委员会忙着去圖保持法律形式的时候，失了正好占領巴黎各要塞的机会，那臥塞儿的政府常是比他們的反对党——劳工階級——覺悟的快的多。介尔士很喜欢巴黎的委员会以种种交涉自为消遣，他好可以有工夫去預备军队，使与外界隔离，以适宜的政策用心訓練，当他这些准备將要完成的时候。他靜以待时，但他似已早有决心去行一回大杀戮，即使他弄弱了，他以杀戮还答巴黎“康妙恩”自治体宣言的决心，那个議会在那里，亦必使他为此；在那个时候那个議会几乎以一动物园自居了。

1871年3月26日巴黎市会选举办完了，結果革命党占绝对的多數。其中11位是第一国际党员，取名为 Commune 掌握政权。Commune 者法国市町村等自治体的通称，唯在巴黎，他是可以令人想起有1792年的光荣的历史的“康妙恩”于多数民众，是有“对于君主政治的民主政治对于專制的自治”的意味的。

然在少数共产党的心中藏了新观念，只此新观念，才是“康妙恩”的真体。“康妙恩”就是劳动者的共和国。巴黎的全劳动階級小商人，和当时尙在無产階級位置的手工业者，都有把政权握于自己手中的覺悟。“康妙恩”尙未成立前的3月20日的官报有

云：“巴黎的無产階級确認在支配階級的失政与背信中，自己等当取公务的指揮以救济时局的时机来了。……無产階級知道正逢对于他們的权利的永久的威胁，正当的热望的绝对的拒絕，并祖国及其一切的頹廢，执权力而自握其运命于掌中，且确操其胜算，是其無上的义务绝对的權利”。

劳动者握权力的事情——这就是“康妙恩”。因此“康妙恩”才是偉大。于支配階級才是危險，因此他还有生机而为历史所記憶。

“康妙恩”被宣告的3月26日，幸福与再生的洪濤吞沒了。巴黎欢喜的热情擴張及于資产階級。劳动者資本家都是欢天喜地的，见过1848年的革命的老人喜極而悲，至于咽淚。是青年，是妇女，是小孩都高兴的了不得，花也撒开了，赤旗也翻开了，歌声震天，似乎自由平等的新生活馬上就要开始了。臥塞儿的偵探看見这种情形，报称巴黎以“康妙恩”發狂了。

巴黎“康妙恩”的宣言影响于法国各处，引起革命的运动有好些地方，都一样的为“康妙恩”的宣告，但都因受不住政府的压迫，次第解散了，就有一二处竭力抵抗，到了4月5日亦都不能支持了。

当时介尔士身居臥塞儿，亲自指揮一切，努力于反革命的宣傳与訓練。温和的共和党等的有志者，奔走于巴黎与臥塞儿間以为調停，斡旋于其間，但結果归于徒劳，“康妙恩”方面尙以比較的好意迎納他們，而介尔士方面則全然拒絕調停。介尔士由是更把巴黎与地方間的一切通信交通遮断了，發布些造謠的告示，說巴黎已全陷于無政府的狀態，杀人与掠夺的事情肆行無忌，更使議會里的多数党压迫左翼的言論，通过剝夺巴黎自治权的法令。至4月2日介尔士就命令开始巴黎总攻击，巴黎西部激战亘2月之久，合全国軍隊都来攻巴黎。那观望形势的卑士麦更答应了介尔

士的要求，送还法国的俘虏，援助攻击军。

“康妙恩”内部亦有多数党与少数党，就中以下郎魁派与1848年的急进派合为多数党。第一国际党员与属于他派的9人合而为少数党。这并不是对于中产阶级急进派社会党人占少数的意思。第一国际党员与别的少数党一样在社会主义的理论上，并不反对多数党，他们只是反对多数党的政策，或是无政策，卜郎魁派因其首领卜郎魁Blunqui为政府所捕，就像航海的孤舟失了罗盘针的一样。卜氏的政策是以集权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独裁与对于绅士阔彻底的挑战者。他非难一般社会主义者的政策论，他不问主义理论的善恶，专选傲慢而忠实的服从者，集于自己的周围，故他能集合些勇敢的革命战士，组成一个强固的团体。不幸他一旦为介尔士政府所拘捕，他的信徒顿失指导的明星，便茫茫然无所适从，至此始悟这种组织的不良，魁领一失，无人能继其后，全党即为之动摇，然而晚了！现在的希望惟有设法取回卜郎魁氏，大有“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的样子，他们向介尔士提出以在“康妙恩”手下的一切的人质换回卜郎魁氏，但介尔士不许。

不只是卜郎魁派有这无定见的短处。“康妙恩”的多数人都有这种短处，因为这回的选举，是仓卒之间举行的，所以被选的人很混杂，多数派既因卜郎魁氏的被捕，失了他们的指导者，少数派亦全没有一定的政纲，只是主张些共产的自治，和分权的空浮理论。少数党中属于“第一国际”的人们比别人总算实在些，这“第一国际”即是马克思氏指导的“万国工人协会，”在法国以强有力的劳动组合联合会表现出来。普法战前即被认为与国家有危险而遭解散，解散前的会员殆有40万人，照“第一国际”的政纲，资本主义的产业应该移归由劳动组合发达而成的工人自治团体管理，一方面政治的国家应该是地方分权，当此危急存亡之秋，第一国际党人过于拘泥其理想的国家，不能善应时势。

多数党自限于1793年的迟滞的模仿，他两次让权于无能而且愚蠢的公安委员会的手中。他容忍了各种公务机关的无秩序与无能力，即军务机关亦包括在内。他以弱者佯作倔强的拙笨的愤怒，替代了训练，并一个有统系的政策。他命令了国民军以应行的职务，而不问他实行了没有。他压迫了些反对“康妙恩”的报纸，而允许他们用别的名义复活。他捕了些不重要的不足为患的反动派，而对于臥塞儿的偵探反倒置之不理。他的命令一律是象征的，他们不过是摆大作派罢了。这样子所以“康妙恩”的成绩可记者甚少，计算起来不过是废止议会的破坏经济秩序的法律，对于工人免除一切地租为生活的保障，支給国民军的俸给，发还贫民当入当铺的财物，推倒为拿破侖一世紀功的宛达母柱 *Vendôme column*，减少“康妙恩”的官吏俸给，到一年6千佛郎，使教会与国家分离，没收教会的财产，由教育削去宗教科目，寥寥数端而已，这是因为时势所迫，不能不以全力防御外敌，所以没有工夫致力于新社会的建设。

“康妙恩”的财政、粮食、司法、教育、外务、公安、劳动、军事等委员功绩卓著的也有，全无能为的也有，其中以劳动委员的成绩最值得记录。

劳动委员是奥国的工人佛蘭克儿，*Leo frankel* 他是一个第一国际党员，他能于最短的时间实行第一国际的政纲。第一国际的政纲就是减少私营的生产，拥护在国家监督管理之下的自治的行会与产业组合，最终的所有权为国家所保有。但是劳动组合的毁灭，使他的这种事业进行很困难。4月16日他对于各职工会（其数有34）发表一种宣告，令他们组织一个委员会，好安排着去管领那些锁闭的工厂。在“康妙恩”淹没以前在5月10日及5月18日这委员会集合了两次，但他们的决议的记录全然无从查考了。那时有34个组合，43个生产组合，和11个各种劳动者团体。他

的對抗雇主的計劃，是使雇主若雇屬於“康妙恩”者時，必須支給正當的工銀，并禁止面包房的夜工，禁止雇主對於工人的減薪與罰俸等，8時間工作制亦被提議，但未實行。總之勞動組合現在又開始復興了，把產業移歸勞動團體管理，算是開了端緒，他又使“康妙恩”發布一切契約，應與勞動團體交涉的法令，結果國民軍的補充亦要經勞動組合辦理了。

但在“康妙恩”以雍容的態度，慢慢的施行，他那象征的法令的時候死亡，已以長足的大步向他接近了。“康妙恩”方面因為醉酒的司令劉立耶 Lullier 將軍的失策。當4月2日還答介爾士襲擊的時候，沒有占據住 Mont Valerien 要塞，這是一個大大的失算。臥塞爾方面正在起首槍決那些被他拘囚的人們，“康妙恩”方面亦捕獲了許多的人質，其中包含着些巴黎的大僧正，聲稱如槍決革命黨一人，即槍決大僧正三人，以為恫吓。臥塞爾方面的殺戮果然停止了，“康妙恩”方面以羅塞爾 Rossel 替代了劉立耶，這又是一個無能的領袖。國民軍亦稱為聯合軍，雖出全力以為抵抗，但介爾士軍人多炮利，眾寡不敵，終有螳臂當車的勢子。臥塞爾方面知道硝煙彈雨之後有平安，所以從容進行聯合軍方面的 Issy 和 Vanves 兩要塞，在他們舍棄之前已經粉碎了，Maillot 要塞在 Mont Valerien 的炮力支配之下，亦已淪為灰燼。“康妙恩”失敗的悲劇中最慘傷的事是那炮手的死尸，不死于敵兵之手，而死于自己方面久已沒用的大炮，和那與徑口不合的子彈。“康妙恩”的敗亡日迫一日，而介爾士的勢力亦日增一日，到了5月念二日臥塞爾軍遂長驅侵入了巴黎，此後便是一星期間的可恐怖的巷戰了，入夜因為雙方的縱火焚燒很多的屋宇，火光燭天，人聲鼎沸，槍聲炮聲夜夜都成恐怖。臥塞爾在前進中，殺了他們所拘囚的人們，“康妙恩”方面眼看沒有法子可以止住他們的屠戮，亦把那些為救那些被捕的人質都槍斃了，許多大僧正亦

在其內。到了念六日 大勢全然去了，远隔的 Vine nnes 要塞亦降服了。

但是战争虽然完了，杀戮却尚未完，大杀戮却方在开始。政府军侵入巴黎的时候施行了近世史上絕無仅有的大屠杀，所杀的人不只是俘虏，凡在巴黎的男女老幼無論何人，只好你是参加防御的人，侍候过受伤者的人，喂养过受餓者的人，都不能倖免，甚至醉酒的兵士，眼中看出的嫌疑者。問答稍有差池，亦都逃不了，無情的彈刃，Lobau Barracks和 Rue des Rosiers 等处流血成河，兵士在那里站着，都沒有他們的脛骨以上，塞奴 Seine 河水呈出暗褐色，尸骸暴露，悲声惨切不忍聞觀，有人描写当时政府军殘酷的情形說：

“你該死，不論你作什么！倘你在你手中被搜出武器来——死！倘你用武器——死！倘你求情——死！不論你向何方面左右前后上下——死！你不但在法律以外，并且在人道以外，年齡和性都不能救你与你們。你該死，但須先尝一尝你的妻，你的姊妹，你的母亲，你的兒女就是方在搖床的兒女的死亡的苦痛。在你的眼前那受伤的應該由野战病院被曳出来，受槍彈的打击。也應該活着被泄着他的受伤帶血的手足像呻吟痛苦的廢物包一般委之于溝壑。死亡！死亡！死亡！”

在这悲劇中有多少人橫罹慘戮呢？兩万人呢？3万5千人呢？沒有人能够說出一个确数来。“康妙恩”以后巴黎有10万余的工人不見了，这是政府军的大屠杀，这是国民军的大牺牲，这是阶级战争的初幕。

政府军胜利以后，“康妙恩”算是消灭了，法蘭西的社会主义，随着社会主义者的被杀，一时受了重伤。第一国际受了这次的打击，不久亦遂灭亡了。国民議員決議贈介尔士以感謝狀。臥塞儿军的总司令被选为大总统。誰知54年巴黎“康妙恩”的种子，

又在Voga河流域放了燦爛的鮮花，得了光榮的勝利！

（附言）申報50周年紀念囑我作一篇“50年來世界的勞工運動”的論文，我覺得此題太大使自己縮小了範圍，改作“50年來世界工人的國際運動”，不料瑣事牽累，竟未得暇，乃紀述與申報殆同時誕生的巴黎“康妙恩”的一段歷史，以塞此責。

作者志

（選自申報館50周年紀念專刊“最近之50季”〔1872—1922〕）

巴黎公社

柯 柏 年

“公社万岁！”

在1871年3月18日，法国的投降妥协的资产阶级的梯亥尔(Thiers)政府，派野战联队去夺取巴黎国民军的大炮，迫使巴黎无产阶级不得不拿起武器来实行自卫，而把梯亥尔政府赶到凡尔赛。那时，“公社万岁！”的如雷的喊声，把巴黎惊醒了。

资产阶级的梯亥尔政府，自从1870年9月4日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无时无刻不在计划着如何解除巴黎无产阶级的武装。在普鲁士军队已打进法国的时候，在普鲁士军队已包围着巴黎的时候，资产阶级的国防政府，并没有真心要保卫法国、保卫巴黎；国防政府的唯一的决心，是勾结普鲁士的军队来打击巴黎底武装的无产阶级。法国资产阶级的国防政府毫不犹豫地变成了卖国政府。他们宁愿与普鲁士订立割地赔款的卖国条约，而不愿与巴黎底武装的无产阶级一同坚决保卫法国。为什么？因为他们认清了“巴黎战胜普鲁士的侵略者，就等于法国的工人战胜法国的资本家及其政府的寄生虫。”(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正相反的，法国无产阶级却真心为保卫祖国而战。在1870年9月2日拿破仑第三的军队被普鲁士击败于色当之后，巴黎的人民就于9月4日推翻了第二帝国，宣布成立共和政府。巴黎的民众之所以容许资产阶级乘机窃取政权，是以它们保护法国为条件的。当时法国的大革命家勃朗基(Blanqui) (勃朗基虽是大革命

家，但他却是錯誤的陰謀主義的擁護者與實行者），說：“敵人當前，不能有黨派，也不能有紛歧意見。”他甚至以“祖國瀕危”作為他的機關報底名稱。這一方面固然顯示當時巴黎工人階級還沒有高度的覺悟；但在另一方面卻充分表明當時巴黎工人階級是真心想保護自己祖國而戰的。

以梯亥爾為首的國防政府，表面上雖口口聲聲說要抵禦外侮；實際上却時時刻刻在等待着出賣祖國的機會。在正月28日，巴黎投降了，國防政府很迅速地與普魯士簽訂恥辱的和約，割讓了亞爾薩斯勞倫二省，賠償了50萬萬法郎的賠款。梯亥爾在完成其出賣祖國利益的任務之後，就立即進行鞏固其階級統治之工作。梯亥爾雖對普魯士屈膝哀求，但對國內無產階級卻極端強硬。國防政府要解除工人階級的武裝，因為他們認清了“巴黎工人武裝着一天，有產階級——大地主與資本家——的統治就一天要受到危險。”（恩格斯：“法蘭西內戰引言”）於是，巴黎的無產階級就被迫得或者是不戰而對梯亥爾屈服，或者是武裝起義。巴黎的無產階級選擇了後者，這個選擇是不錯的，因為“不戰而降，是使工人階級瓦解，其不幸比喪失任何數目的首領還要大得多。”（馬克思：1871年4月17日“致顧格曼的信”）

巴黎公社就是這樣產生的。巴黎公社是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正如恩格斯所說的：“你們願意知道專政是什麼樣子嗎？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法蘭西內戰”，中文本18頁）

巴黎公社在其存在的七十二天中，做了些什麼呢？

巴黎公社首先打毀了舊的國家機器，而建立了新的。募兵制與常備軍被取消，而代之以由一切能荷槍作戰的公民所組成的國民軍。警察的一切政治機能也全被革除。公社是由巴黎各區域選舉出代表來組成的，選舉人隨時可以召回他們所派的代表。公

社并不是国会的机关，而是合立法与行政权为一；不是空谈的机关，而是工作的机关。公社委员以及其他的公务人员，都是为社会服务，而不是为着升官发财，他们的薪俸，只等于工人的工资，不得超过6千法郎。法官也是公开选举出来的，随时可以调换。这种废去了募兵制和警察，一切官吏由人民选举出来而且随时可以召回调换，合立法权与行政权为一的公社，是一种新的国家形态，是适于无产阶级专政底一种国家形态。

第二，巴黎公社铲除了教会的势力。公社下令解散一切拥有财产的教会，把教会财产没收归国有；教士应依赖信徒们之捐助而度刻苦的生活。一切学校都不受教会的干涉，一切教育都是免费的，人人都有机会享受学校教育。这样，公社就把精神压迫的工具摧毁了。

第三，巴黎公社颁布了许多经济的法令。公社取消了从1870年10月至1871年4月的房租，将已付的租金作为将来应付房租之用。公社下令把期票之支付延期至10月1日，又下令将所有债务延期3年偿还。制止把抵押于城市当铺内的物件拿出来拍卖。禁止面包工人夜工，禁止厂主用种种借口罚取工人罚金。把厂主逃跑的或停工的一切工厂与作坊，交给工人合作社经营。这些步骤，无疑地是与工人阶级利益有直接关系的。

第四，巴黎公社充分地表明它是十足国际主义的。公社拆毁了在1809年战争后拿破侖用敌人的炮铸成的成为民族侵略主义与民族仇恨底象征的凡尔登广场的凯旋柱。公社委任了德国工人充当劳动部长。公社尊重英勇的波兰子弟，使他们充当巴黎守衛者底领袖。一切的外国工人，与巴黎工人一同为无产阶级解放之不朽事业而奋斗。

当时领导公社的，有甲可滨派、有勃郎基派、有普鲁东派。甲可滨派是急进的小资产阶级，它们并不是社会主义者。它们自以

为它們是負着法国大革命的传统，是在实现1793年的民主理想。它們不知道新的时代带来了新的理想与新的任务。勃郎基派之所以是社会主义者，大部份只是根据他們的革命的無产阶级的本能，其中只有很少几个靠着那位懂得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凡蘭（Vullant）之帮助，才对于基本原则得到比較明白的了解。至于普魯东派，它們是小农和小手工業者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無政府主义者。他們主張自治的公社底联合，而不要国家。他們猛烈地反对專政政治的步驟。虽然当时局势所迫，使公社采取的那些行动，常常是完全正确的；但公社沒有統一的领导，沒有明确的行动綱領，这自然是大大地削弱了公社底力量，減少了公社底最后胜利底机会。

巴黎公社本身有些什么重大的錯誤与弱点，以致終归失敗呢？

第一，梯亥尔既在3月18日企圖解除巴黎工人武裝而發动了反革命的国内战争，可是巴黎公社还没有决心来进行革命的国内战争。在梯亥尔政府人員以及大地主、資本家、教士这一批反动派退走到凡尔賽之后，巴黎国防軍應該立即向凡尔賽进军，乘反动派还没有時間集中其力量时，就把他們打潰。可惜，巴黎国防軍当时沒有立刻进攻凡尔賽，而却忙着选举公社，給了凡尔賽反动政府10天喘息的时间，使它們有時間恢复及加强其力量。当凡尔賽反动政府力量未够的时候，它們假裝与巴黎公社談判議和，而巴黎公社由于不願發动革命的国内战争，而真心希望与凡尔賽成立和平。但当普魯士把法国俘虏釋放回来，使凡尔賽政府的軍隊力量加强时，它們就放下了議和的假面具，而炮轟巴黎了。由于巴黎公社不願發动革命的內战，以致丧失了宝贵的时机，沒有立即进攻凡尔賽，而給了梯亥尔以集中反动力量之時間；这是巴黎公社失敗之主要原因。“看起来，巴黎人之敗北是由

于他們自己的錯誤，而這錯誤確是生自他們的过于高尚。”（馬克思：1871年4月6日“致李卜克內西的信”）

第二，巴黎國防軍在把梯亥爾政府打跑之後，由全軍選舉出來的中央委員會掌握政權。國防軍底中央委員會之成份，是無產階級的和社會主義的，由這樣的一個中央委員會掌執政權並領導革命，在當時是很適當的。但中央委員會為要避免僭奪政權之嫌疑，立即進行公社之選舉，在3月28日，中央委員會就把政權移交給巴黎公社了。公社委員中，工人只占百分之三十二，小商人占百分之十五，小職員占百分之十五，自由職業者占百分之三十八。很明顯的，巴黎公社的無產階級成份，是比較中央委員會為少。所以，馬克思認為這是“第二個錯誤：中央委員會為要讓位給公社，而把權力放棄得太早，這又是由于太過莊重以至流于疑懼！”（馬克思：1871年4月12日“致顧格曼的信”）

第三，巴黎公社沒有沒收法蘭西銀行。關於此點，恩格斯說：“尤其是使我們不能了解的，是公社對於法蘭西銀行的寬大態度，這也是非常重大的政治的錯誤。把銀行拿到公社手中，這比1萬個抵押者都還有更大的意義，這將會使法國資產階級對凡爾賽政府施用壓力要它來同公社議和罷。”（恩格斯：“法蘭西內戰引言”）在10年之後，馬克思提及巴黎公社時，也指出沒收法蘭西銀行就足以達到與凡爾賽成立和議。他說：“可是，具備一點健全常識的它們，（指巴黎公社——柏年注）能夠與凡爾賽成立一個對整個人民大眾有用的妥協——在那個時候所能達到的，惟此而已。只要沒收法蘭西銀行，就足以把吓慌的凡爾賽人物底一切裝腔作勢都消除了。”（馬克思：1881年2月22日“致鈕文惠的信”）

第四，巴黎公社在軍事上也有一個重大的疏忽，就是過於相信普魯士之中立，在城之北部沒有很好的設防。馬克思事前曾警告過他們。馬克思在寫給畢斯里的信中，提及此事：“我曾勸告公

社職員在莫特馬特(Montmortré)底北面，即普魯士這一面，設防起來，它們還來得及設防；我事先就告訴了它們，如果他們不這麼做，它們就成鑊中之鱉。”(馬克思：1871年6月12日“致畢斯里的信”)它們沒有接受馬克思的勸告，以後普魯士人讓凡爾賽人通過那些依據和議條件他們所不能通過的區域去攻擊巴黎城的北部，凡爾賽人從防備較弱的很長的戰綫上實行進攻，巴黎公社終於在5月28日失敗了。

第五，巴黎公社還未能善于揭發敵人的陰謀。當梯亥爾政府慌忙出走時，巴黎公社曾取得了他們所遺下的許多文件，這些文件都不利於凡爾賽政府的人物的。馬克思在事前曾勸告巴黎公社社員趕快把這些文件安放在安全的地方。他寫信給佛蘭克爾與凡林說：“把那些不利凡爾賽惡棍之文件，放於安全的地方，不是有好处嗎？這樣的預防，不會有什麼害處的。”(馬克思：1871年5月13日“致佛蘭克爾與凡林的信”)後來馬克思在寫給畢斯里的信中，重又提起此事，說到：“我曾要求他們立即把那些不利國防政府委員的一切文件，送到倫敦來，俾以此法在一定限度內阻止公社底敵人底殘暴行為。”(馬克思：1871年6月12日“致畢斯里的信”)可惜，巴黎公社也沒有做。

第六，最主要的是巴黎公社沒有強大的工人階級政黨的正確領導，也沒有能夠得到廣大農民的有力的幫助。在巴黎公社的那一時代，領導法國工人階級的，是勃朗基主義者與普魯東主義者；馬克思主義當時在法國的影響還比較小。“勃朗基主義者……向來就受教於陰謀派學校，於服從陰謀的嚴厲紀律的他們，以為用比較少數的勇敢的，很有組織的人，在某種順利的條件之下，就不仅可以奪取政權，並且用極大的努力來干，還能夠保持政權，直至把民眾吸引到革命方面來，把他們環繞於少數領袖的四周為止。為了這個目的，首先必須把全部政權掌握在新的革命

政府手中，成为最严密的專政的集中。”（恩格斯：“法蘭西內战引言”）因为勃朗基主义者主張少数坚决英勇的先鋒队底陰謀行动，所以他們不去进行团結、組織、武裝、教育、訓練广大工农群众之艰苦的工作。至于普魯东主义者呢？他們反对政治、他們反对革命政权、他們反对組織。他們的無政府主义的空想，时常引导工人阶级入于歧途，使工人运动失敗。可見，当时领导法国工人阶级的勃朗基主义者与普魯东主义者，都沒有正确的路綫，都不能正确的领导工人阶级，造成工农坚强联合，团結工农劳动民众以取得最后的胜利。这就很清楚地指明了：馬列主义的革命的無产阶级的政党是革命胜利与工人阶级解放底首要条件。巴黎公社社員很英勇地奋斗着，但因为缺少这样一个强大的正确领导的政党，所以終于失敗了。

由于客觀的原因以及主觀的錯誤与弱点，巴黎公社結果被凡尔賽反动政府所鎮压了，凡尔賽政府在打下巴黎之后，对于公社社員，大肆报复，几天之內，被屠杀者达2万5千人；被判罪者，达1万3千7百人。这真是空前的殘酷。

巴黎公社于1871年5月28日被梯亥尔的资产阶级的卖国政府，勾結普魯士用殘暴的手段鎮压下去了。然而，巴黎公社的精神不死！

巴黎公社底历史，指明了馬克思是全世界無产阶级底真正偉大领导者。在巴黎公社沒有发生时，馬克思早就警告过法国的工人阶级，說在当时的条件下起义是不适当的。馬克思說：“正在敌人敲着巴黎城門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圖，是不智的、絕望的蠢举。……希望他們很鎮靜地、很坚决地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所給与他們的一切方法，来更切实地巩固其本阶级的組織，这將給予他們以强大的力量为法蘭西的新生与我們無产阶级解放的共同事業而奋斗。”（馬克思：“第一国际为普法战争第二次宣

言”)但是当巴黎工人既已起义了,他并不斥責他們而是和他們一同前进,一同在斗争过程中学习。馬克思經過一位常年往来于巴黎倫敦之間的德国商人,与巴黎公社社員保持关系,向他們提出許多重要的、正确的意見。如果当时巴黎公社社員听从了馬克思底許多意見,必不致那样惨敗。在巴黎公社失敗之后,各国的資產階級的报纸,对巴黎公社,給以無耻的咒罵。馬克思为拥护巴黎公社,在公社失敗后2天就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上宣讀他所起草的第一国际为法蘭西內战而發的宣言,他在这部著作中清楚地闡明了巴黎公社底历史意义。他所写的第一国际关于普法战争以及关于法蘭西內战的三篇宣言,構成为“法蘭西內战”这部杰作,直到今天,还是馬克思主义中最好的文献之一。列宁說的好,“馬克思知道怎样警告領袖們不要發动未成熟的起义;但他对于‘翻天覆地’的無产階級,是抱着一个实践顧問底态度,群众斗争参加者底态度;这些群众,不管勃朗基与普魯东的謬誤的理論,还是把整个的运动提到一个較高的阶段。他写道:‘虽是如此,这一次的巴黎起义即使它被旧社会底狼、猪和惡狗所压倒下去——还是我們党从巴黎6月起义以来的最光荣行为。’……他以为工人階級英勇地、自我牺牲地拿起主动权制造世界历史,其价值是超乎其他一切之上的。”(列宁:“馬克思致顧格曼書信集俄文本序言”)至于“法蘭西內战”一書,也誠如列宁所說:“直到现在还是为爭取‘天’而斗争的最好的指南,而且是自由主义的和急进主义的‘猪’所最怕的巨物。”(同上)

巴黎公社,已过去69年了。

69年后的3月18日,全世界的工人都在紀念为巴黎公社而牺牲的先烈。馬克思說的好,“工人的巴黎与他們的公社將永远是被敬为新社会光荣的先驅者,它底被难者,將永远被記在工人階級偉大的心坎之中。”(馬克思:“法蘭西內战”)

69年后的法蘭西的英勇的工人階級，也像其偉大的先輩——巴黎公社社員——那樣地與反動的大資產階級進行着堅決的鬥爭。69年前的法國資產階級出賣祖國利益，勾結普魯士，用殘暴的手段壓服了巴黎公社。現在，法國資產階級卻以“保衛祖國”的欺騙口號，驅使法國民族的真正主人，法國勞動民眾到帝國主義戰爭的戰場上去為帝國主義反動資產階級當炮灰。法國工人階級從巴黎公社的經驗，學得了法國資產階級口中的“民族”口號，不過是純粹欺騙的勾當。法國共產黨在反動的达拉第政府凶暴的壓迫之下，依然是繼承着巴黎公社底英勇的精神，努力從下層建立新的人民陣綫，進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反對大資產階級的反動統治，而爭取自由幸福的法蘭西之實現。

69年后的法蘭西底英勇的工人階級，將不會像他們的先輩——巴黎公社社員——那樣的失敗。69年前，法蘭西還沒有一個組織嚴密、綱領正確的工人政黨；今天，法蘭西已有了經得起磨煉的握有馬列主義的武器的共產黨了。69年前，巴黎公社是受資本主義的世界所包圍；今天，占世界土地六分之一的蘇聯，在偉大的列寧斯大林領導之下，運用了巴黎公社底經驗教訓，建立了鞏固了工人階級專政，建成了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蘇聯成為今天全世界革命運動底強大的支柱。69年前，東方還沒有覺醒；今天，東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日益增長的反帝國主義的運動，特別是中國偉大的抗日戰爭已成為西方的工人階級底有力的同盟者，法國的工人階級，在今天的不同的條件之下，一定能夠完成它們的先輩——巴黎公社社員——所未完成的使命！

（选自“解放”周刊，第109期，1940年4月出版）

論巴黎公社

紀念巴黎公社成立75周年

——1871年3月18日——

雅洛斯拉夫斯基

本年3月18日為巴黎公社成立75周年紀念日，本文為前年故世的前“真理報”主筆雅洛斯拉夫斯基在1941年巴黎公社70周年紀念時所作，不過至今還沒有失去價值，特為譯出，以作本年度節日的紀念。

巴黎公社產生的原因

1870年7月，以法國戰敗和巴黎公社產生作結的普法戰爭開始。拿破侖三世的第二帝國暴露了自己全部的腐敗情形，只經過了幾個月戰爭，就使這一個帝國走到了色當之役，1870年9月2日馬克·馬漢的軍隊在色當地方遭受到了慘敗，因此使這一個帝國崩潰了。

雖然這一次戰爭的目的是違反民意的，但是法國兵士並不缺乏英勇的精神。然而這種英勇精神非但被普魯士軍隊的武力，而且尤其是被法國統治階級的出賣所撞得粉碎了。

對於這一個時期的法國史，在英國“Pall mall gazete”上發表的幾篇恩格斯論普法戰爭的論文是非常有意思的。在“戰爭

簡記”中，恩格斯描写法国对于战争准备不够的情形。他一步一步揭露和指出使路易·拿破侖帝国战敗的内部原因。甚至于在这一个时候，这一个“平庸的惡棍”（像馬克思在描写这一个法国末代帝王时所称呼的）所創造的数量大得可怕的軍队竟还是紙上多于实际。“非但是軍需部，而且法国軍队的全部行政机构，甚至于完全不适于供应前綫軍队之用，”——恩格斯在1870年8月15日写道。

对于万一的紧急事变的准备一点也沒有。甚至于在1870——1871年，法国的大資产階級还不是利用自己的政权来保証真正的国防，而是利用来謀取私利的。

1870年8月，由于最高統帥部的豫疑不决，而放棄了城堡梅茨。

“我們暂时还不能批評这一次巨大慘变的政治結果，”恩格斯在1870年8月20日写道。“我們只能惊奇它范围之大与变化之突然和惊歎法国軍队竟能忍受之。”

但是，甚至在这一次战敗之后，法国資产階級政府还是一点也不作救国的准备。

“軍队組織到处显出無用，”恩格斯写道，“高貴而英勇的民族看到，他們所有一切保衛自己的努力都是徒勞無益的，因为20年来他們忍受着他們的命运給一群冒險家支配，而这一群冒險家却把行政机构，政府，陸軍，海軍，——实际上全法国——变成了他們自己謀取私利的泉源。”

当你想到今天法国的命运及其战敗的原因时（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国），恩格斯的这些话好像是給达拉第之类的这一批人吃了一記耳光。在1870年的色当和梅茨是第二帝国資产階級全部政策、資产階級国家的整个体系的無法避免的后果，正像法国在1940年的战敗是法蘭西第三共和国資产階級全部政策的

后果。

1870年9月4日，巴黎的工人和貧民的暴动促成了“国防政府”的成立。这政府事实上，用馬克思的話說，是“卖国政府”。站在該政府的領袖地位的乃是最反动的保皇党特罗修將軍，外交部長是瞿尔·法佛尔——也是工人的敌人，正像75年之后准备了新的更使慘的敗績的資产階級政府中的人物。

在色当和梅茨城下战敗之后，巴黎处在普軍包圍的直接威胁之下。但是甚至于在这时，恩格斯非但認為抵抗是可能的，而且还呼吁进行抵抗。“我們可以大胆說”，恩格斯在1870年12月8日發表的論文“战争的时机”中写道，“如果人民抗战的士气不再降低，則法国人的形勢，甚至于吃了最近这几次敗仗之后，还是很坚强的。”估計到国际形勢时，恩格斯認為投降是叛国行为，他劝法国人無論如何要繼續斗争。他写道，在正規軍后面还“有無數民兵，有被普魯士人逼迫去进行防御战的人民大众”，他証明，“巴黎很可以好好兒的守下去，”因为还有其余部份的法国可以来帮助它。

但是这一位誓死保衛皇朝的特罗修將軍，这一位革命的憎恨者能否建立这样以人民为支柱的武装力量呢？被普魯士人包圍的巴黎当时只有依靠革命力量的組織才能解危。但是这种組織正是法国資产階級所最惧怕的，因此，巴黎虽然有50万武装的人民，还是不顧特罗修的一切夸耀的申明而不可避免地要投降了。

特罗修及其他法軍將領之狐疑不决与动摇不定和在应该作战的地方后退的主因是由于資产階級不信任人民，惧怕人民。人民也不信任那由仇視人民的人物組成的最高統帥部。

“巴黎来的一切消息都把失利的原由归咎于兵士不信任統帥部，”恩格斯在1871年1月26日写道。“这也是对的。我們不应该

忘記，特罗修对于拉·維萊特，貝尔維尔以及巴黎其他的‘革命’街区像火一样的惧怕。他怕他們更甚于普魯士人。这并不仅仅是我們的推測或結論。这我們是从来源可靠的資料中知道的，这是某一位政府閣員从巴黎寄出来的信，信中說，各方面都要求特罗修展开强烈攻势，但是特罗修总是拒絕，他說，諸如此类的行动是会把巴黎轉到‘民众煽动家’的手中去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注意地观察着事变的全部过程，和巴黎通訊虽然很困难，第一国际的大会还是从法国接到相当詳細的情报。大会有許多檄文对于怎样观察这一次战争向国际工人联合会的會員們提出了非常清楚的政治立場。当巴黎产生了“国防政府”，馬克思不隱秘該政府使他引起的恐惧。

“这一个共和国，”馬克思在国际工人联合会大会第二次关于战争的檄文中写道，“并没有推翻皇位，不过是占据它所遺留下的空位子而已。它不是作为社会業績而是作为国防手段来宣布成立的。这共和国是处在临时政府手中的，而組成这临时政府的，一部份是著名的奥尔良皇族中的人物，一部分是資產階級共和党人，这些人物中有一部份人身上曾經被1848年6月暴动留下过洗刷不清的污点。”

然而馬克思警告法国工人：

“当此敌人几乎已經在扣巴黎大門的时候，任何推翻新政府的企圖是非常不理智的。法国工人應該履行自己的公民的責任，不过他們不要讓自己热中于1792年的国家傳統，像当时法国农民讓自己为第一帝国的傳統所欺騙的那樣。他們應該做的不是重复过去，而是建設將來。”

但是1871年1月28日，关于把巴黎給普軍的問題决定了，資產階級地主的法国国民大会任命法国工人的死敌保皇党人蒂埃爾为政府首長，該政府同意賠款5万万和割讓法国兩省予普魯

士，蒂埃爾公布了關於取消國家近衛軍的俸給的命令，取消了支付房租和債務的延期，——於是巴黎的人民起義暴動，在法國首都成立了公社。

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日——是世界工人運動史上最重要的日期，從這一個時刻起，“資本主義瓦解和巴黎公社方面向資本主義施行第一次打擊”^①的時期開始了。

巴黎公社的歷史意義

但是假使說馬克思在1870年9月中是因估計到周圍的全部局勢而警告不應該進行暴動的，那末自從產生了巴黎公社之後，卻沒有一個人比這一位偉大的共產主義創立者更欣喜的了。

“在1870年9月中目暴動為不理知的馬克思，在1871年4月中看到了人民的群眾運動，就以這意味着全世界歷史性革命運動中的進步現象的偉大事變的參加者的地位對這運動付以極大的注意。

他說，這是摧毀官僚軍閥機構而不是單單把它轉移到別人手中去的企圖。所以他向這些由普魯東主義者與勃朗格主義者領導的‘英勇的’巴黎工人表示真正的頌讚。‘這些巴黎人，’他寫道，‘多麼靈活，多麼有歷史性的主動能力，多麼有自我犧牲的精神！’……‘歷史上還未曾見過這樣的英勇主義的先例。’”
(列寧)

起義暴動的公社社員的境遇非常艱苦。他們是由兩個政黨領導的。一方面是勃朗格主義者。路易·奧古斯特·勃朗格對革

① 史大林、基洛夫和士達諾夫對於“新歷史”教本提要所作的指示。

命是忠誠到底的，但是他從來沒有能夠了解階級鬥爭；甚至於巴黎公社的教訓也沒有使他在這一方面學到什麼，在1880年11月中，勃朗格還是叱責階級鬥爭的理論。另一方面，暴動者是由普魯東主義者——小資產階級的烏托邦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領導的。雖然如此，但是“工人階級的革命的本能還是不願錯誤的理論而突進了。”（列寧）

巴黎公社未能吸引農民到自己方面去。當然，他們沒有充分的時間來做這件事。列寧在“研究巴黎公社計劃”中指出，“假使再過3個月，一切都要不同了。”

巴黎公社答复了下一個問題：起義反抗舊政權的無產階級能否負起社會任務。列寧在“巴黎公社”一文中對此答复道：“起義反抗舊政權的無產階級負起了兩種任務：一般的國家的任務：消除德國侵略的法國的解放和消除資本主義桎梏的工人的社會主義的解放。公社的最獨特的特點就是這兩大任務的聯合。”（列寧）

馬克思批判過巴黎公社的行動，批判它在向敵人報復時的不够堅決，它沒有利用國家銀行的資金和其他許多缺點。但是馬克思仍認為巴黎公社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第一次嘗試。馬克思在1871年4月17日致顧格爾曼的信中寫道：

“工人階級對資本家階級以及代表他們利益的国家，所進行的鬥爭，由於巴黎公社的關係而進入了新階段。無論這一次事情怎樣馬上就此完結，但是全世界歷史性的重要的新的出發點是奪取到了。”

20年之後，恩格斯在為馬克思的小冊子“法蘭西內戰”一書所作的序中寫道：“最近，社會民主主義的俗物又開始因無產階級專政這幾個字而感到救命的恐怖。大人先生們，你們想知道這種專政的面貌嗎？請看看巴黎公社，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巴黎公社失敗的原因

巴黎公社为什么会被消灭？列宁写道：“要社会革命胜利，至少要有两种条件：生产力的高度和發展和無产阶级的充分的准备。但是在1871年，这两种条件都不存在。法国资本主义还發展得不够，法国当时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国家（手艺人，农民小店鋪老闆等等）。另一方面，这里沒有工人的党，工人阶级沒有准备和長久的学习，他們甚至于在群众中間也沒有完全理解他們自己的任务和他們的生存方法。沒有严正的無产阶级的政治組織，沒有广大的职工会和合作社……”

史大林也指出了相当重要的一面：巴黎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联系的薄弱，巴黎公社对农民阶级影响的薄弱。

“法国1848年和1871年的兩次革命之所以失敗，主要是因为农民后备軍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史大林写道，“十月革命之所以胜利，是因为它能做到从资产阶级方面夺下农民后备軍，它能做到把这些后备軍爭取到無产阶级方面来和無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成为千万城乡劳动大众的唯一的主导力量。”

巴黎公社中有两个政党在斗争，而这两个政党是和澈底的無产阶级路綫距离得很远的，这一事实当然也有着巨大的意义。史大林也指出，1917年10月革命之所以比了1871年法国革命显出有利的特点，正就是因为十月革命是由一个党——布尔什維克党领导，而1871年在巴黎，“革命的領導权分配于兩党之間，而且这两个政党中沒有一个可以称为共产党。”（史大林）

巴黎公社結果是被法国资产阶级与普魯士軍队的联合力量所压倒了。普魯士政府准許蒂埃爾的政府違反和約条件把凡尔賽軍队自4万增至8万，后来又增至15万人。这是为了想使蒂埃

尔政府能够向巴黎工人施行报复。同时有一部份法軍俘虏也为了这一个目的而釋放回到法国来补充凡尔賽軍隊。普軍也亲身直接援助凡尔賽軍镇压巴黎近郊和法国被占领区中的革命运动。普魯士軍隊与凡尔賽軍隊向革命的巴黎合力进行飢餓封鎖。凡尔賽軍通过普軍占领的炮台与“中立”地带而得能自由地深入了被圍的巴黎。

列宁对于法国资产阶级的这种叛逆行为曾經这样写道：

“‘我們’無产阶级看見过好几十次资产阶级怎样在革命的無产阶级起来的时候，出卖自由、祖国、民族国家的利益。我們看見，法国资产阶级怎样在法蘭西民族受到最强烈的压迫与屈辱的时刻，把自己出卖給普魯士人，国防政府怎样变成人民叛逆的政府，被压迫国家的资产阶级怎样召請压迫国家的兵士来援助他們镇压大胆地向政府当局伸手的自己的無产阶级同胞。”巴黎公社被踐踏在血里了。几千几万暴动者有的被槍杀，有的被关在卡恩和卡莱东尼亞的牢獄里服苦役以至于磨折而死，“巴黎公社是無产阶级想扭轉历史反抗資本主义的第一次光荣而且英勇的，但終未成功的嘗試，”（史大林）资产阶级历史家們却企圖蔑視这一次偉大的运动。

但是任何誹謗过去和現在都不能掩沒那照耀着工人阶级斗争的新前途的巴黎公社的光輝。任何刑罰已經不能压灭新运动的火焰。馬克思相信，法国工人不过是現代全体無产阶级的先鋒，这不过是打破一切障碍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新的强力运动的开始。馬克思在結束国际工人联合会关于1871年法蘭西內战的檄文时写道：“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永远將被頌贊为新社会的光荣預报者。这次殉难的烈士永远深印在工人阶级的偉大的心中。历史現在已經把它的劊子手釘在耻辱的柱子上，他們的神父的一切祈禱也都無力解救他們了。”

这就是列宁深信“我們大家在现在的运动中是站在公社的肩头上”的缘故。

未來是屬於公社的

人类在巴黎公社之后经历了許多宏大的事变。75年来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最重要事件是俄罗斯的3次革命，这几次革命非但結果了沙皇，地主与資本家的統治，而且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最偉大的胜利，假使巴黎公社是当时無产阶级第一次找到的新国家的形式，那末1905年俄罗斯工人阶级发现了無产阶级国家新形式的苏維埃。苏維埃从1917年起成为無产阶级專政国家的基础。巴黎公社的形象及其教訓永远显現在偉大斗争中的苏維埃国家工人阶级的眼前和感应他們斗争。

史大林在第一次全联邦斯达哈諾夫者大会上所作的演辞中說：

“我們的無产阶级革命，是世界上唯一不但能向人民显示其政治效果而且能显示其物質效果的革命。在所有一切的工人革命中，我們只知道有一次革命是曾經获得某种程度的政权的，这就是巴黎公社。但是它存在了沒有多久。是的，它曾經企圖粉碎資本主义的桎梏，然而它沒有能够做到，而且它也沒有能够向人民显示革命的有用的物質效果。唯有我們的革命是非但粉碎了資本主义的桎梏和給了人民以自由，而且还給了人民以过富足生活的物質条件。我們的革命的無敌力量就在这里。”

假使說过去资产阶级能够以侵沉在血里的巴黎公社的幻影来恐吓工人阶级，那末在75年之后的現在，局势是根本改变了。

75年之前产生了無产阶级革命。此后过了46年，在俄罗斯、

用恩格斯的話說成為新世紀的法蘭西的俄羅斯，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了。產生了蘇維埃共和國，用史大林的話說，這是

“……一種最後終於發現的原始的政治形式，在這種政治形式的範圍中無產階級應該可以在經濟上獲得完全解放，社會主義可以獲得完全勝利。

巴黎公社是這一形式的萌芽。蘇維埃政權是它的發展和完成。”

所以我們大家，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大林的偉大學說的擁護者，要紀念巴黎公社。它對於我們，非但是法蘭西工人階級的光榮的過去，它對於我們——在另外一種環境里，在另外一種力量的對比中，以另外一種形式，另外一種力量和可能性；——來體現我們的現在和我們的未來，因為人類的未來——這我們可以深信——是屬於公社的；未來無論如何是屬於公社的！

（選自“時代”雜誌，6年10期，1946年3月16日出版）

公社时期的巴黎工人

阿·莫洛克

80年以前,1871年3月,巴黎工人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权并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工人阶级的政府——巴黎公社。巴黎公社一共只存在了72天;而1871年在马赛、里昂以及法国其他某些外省城市中建立的公社,存在的时间则还要短。

然而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却是十分巨大的。马克思在指出1871年的革命不同于以往一切革命的新性质时曾强调说,公社是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府”^①。恩格斯指出,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②。列宁写道,巴黎公社是“19世纪最伟大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最伟大的榜样”^③,是新型的国家,是“苏维埃政权的萌芽”^④。斯大林在“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一文中谈到过去革命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因为它们的结果只是一种剥削形式代替另一种剥削形式)时,把巴黎公社放在特殊的位置上。他指出,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为反对资本主义而扭转历史的第一次光荣的英勇的然而没有成功的尝试。”^⑤在“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苏联外国文籍出版社1954年中文版,第501页。

② 参看同上,第464页。

③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33卷,第438页。

④ “列宁文集”,第6册,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1页。

⑤ “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03页。

义？”一文中，斯大林駁斥了馬克思主义的敌人对無产階級專政思想的惡意攻击和他們关于馬克思主义者似乎不想建立無产階級对資产階級的專政，而想建立少数几个人对無产階級的專政的無耻謔言，同时也引用了巴黎公社的經驗并強調指出，公社是依靠广大劳动群众、依靠武裝起来的人民的無产階級革命政权^①。

1871年3月18日的革命，宣告了巴黎公社的成立。这次革命是在巴黎被德国軍队圍困的情况下武裝起来的劳动群众政治積極性蓬勃高漲的結果。法国首都的起义工人一致奋起为爭取本国的民族复兴和爭取劳动群众摆脱禍国殃民的資本家的統治并取得社会解放而奋斗。工人在历史上第一次掌握了国家政权，建立了自己的政府。值得着重指出的一点是，公社政府在摧毁資产階級国家机器、建立新型国家、实行社会經济政策和同凡尔賽反革命势力作武裝斗争等工作中，都依靠了巴黎無产階級的群众革命組織：政治俱乐部、工会、第一国际的支部、监察委员会、軍团委员会、妇女革命团体。用列宁的話來說，巴黎公社是“覺醒了的群众的天才智慧”^②建立起来的。

但是由于一系列的原因，部分是由于文献資料的缺乏^③，直到今天，对1871年革命史的这个方面的研究要比对公社政府活动的研究少得多。就連巴黎劳动者寄給公社各个机关和革命报刊編輯部的信件这一类珍貴資料，直到目前仍研究得很差。这些信件也是証明巴黎工人的蓬勃高漲的政治積極性和热情奋發的

① 參看“斯大林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34—335頁。

②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27卷，第109頁。

③ 国民軍中央委员会、軍团委员会、营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区市政局未發表的文件，保存于巴黎国防部历史档案館。这些文件直到今天仍几乎不讓学者进行研究。

革命爱国主义的資料。

所有这些資料，以及說明公社社員在前綫和在街壘里的英勇無畏事迹和他們在法庭上、在流放地和在臨刑前所表現出的堅毅不屈精神的事實和文獻，使得歷史學家能夠把1871年巴黎革命無產者的英勇面貌再現在人們的眼前。這些革命無產者，用馬克思的形象化的話來說，都是一些準備“翻天覆地”的人^①。

本文的目的，是要根據具體實例來說明，群眾革命團體在公社生活中起什麼樣的作用，80年前起來反對剝削和壓迫制度的巴黎革命工人具有什麼樣的抱負和怎樣進行鬥爭。

* * *

公社時期巴黎群眾組織的一種重要形式就是政治俱樂部。大多數俱樂部具有鮮明的無產階級的性質。

在1871年的革命俱樂部中討論的問題和題目是十分多樣的。例如，3月30日在莫里哀大廳俱樂部議事日程上的討論題目是“巴黎公社，它的作用、權利和義務”。同一天在馬賽曲大廳開會的俱樂部的討論題目是“提出和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同一天晚上在阿拉斯街大廳群眾大會上的討論題目是“資本和勞動，實際的組織辦法”^②。

國內戰爭前綫的形勢越緊張，同凡爾賽反革命勢力作武裝鬥爭和無情鎮壓他們在巴黎的走狗的問題也就越益被提作各俱樂部討論的首要問題。例如4月初成立的“爭取人權和公民權俱樂部”第一次會議的第一個議題就是國防問題。“爭取人權和公民權協會”的“臨時委員會”宣布，“本會的宗旨在於全力協助保衛我國的獨立，並在必要時，不惜犧牲自己以鞏固真正的共和

① 馬克思：“法蘭西內戰”，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06頁。

② 1871年3月30日“巴黎公社報”。

国。”^①

这几句话的含义是不言自明的。

“不战胜，就战死！”这是在圣尼古拉教堂开会的第三区公社俱乐部的口号。这个俱乐部是1871年革命俱乐部中最大的一个。它甚至出版自己的报纸“公社社报”，报纸的第1号发刊于5月6日。俱乐部由6人组成的委员会领导，委员会主席是伯纳，委员会秘书兼“公社社报”编辑部秘书是彼尚。根据许多材料可以确定，他们两人都属于布朗基派。

“公社社报”在“人民的法令”的分栏标题下，刊载公社俱乐部会议通过的决议。俱乐部的章程规定，每天下午两点钟，俱乐部的代表要到市政厅去将俱乐部常会通过的决议交给公社委员。我们不知道这项决定到底做到了没有。但公社俱乐部同公社政府之间的联系是十分密切的。公社委员亚穆鲁（工人）、乔纳尔（工人）和维齐涅（记者）都参加过这个俱乐部的会议，并发表过演说。

俱乐部同本区国民军的营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为他们招募各种物品，并尽力照应前线的战士，使他们能得到足够的食物。

为了扩大公社委员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公社俱乐部在4月30日的会议上要求“巴黎公社按照1793年公社的榜样，每天拨出两小时来接见人民，听取他们的请求”；并要求举行“公社会议”（«общинные собрания»），让代表们在会上向自己的选民报告工作。前一项建议并没有实现，后一项建议则实现了。

公社俱乐部在当时所拥有的巨大政治影响，可以从下面一件事中清楚地看出：正是根据这个俱乐部在5月1日召开的、有5

^① “法兰西政治的闹剧”，第2卷，第168页。

千人参加的大会通过的建議，巴黎公社决定在“政府公报”上公布公社在4月30日會議上就設立拥有非常权限的社会保安委员会問題进行記名表决的結果^①。

俱乐部会员之所以作出这个決議，是因为他們要想知道，公社委員中誰了解到爭取坚决措施的必要，而誰則不了解这一点。在俱乐部的这次會議上一致通过決議，欢迎公社爭取設立社会保安委员会这一重大措施，并号召公社“坚决果断地肯定不移地循着革命的道路前进，因为只有这条道路才能拯救公社，才能保證共和国的最后胜利。”^②

从4月底5月初开始，各俱乐部的内部生活显得特別活躍。在5月初和5月中又产生了許多新的俱乐部。其中影响特別巨大的是在第17区(巴丁奥尔区)聖米歇尔教堂內集会的社会革命俱乐部。第17区是無产階級的巴黎的主要堡壘之一。^③

在这个俱乐部中起领导作用的是第一国际巴黎組織的著名委員費約和康波。他們兩人都屬於“蒲魯东左派”，并且是直接稅局的領導人。在这里經常發表演說的还有第一国际地方支部的主席列加利特。經常到这个俱乐部去的还有某些公社委員，特别是公安委员会委員工人沙蘭，他屬於布朗基派。5月14日在聖馬格里特教堂成立了無产者俱乐部，它的主席是公社委員費里浦·菲努里亞。到聖爱斯塔什俱乐部去演講的有公社委員工人尙皮和沙尔东、教师凡尔杜尔等人。他們都屬於公社中的布朗基一雅各宾“多数派”。到聖比埃尔俱乐部去演講的有公社委員画家比里奥尔，他也屬於“多数派”。到聖保罗俱乐部去演講的有公

① 表决的結果公布在1871年5月4日“政府公报”上。

② “1871年巴黎公社大事記(記錄)”，巴黎1945年法文版，第2卷，第89—90頁。

③ 1871年5月5日“政府公报”。

社委員記者亞爾都爾·亞爾奴，他屬於公社中由蒲魯東主義者組成的“少數派”。蒲魯東主義者代表小資產階級的观点，他們同工人群众的距离較远，因此多半很少与俱樂部有联系。在俱樂部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布朗基派，他們同工人階級和革命知識分子的先进階層的联系較為密切。

5月10日，革命俱樂部(經常到这个俱樂部去演講的有著名的公社委員布朗基主義者費勒)在第18区(蒙馬特區，即巴黎主要工人區之一)聖伯納教堂舉行會議，与会者有3千人。會上通過決議，要求公社實行一系列的堅決措施，其中包括：廢除現有的法典，審查現行的法律，禁止宗教祭祀，逮捕教士(他們是“保皇黨人和內戰發動者的同黨”)，出賣教士和叛國者的財產，每隔24小時處決“重要的人質一人”直到被禁囚於外省的布朗基釋放和返回巴黎為止。

第5区聖謝維倫教堂內的俱樂部也起了很大的作用。這個俱樂部的第一次會議在5月13日召開，有2千人參加。在會議通過的決議中，俱樂部會員要求公社採取措施關閉除了進行國防生產以外的一切作坊，逮捕一切與舊警察有联系的婦女，在各區同時搜捕逃兵並將捕獲的人送往前綫^①。實行這些措施無疑會增強革命巴黎的防禦力量。

聖謝維倫俱樂部主席是一個赫赫有名的人物——德國軍隊圍困巴黎時期革命起義的積極參加者，20个區中央委員會的代表，布朗基主義者特羅耶爾。他有的時候也到聖愛斯塔什教堂的俱樂部去發表演說。在保留下來的特羅耶爾致拉澤爾·里哥(當時是公社檢察官)的信中，特羅耶爾抱怨公社不夠堅決，並說，如果我當了公社委員，我一定做到“一棍子把資產階級打死”。特羅

① 1871年5月16日“自由巴黎報”。

耶尔写道，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掌握法蘭西銀行”，槍斃一切不願上前綫的人，撥2亿法郎給第一国际金庫，“保障受伤的和牺牲的公社社員家屬的生活，把典質在当鋪中的一切物品退还原主，給志願兵規定較高的餉銀”^①。

聖謝維倫俱乐部主席的信表明，公社在蒲魯东派和財務委员会委員的影响下对法蘭西銀行所采取的非常錯誤的政策（即將銀行的大量資財仍留交給同梯也尔政府有勾結的旧管理机构掌管），在巴黎無产階級先进階層中間引起了多么強烈的不滿。

不过公社执行了（虽然是在后期）聖日尔曼奧克賽洛伊教堂俱乐部提出的要求，对巴黎一切居民，实行發給身份証的制度^②。頒布这个法令的原因是，凡尔賽分子力圖向巴黎派入大量“策动叛乱的秘密奸細”^③。

在5月初开始提出俱乐部合并的主張，并成立了“俱乐部联合会”，联合会由各个入会組織的主席組成的委员会进行领导。5月7日俱乐部联合会委员会發布宣言：“我們号召一切同公社有联系的社会团体参加联合会，联合会的委员会由一切俱乐部或群众大会各派3名代表組成。它的任务是：（1）保衛共和制度和維護公社原則；（2）把一个或数个俱乐部提出的建議提交各个俱乐部討論，并将联合会委员会認为重要的建議提供公社参考；（3）同公社保持直接联系，由公社每天供給一次前綫战况消息，然后通过各俱乐部的代表把消息傳達給俱乐部的群众，这样做就能避免因誤信报纸上的謠言而造成不良的，而且往往是非

① 方托里歐：“巴黎公社时代的巴黎教堂”，巴黎1875年法文版，第287頁。

② 参看克尔仁策夫：“1871年巴黎公社史”，1940年莫斯科俄文版，第430頁。

③ 1871年5月15日“政府公报”。

常悲慘的後果。”^①

“俱樂部聯合會”的方案並沒有實現。

巴黎革命輿論的某些代表人物和公社的某些委員曾公正地指出，公社沒有能很好地依靠群眾組織。例如，5月20日在麗里大劇院召開了大會，第4區選出的公社委員向選民報告了工作，選民們批評公社委員不夠堅決果斷，並號召他們團結一致。公社委員亞穆魯在会上說，在他看來，公社“同俱樂部的聯繫不夠”。他說，羅伯斯比爾和聖茹斯特在到國民公會去之前，經常先到雅各賓俱樂部或科爾德利俱樂部去听取意見並獲得支持。亞穆魯接着說，這些革命家力量的源泉就在於此，同樣，馬拉的力量也在於他的文章表達了勞動人民的意願^②。

我們在總結這一段論述時應當指出，1871年的革命俱樂部是團結勞動群眾先進階層的重要形式，是激發他們的政治積極性的重要工具，是聯繫公社和群眾的重要環節。公社的各項措施在俱樂部中進行解釋、討論並受到群眾的批評。俱樂部提出了有兼加強革命政權和提高巴黎防禦力量的各種建議。但是，由於1871年巴黎的無產階級沒有一個統一的革命政黨，以致各個俱樂部沒有能變成公社政府的有力支柱。

* * *

巴黎公社時期在巴黎積極進行活動的群眾革命團體中，婦女俱樂部和婦女委員會占有顯要的地位。

在1871年由於尚未根絕的小資產階級偏見的作祟，甚至最先進的俱樂部也只允許婦女作為不享有全權的會員參加會議（例如，聖尼古拉教堂的公社俱樂部章程規定，婦女可以加入俱樂部作為會員，但不能參加討論）。這樣，革命巴黎的先進婦女就

① 1871年5月7日“復仇者報”。

② “1871年巴黎公社大事記（記實）”，第2卷，第458—469頁。

不以参加一般的俱乐部为限，而是建立了自己的組織。

1871年的妇女俱乐部中政治积极性最高的，是特里尼提教堂的俱乐部，巴錫女公民俱乐部和保衛巴黎女爱国者俱乐部。这些組織具有鮮明的無产阶级的性質。5月12日在特里尼提俱乐部的會議上，有一位妇女說：“女公民們！你們都是女工，因此你們是受压迫的人。但是只要稍微忍耐一下，清算的日子、正义的日子很快就要到来了。它將要在明天降临。明天你們將不再屬于工厂主，而將屬于自己。你們拥挤不堪地进行劳动的那些作坊將归你們所有；你們操使的生产工具將屬于你們自己，你們辛勤操作、努力生产、甚至牺牲自己的健康所創造的利潤將在你們中間进行分配。無产者！起来迎接新的生活。”^①会上另一位妇女說：“打倒那种把工人只当作工作机器看待的厂主。讓工人們联合起来，共同劳动，那时他們將是幸福的。”^②另一位妇女指責公社的軍事机关管理不善，隨軍医院中缺乏床單和褥子，前綫战士“缺乏生活必需品，但同时有些人却大量拥有这些物品”。有一位綽号叫做“杜歌大娘”的老婆婆的發言得到了热烈的鼓掌。她說：“必須使反革命分子和凡尔賽分子胆战心惊，讓他們知道，公社能惩治犯罪分子。”^③

在妇女俱乐部的發言中特別强烈地表达出她們对历来充当反动社会政治势力支柱的貪婪腐化的天主教僧侶的極端仇視。

妇女俱乐部、区妇女委员会、妇女監察委员会的領導人都是女工和女知識分子。在这些妇女团体中，工作得特別活躍的，是第18区共和主义女公民監察委员会。委员会主席是普阿列尔。其中委員之一是俄国革命女作家安娜·瓦西列耶夫娜·雅克勒尔

① 參看奧得勃蘭德：“3月18日革命的秘史”，巴黎1871年法文版，第306頁。

② 方托里歐：“巴黎公社時代的巴黎教堂”，第272頁。

③ 同上，第273—274頁。

(她的本姓是科尔文—克魯科夫斯卡姬)①；她的丈夫、第一国际“俄国支部”委員維克多·雅克勒尔也是公社的積極參加者②。監察委員會在聲明中號召蒙馬特爾婦女報名參加先頭部隊到前綫去，要求從軍醫院的編制人員中取消女修道士，要求採取更果斷的措施來取締賣淫現象，負責關心失業工人並幫助他們尋找工作。第17區的女公民委員會也進行了巨大的工作，在委員中起了顯著作用的是“社會革命報”撰稿人、公社的“告農村勞動者書”起草者、民主作家安德烈·里奧③。

對於婦女革命組織提出的要求，公社並沒有置若罔聞。5月10日“杜歌老爹報”滿意地指出，根據當局的命令，醫院中的女修道士已被取消，代之以勞動人民出身的、忠於革命事業的護士和醫務人員④。

1871年最大的婦女革命組織是保衛巴黎和救護傷員婦女協會，協會的章程公布於4月20日⑤。協會登記一切願意到軍醫院和隨軍廚房中工作的婦女和願意去修築街壘的婦女。協會在各區設立區委員會，由中央委員會進行領導。中央委員會密切配合巴黎公社和公社的機關進行工作。中央委員會進行了廣泛的活動：從4月11日到5月14日，它召開了24次群眾大會，邀請“一切

① 關於她的生平，H·C·克尼日尼卡曾寫了一本專門著作“安·瓦·科尔文—克魯科夫斯卡姬——賀·米·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友人，巴黎公社的活動家”，莫斯科1931年俄文版；她的妹妹蘇菲亞·瓦西利耶夫娜（後來成了杰出的數學家蘇·瓦·科瓦列夫斯卡姬）巴黎公社時期曾在巴黎一家醫院中工作。

② 1871年4月26、28、30日，5月7、10日“人民呼聲報”。

③ 關於她的生平，請參看拙作：“巴黎公社的政論家安德烈·里奧”，載“布尔什維克報刊”雜誌，1940年第7期。

④ “杜歌老爹報”，第56期，1871年5月10日第6版。

⑤ 1871年4月20日“社會報”。

忠于人民事業的女公民”參加^①。在這些群眾大會上解釋了公社的綱領，說明了協會的任務。

5月3日在街頭出現了一些具名為“一群女公民”的匿名傳單，傳單號召同凡爾賽方面停戰媾和。針對着這種傳單，婦女協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在5月6日發表了宣言，嚴詞駁斥了主張革命的巴黎同反革命的凡爾賽“和解”的口號。協會的領導人堅定地說，“不，巴黎女工所要求的，不是和平，而是無情鬥爭”。

宣言的作者深信，巴黎婦女“在生死存亡關頭……會走進街壘和工事，為了公社、為了公社的勝利，也就是為了人民的勝利而不惜流血犧牲。”最後，中央委員會肯定地保證，公社戰勝凡爾賽將會使男女工人“聯合起來，並商討有關本身共同利益的問題，以便靠大家的最後努力來永遠消滅剝削制度的一切殘余和剝削者。”宣言結尾的口號是：“世界社會共和國萬歲！勞動萬歲！公社萬歲！”^②

這個卓越的文件十分清楚地說明了1871年革命的無產階級本質和公社時期巴黎勞動婦女的戰鬥精神。文件的最後有五個人署名，她們是：社會主義運動的著名活動家、裝訂女工娜塔里·列梅爾，女工阿里納·雅克耶，洗衣婦布蘭希·列費佛爾，女教師列魯和俄國女革命家伊麗莎白·德米特里耶娃（伊麗莎白·魯基尼奇娜·土曼諾夫斯卡姬的化名）。德米特里耶娃是第一國際的積極活動家，她同總委員會保持着聯繫，並且認得馬克思^③。

德米特里耶娃在1871年4月24日致總委員會委員赫·楊格

① 1871年5月14日“人民呼聲報”。

② 1871年5月8日“政府公報”。

③ 關於她的生平，請參看克尼日尼卡：“巴黎公社的女英雄伊麗莎白·德米特里耶娃”，載“馬克思主義年鑑”，1928年第7—8期。

的信中談到婦女協會的活動和自己在協會中的工作時說，“如果公社勝利，那末我們的組織便將由一個政治組織改變為社會組織，而我們將組織第一國際的支部。這個思想是很得人心的；我所進行的第一國際的宣傳是要說清，各國，包括德國在內，都已處於社會革命的前夕，這種宣傳一般說來很受婦女的歡迎；參加我們的大會的，已有三四千婦女。”^①

這一段話清楚地說明了俄國社會主義者德米特里耶娃積極參加領導的婦女組織的群眾性質，說明了巴黎公社時期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在巴黎無產階級先進階層中的廣泛傳播。

* * *

3月18日的革命和巴黎公社的成立促進了工人的工會組織和合作社組織的發展，這些組織都加強了活動並積極參加了公社的社會經濟政策的實施。巴黎公社時期，在巴黎共有34個工會（工團），43個生產合作社和7個食品合作社^②。普法戰爭和圍城曾一度使許多組織活動收縮，並使它們當時本來就不多的會員減少。公社建立後，原有的組織逐漸恢復和鞏固，新的組織也陸續建立。

3月18日革命後巴黎工會組織發布的第一批文件中，有“石匠聯合會”的一個宣言，宣言號召這種行業的一切工人都去參加訂於3月23日召開的大會。宣言還號召工人團結起來一起向業主進行鬥爭^③。

制革工業工人互助儲金會訂於4月2日召開會員大會^④；

① “巴黎公社時期的第一國際”（文獻和資料），莫斯科1941年俄文版，第193頁。

② 克爾仁策夫：“1871年巴黎公社史”，第416頁。

③ “法蘭西政治的圖景”，第2卷，第25頁。

④ “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報”，第1號，1871年4月2日版。

“制鞋工人联合会”訂于4月9日召开會員大会^㉑，——公社时期的巴黎报刊上登满了这一类的通知。

公社政府設立了劳动和貿易委员会（由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委员会的著名活动家工人里奥·弗蘭克尔领导），并通过它同巴黎工人組織保持密切的联系。工人組織曾向公社提出了不少社会改革方案。

4月20日关于禁止面包房夜間工作的法令，是公社的重要法令之一。里奥·弗蘭克尔在4月28日的會議上甚至說，“公社發布的各项法令中的这个唯一真正社会主义的法令”^㉒，正如法令条文中清楚說明的，是为了“滿足面包工人联合会的合理要求”^㉓而頒布的。

兩年來一直为实现這項改革而斗争的面包工人热烈欢迎公社的決議。5月15日在馬戏院举行了面包工人的庆祝大会，参加大会的約有1,500——2,000人。会后，工人们奏着乐，打着写有“通过生产协会来組織劳动！”“1871年社会共和国万岁！”“日間工作万岁！”“消灭人剝削人的制度！”等标語的紅旗，走到市政厅大厦，对公社实行這項措施表示感謝^㉔。

公社在社会經濟政策方面的一項重要措施，就是大家知道的4月16日关于把逃离巴黎的厂主抛棄的工業企業交給工人生产协会的法令。

在这个“著名的法令”（列宁語）^㉕中，公社已經在剝夺資本

㉑ 同上，第2号，1871年4月9日版。

㉒ “1871年巴黎公社大事記（紀录）”，第1卷，巴黎1924年法文版，第543頁。

㉓ 1871年4月21日“政府公报”。

㉔ 參看密奇蘭：“巴黎公社回忆录”，載“經濟学家日記”，1871年版，第23卷，第264頁及以后各頁。

㉕ “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17卷，第114頁。



家方面迈出了虽然是不够坚决的第一步：法令委托工人联合会成立“調查委员会”以进行下列准备工作：“(1)查明被棄的工厂总数，确切载明它們目前的狀況，并編出厂中現有工具设备的清單；(2)提出报告，說明靠厂中工人合作协会的力量，而不是靠逃跑的厂主的力量使这些工厂立即开工生产的具体办法；(3)拟定这种工人合作协会的章程草案；(4)設立仲裁委员会，以便在厂主回来时，确定把工厂最后出讓給工人协会的条件和工人协会付給厂主贖金的数額”。法令的最后部分說道，“調查委员会应將自己的报告提交公社的劳动和貿易委员会，而劳动和貿易委员会則应在最短期限內向公社提出既符合公社利益，又符合工人利益的法令草案。”^①

这样，公社政府就直接吸收工人組織来积极参加实现公社政府提出的关于改造社会关系的重要創議。法令在巴黎劳动者中間激起了極大的热情，他們积极准备实现这个法令。在这項工作中走在最前列的是五金工人，他們是1871年巴黎無产階級的最先进的队伍之一。“机械工人联合会”和“冶金工人协会”在4月23日召开了五金工人大会。大会决定派出兩名代表作为“調查委员会”的委員去参加执行4月16日的法令。大会給予这兩名代表的指示表明，机械工人和冶金工人賦予了公社的決議以多么巨大的原則意义。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的全文如下：“鑒于在3月18日革命后产生的公社治理下的平等不应当再是一句空話，鑒于我們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和我們决意进行到底（直到教权派和保皇派徹底消灭为止）的斗争是以爭取劳动的經濟解放为目的的，鑒于这种結果只有通过那种把我們从雇佣工人变成为生产协会成員的工人协会才能达到，——鑒于以上一切，特給予

① 1871年4月17日“政府公报”。

我們的代表总的指示如下：結束人剝削人这种奴隶制度的最后形式；由集体占有不可出讓的資本的协会来組織劳动。”^①

在这一个蓬勃展开的运动中起着显著作用的，是机械和冶金工会联合会主席狄拉格，上面提到的4月23日大会的決議，就是由他簽署的。数天后，他又向各工会联合会發出呼吁書，号召它們“迅速选举代表”参加“調查委员会”。在这个呼吁書中指出，“为了使各个团体同劳动和貿易委员会建立起經常的联系，建議从公共事务部大厦中撥出一部分房間归这些团体使用。”^②

4月16日的法令在其他工会中也得到了热烈的反应。“縫紉工人联合会”在告各工人組織書中号召它們立即着手建立公社法令規定的“調查委员会”，同时写道：“过去从来没有一个政府曾經給予工人階級以比此更为有利的机会。拒絕利用这个机会就意味着背叛劳动解放事業。”^③

5月15日召开了第一次巴黎各工人組織代表大会。“劳动調查和組織委员会”第二次大会規定在5月18日举行。会上除了宣讀第一次大会的記錄外，还要对章程进行討論^④。

可惜，这个章程本文和兩次大会的記錄都沒有能流傳下来。不过召开兩次大会这个事实就已經說明，4月16日法令頒布后一个月以来，巴黎的工人組織曾进行了相当广泛的組織工作。但是毫無疑問，巴黎公社时期法国工人运动中尚未根絕的蒲魯东主义的影响阻碍了工会組織和生产协会的發展，因为在正統蒲魯东主义者看来，建立这一类組織是毫無必要的。

“劳动調查和組織委员会”的領導机构是它的执行局。执行

① 1871年4月24日“政府公报”。

② 1871年4月29日“政府公报”。

③ “自由巴黎报”，第9号，1871年4月20日版。

④ 1871年5月15日“政府公报”。

局由七个委員組成，其中包括机械工人联合会主席狄拉格和兩位女委員——阿里納·雅克耶和娜塔里·列梅尔（她們都是保衛巴黎和救護傷員婦女協會中央委員）。執行局的七个委員都是社会主义者，是第一国际巴黎联合会的積極活动家。

巴黎公社由于存在的时间太短，沒有能实现它通过的关于处理厂主遺棄的工厂的法令。但是这个法令在巴黎劳动者中間掀起的熱潮促进了工人組織（包括工会組織和生产协会）的發展和巩固。

例如，鑄鋼工人就表現出来特別高漲的劳动熱情和政治熱情。5月7日鑄鋼工人協會行政委員會秘書萊皮佑耶尔給“社会革命报”編輯部写了一封信，信中說：“我們今天开始鑄鋼，从我們工厂中鑄出的第一顆炮弹將落到凡尔賽分子的头上作为我們对反对劳动者解放的人的答复。”^①

五金工人的其他文件中也貫穿着無限忠誠于公社事業的精神。我們所指的是5月3日制定的有105个职工签名的魯夫尔軍械修理厂的章程，在这个厂中已經由一个选出的委員會实行了工人監督。章程第15条規定，“在接到必須立即修理武器的命令时，委員會鑒于保衛公社的需要，可以根据任务的緊迫情况，准許作为一种例外而加班1—2小时，……但加班時間的工作仍按每个工人原定的标准支付工資，不另付加班津貼。”章程的第16条也是很能說明問題的，这一条規定了在工厂中執行值夜制度，但“鑒于……当前的形勢和必須大力節約国家資金，公社無需对值夜者支付報酬。”^②

男女縫紉工人也表現了極大的積極性。

5月14日在报上刊登了第10区一群替国民軍生产軍服的縫

① “社会报”，第39号，1871年5月8日版。

② 1871年5月21日“政府公报”。

綉工人的決議。綉女工在決議中堅決反對業主降低工資，要求恢復原來的工資標準，並威脅說，否則她們就要組織生產協會並“為了本身的福利而經營綉鋪”。綉女工們寫道：“現在已經是結束這種情況的時候了……已經是永遠擺脫暴君的可厭的枷鎖並奮勇努力爭取合理工資和勞動自由的時候了！”^①

這個文件清楚地說明，在公社的影響下，巴黎勞動婦女的階級覺悟有了多大的提高。

在5月12日的公社會議上，弗蘭克爾作了一個關於公社軍需處同私人承包商訂立的縫制軍服合同執行情況的調查報告。報告中說，自4月25日起，承包商大大地降低了計件單價，結果使得工資幾乎降低了一半（同時也使所生產的軍服質量降低）。報告建議把軍服的計件工價保持在過去的水平上，並主張把軍服加工的任务“尽可能地交給綉工人協會去做”。在報告的結尾她說，這個綉工人協會已經向公社提出了“集體合同，決定把參加該會的2萬或3萬工人交給公社支配”。弗蘭克爾堅持自己報告中的論點和提出的建議；他說，“我們不應忘記，3月18日的革命是全靠工人階級實現的。假如我們這些以社會平等為座右銘的人不給工人階級作出任何好事，那末我認為公社本身的存在就沒有什麼意義了。”^②

這個問題討論的結果，通過了一個法令（法令在次日公布）。法令委託勞動和貿易委員會重新審查以前締結的一切合同，建議今後直接同工人協會訂立合同；並且無論如何要給予它們優先權；法令還規定，“承包的條件和價格將由軍需處、工人聯合會和勞動和貿易委員會的代表商定（但需經財務代表和財政委員會同意）”。法令特別指出，公社訂貨的承包條件中“應規定從事

^① “復仇者報”，第47號，1871年5月14日版。

^② “1871年巴黎公社大事記（記錄）”，第2卷，第352頁。

这项工作的男女工人的按日工资或计件工资的最低标准”。^①

5月13日的法令是巴黎劳动者的一项重大收获。但是，由于这个法令是在公社复灭前几个星期颁布的，因而它自然不能产生巨大的实际效果。

公社政府同无产阶级社会团体合作的一个明显例证就是劳动和贸易委员会吸收保卫巴黎和救护伤员妇女协会中央委员会参加组织妇女劳动。同时这个妇女协会中央委员会还负责建立女工联合会。5月18日规定要召开巴黎女工大会以选举参加各个工会联合会的代表，然后建议成立巴黎女工联合会以团结巴黎各女工工会。但是事局的发展使得这些方案没有能够实现。

资产阶级报纸为了想在公社政府和巴黎劳动者之间制造不和，散布了许多谣言，说有50个工人团体赞成“工商和劳动联合会”提出的巴黎同凡尔赛“讲和”的方案。5月14日在一起开会的巴黎工人团体代表坚决抗议“妥协分子”的谣言。代表们断然地说：“不，在我们劳动者同凡尔赛保皇派之间不可能有任何妥协。共和制度的敌人对我们进行了野蛮的残酷的战争；我们对共和制度敌人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对财政封建主义的斗争，是进步对黑暗反动的斗争。我们一定会获得胜利，而我们的胜利将会带来雇佣劳动的解放和各国人民的独立。”宣言最后的口号是：“公社万岁！世界社会共和国万岁！”^②

* * *

巴黎公社时期在巴黎无产阶级社会团体中占着特殊地位的，是第一国际的支部。当时第一国际在巴黎的各个支部已组成了联合会，联合会的领导人都是当时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

^① 1871年5月14日“政府公报”。

^② 1871年5月15日“政府公报”。

著名人物：如瓦尔倫、泰斯、弗蘭克尔、顧勒，前三人是公社委員。

3月18日革命的前夕，第一国际巴黎支部处于極端困难的狀態下。这可以从1871年1—2月巴黎联合委员会的會議記錄中清楚地看出。在这些會議上指出，战争和圍城对組織狀況發生了致命的影响，“好些支部破坏了，會員分散了”，在巴黎的第一国际會員只具有“精神力量”，却没有“物質力量”，“許多协会会员不了解协会的宗旨”，失業使得支部难于恢复，会費不能定期收集。联合委员会沒有自己的机关刊物，沒有經費在外省展开广泛的宣傳，巴黎联合会同总委员会的联系非常薄弱。①

巴黎各支部之所以出現这种情况，是由于它們的領導機構的过錯。在这些領導機構中，蒲魯东主义者的影响还十分强烈，它們对于政治斗争的意义还估計不足。

誠然，巴黎联合会的个别領導人員（愛西、瓦尔倫、阿符里阿尔、杜瓦爾等人）積極参加了3月18日的革命。但整个組織却采取了冷眼旁觀的态度，並沒有指导事件的进展。联合委员会委員奈·馬朗甚至反对国民軍中央委员会，并在巴黎区長和国民議會代表發布的宣言上簽了名。馬朗的这种行為受到了某些参加3月28日和29日會議的联合委员会委員的譴責②。会上甚至决定召問馬朗，并要求他解釋作出这种行為的理由。

在进行公社的选举中，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委员会同工会联合会結成联盟一致行动。3月23日兩個組織的代表共同發布了告劳动者書，書中表述了他們对事态的看法和他們对3月18日革命的任务和目的的了解，并且表示确信，“巴黎人民一定

① “巴黎圍城时期和公社时期在巴黎举行的第一国际正式會議”，巴黎1872年法文版，第37, 58, 68—69頁。

② 同上，第143, 159—160頁。

会把投票拥护公社当作自己的光荣任务”^①。

本文不可能来分析这个大量渗透着蒲鲁东主义精神的文件的内容。^②

当选为公社委员的，约有三十多个第一国际会员。其中大多数（约2/3）是蒲鲁东主义者（一部分是右派，一部分是左派），其余的人是布朗基主义者，只有一个人（赛拉叶）接近于马克思主义。因此，公社中的第一国际会员没有能组成一个统一的、能够正确地领导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府的各项政策并顺利地克服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不良影响的集团。不仅如此，第一国际的会员反而分成了两派，一部分靠近于公社中的布朗基—雅各宾“多数派”，一部分靠近于蒲鲁东“少数派”。

尽管这样，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还是给公社提供了大量忠心耿耿的、能力很强的、坚毅果断的干部。无论在公社和它的各个分支机关中；或是在群众社会团体的领导机构和国民军的指挥人员中，都有许多第一国际的积极会员——巴黎的先进工人。其中有一些人我们在上面谈到政治俱乐部和工会的领导人时已经提到了。此外，由工人阶级出身的公社著名活动家如：阿符里阿尔（公社委员、炮兵署物资局局长），瓦尔伦（公社委员、公社军事委员会委员），狄辽尔（公社委员、公社的军政委），杜瓦尔（公社委员、公社的一位军事首长），克莱曼斯（公社委员），郎之万（公社委员），潘第（公社委员、市政厅卫戍司令），泰斯（公社委员、邮政局长）都是第一国际的会员。特别应当提到的是公社委员欧仁·鲍狄尔，他是无产阶级的诗人，“国际歌”的作者。

公社掌握政权后，第一国际巴黎支部的工作活跃了起来。这

^① “法兰西政治的障碍”，第2卷，第52—53页。

^② 参看克尔仁策夫：“1871年巴黎公社史”，第236页。

也表现在拟定新的章程草案上，新草案扩大了联合委员会的权力，加强了它同地方支部和工会的联系。①

第一国际巴黎联合会同总委员会的联系是非常薄弱的，而且这种联系主要是通过奥古斯特·赛拉叶（法国工人、公社委员同时也是总委员会的代表）和弗蘭克尔同馬克思的通信来保持。

馬克思曾自比为这次“群众斗争的参加者”，“以他固有的满腔热情”②关切公社事态的发展。他在4月26日致弗蘭克尔的信中抱怨说，总委员会没有得到任何关于巴黎联合会的消息③。弗蘭克尔在巴黎公社时期从巴黎写给馬克思的信，只有一封留传了下来。这封信是弗蘭克尔在4月底写的。这一位劳动和贸易委员会代表在信中就他在“社会事务司”中提出的各项改革征询馬克思的意见，同时他还希望馬克思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办法向“各国人民、各国工人、特别是德国工人解释；巴黎公社同古老的日耳曼公社是毫无共同之处的”④。馬克思在5月13日给弗蘭克尔和瓦尔伦的复信中提到的他们的来信，也没有保存下来。在复信中馬克思给公社委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具体意见，同时这位第一国际的天才领袖也批评公社“化费……过多的时间去处理琐碎小事和私人纠纷”⑤。馬克思补充说：“看来除了工人的影响外，还存在着其他影响。”⑥

① “巴黎陶城时期和公社时期在巴黎举行的第一国际正式会议”，第105—122, 160页。

② 列宁：“論馬克思恩格斯及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72页。

③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6卷，第112页。

④ “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国际”，第196页。

⑤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6卷，第118页。

⑥ 同上。关于馬克思同公社的联系，詳見馬克思在1871年6月12日給比茲尔的信（同上，第119—121页）。

当然，巴黎联合会同总委员会联系薄弱的原因，不仅在于巴黎同外界通讯困难，而且也在于巴黎支部中蒲鲁东主义者占着优势。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讲第一国际巴黎支部在巴黎公社时期的活动。这个时期支部的数目增加了，连同在城郊伊符里和蒙鲁日的两个支部，一共有29个。在新设的支部中有“杜瓦尔支部”（纪念公社委员杜瓦尔，他被俘后在4月4日被凡尔赛分子枪杀）和“弗鲁兰斯支部”（纪念公社委员弗鲁兰斯，他被俘后在4月8日被凡尔赛分子枪杀）。

4月2日，伊符里和贝尔西铁路车站联合支部的机关报“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报”创刊了。报纸的编辑是记者加斯东·留非耶（笔名儒勒·诺斯达克）。由于这份报是巴黎公社时期第一国际巴黎支部出版的唯一报纸，因而它实际上成了整个巴黎联合会的机关报；联合会的一个书记昂利·顾勒有时也在这张报纸上发表文章。但是报纸每周只出版一次，因此一共只出了7号。报上刊登的文章大部分出诸儒勒·诺斯达克的手笔。这些文章中都贯穿着蒲鲁东主义的空想观点。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4月23日刊登的诺斯达克的文章“社会革命”。这篇文章的结尾部分竟号召“劳动资产阶级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19世纪的奴隶制度——资本主义”^①。4月16日刊登的“公社是市政机关”一文一方面正确地估价了1871年3月18日的革命，称它是“对1848年6月日子的报复”，是“劳动对资本的世代斗争的继续”，是“使无产阶级登台执掌了政权”；但另一方面也包含着错误的论断；例如文章认为巩固共和制度似乎能消灭“那种分隔无产者和资本家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②。

① “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报”，第4号，1871年4月23日版。

② “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报”，第3号，1871年4月16日版。

昂利·顧勒的文章則具有不同的性質，他有的时候對事件的實質和公社的任務作出了相當正確的分析。他對公社委員們說：“巴黎公社是目前唯一放射着光芒的燈塔，它給無產者指明了道路。你們這些被壓迫者的代表，顛沛無告者的代表，總之，巴黎一切生而受苦者的代表請聽，你們的事業是聖神的。你們應當拯救我們！除了你們以外，我們別無其他希望。因此，前進吧！……粉碎敵人，掃除人民前進道路上的一切障礙。……這是一個牽涉到人民生死存亡的問題；敵人要殺死人民，而人民却要活下去。……誰殺死最多的敵人，誰就是最人道的人。”^①

對於殘暴地虐殺被俘的公社社員的凡爾賽反革命分子，顧勒表示了切齒的痛恨。這種仇恨心使他要求公社採取堅決行動來嚴懲敵人。

在這方面特別值得重視的是顧勒寫的一篇文章“社會保安委員會”。顧勒與當時第一國際其他許多會員不同，那些人在蒲魯東主義偏見的影響下在公社內外反對建立擁有巨大權力的機關，顧勒卻歡迎設立社會保安委員會，並且回憶起1793年國民公會設立的同名稱的機關曾作出了多么轟轟烈烈而且成效卓著的工作。顧勒列舉了公社社會保安委員會委員的名字，並說，“他們都是在工人中負有聲望的人物，因而無疑會得到我們這個階級的最充分的信任。……這些公民的肩上負着重大的責任。我們將給予他們無限的支持。這是工人階級的義務。在我們支部里進行哲學討論的時候已經過去了。現在應該拯救巴黎！”^②

巴黎公社時期第一國際巴黎各個支部和聯合委員會在會議上進行了一些什么工作呢？我們今天手頭掌握的材料只是几份記錄，或者更确切些說，是記錄的片斷，有的甚至只是決議。因此

① 同上，第4號，1871年4月23日版。

② “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報”，第6號，1871年5月8日版。

要對這個問題作比較詳盡的答復是不可能的。根據現有的材料，我們只能舉出第一國際巴黎聯合會在公社時期生活和活動中的某些事實，說明其中個別細節。

4月12日，聯合委員會一致通過了一個具有重大原則意義的決議。決議中說：“鑒於選入國民議會作為工人階級代表的托蘭無恥地背叛了自己的事業，成了一個卑鄙可憐的懦夫，因此第一國際巴黎聯合委員會決定把他從自己的隊伍中開除出去，並請求倫敦總委員會批准這個決定”^①。

這個決議中提到的蒲魯東主義者托蘭，他仍然在充當凡爾賽議會的代表並反對公社。顧勒在一篇文章中曾把這個今天右翼社會黨人的前輩斥之為社會主義的叛徒、資本家的僕從，顧勒並且證明，公社的敵人指望利用托蘭在無產階級隊伍中製造分裂，並把無產階級引離革命鬥爭。

4月28日，伊符里和貝爾西聯合支部作出了關於開除會員約瑟夫·彼爾西科（音樂教員）第一國際會籍的決議。理由是，彼爾西科有一個多月沒有參加支部會議，並在公社選舉時作出了違背巴黎聯合會決議的行為^②。

5月9日卡里耶爾支部通過的決議也是很有意義的。這個支部希望公社就實行“非教會的、初級的和職業的、義務的和一律免費的教育”問題通過法令^③。這個決議無疑促進了公社為了大力改革國民教育而進行的鬥爭。

5月3日巴黎聯合委員會作出了一個重要決定：派出一個由五個會員組成的“建議委員會”，長駐在市政廳，“作為聯合委員

① “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報”，第3號，1871年4月16日版。

② “巴黎圍城時期和公社時期在巴黎舉行的第一國際正式會議”，第170頁。

③ “巴黎圍城時期和公社時期在巴黎舉行的第一國際正式會議”，第179—180頁。

会和公社的联系环节”，“并把巴黎各支部的工作总结送交公社审查和批准”。决议还规定，“建议委员会”的委员应在联合委员会的每次会议上报告工作，并可以随时被撤换。当选为“建议委员会”委员的是顾勒、阿美（联合委员会会议的书记）、诺斯达克、马尔腾和康巴^①。5月10日又加了两个委员——阿尔曼·列维和博歇尔^②。这次会议上还决定，委员会将暂时在社会事务部大厦举行会议（附带说明一句，公社的劳动和贸易委员会也设在这里，而从4月26日以后，劳动调查和组织委员会也设在这里）。

5月20日的一个文件中表明，联合委员会的“建议委员会”最后是设在科尔德里广场6号，即联合委员会的所在地。“建议委员会”的书记暂时由诺斯达克担任^③。局势的发展使得“建议委员会”没有能展开自己的活动。

5月15日，公社委员中的蒲鲁东“少数派”在泰斯的主持下在邮政局大厦举行了一次派别会议。会上通过了宣言，抗议布朗基—雅各宾“多数派”的行动，指责设立社会保安委员会，说它似乎是一个破坏民主原则的机关，并且声明他们将不再参加公社的会议^④。“少数派”的宣言次日刊登在报上。

巴黎的革命舆论严厉谴责了“少数派”的这种分裂活动，而公社的敌人则对此表示欢迎，说这是公社衰弱的表现，是公社复灭的先兆。国民军中央委员会、各俱乐部和大部分革命报纸都站在“多数派”方面，因为“多数派”毕竟比“少数派”略为清楚地了解到对反革命分子采取坚决行动和强硬措施的必要。但是“多数派”也犯了许多错误，虽然错误的性质与“少数派”不同。

① 同上，第174页。

② 同上，第183页。

③ 1871年5月21日“政府公报”。

④ “1871年巴黎公社大事记（记录）”，第2卷，第369—374页。

第一国际会员之間在这个重要問題上沒有获得一致的意見。巴黎联合会中当时担任公社委員职务的25个会员，有15个屬於“少数派”，而10个則附和“多数派”。5月17日联合委员会决定在5月20日召开“紧急會議”来討論“当时造成的局势”^①。

預定在5月20日召开的联合委员会“紧急會議”如期举行了。會議由巴斯特里加主持。出席會議的人很多。巴黎29个支部有28个派代表出席了會議。与会的公社委員有：阿符里阿尔、泰斯、賽拉叶、雅克·杜朗、里奧·弗蘭克尔和奧斯登；預先声明不能出席的有：乔納尔、馬朗和瓦尔倫三人。

这次重要會議的記錄沒有保存下来。目前存在的只是一个簡要的報告，其中摘引了會議決議的本文（这个決議后来公布在报上）。決議总的說来是有利于“少数派”的，因为它宣布支持“少数派”提出的“审判公开和修改‘关于設立社会保安委员会的法令’第3条”的要求。关于法令的这一条，決議中說，它使得“对执行机关行动的任何监督”都成为不可能的事。但是決議畢竟沒有要求撤銷社会保安委员会。同时它着重指出，會議对公社委員所作的解釋表示滿意，并認為“指导他們行动的动机是純正的，無可非难的”。決議号召第一国际巴黎联合会中的公社委員“坚决维护工人階級的利益，全力保持公社的統一，因为这种統一是对凡尔賽政府进行胜利的斗争所極端必需的”^②。決議的这一点当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恩格斯后来在1874年写道，公社是“第一国际的思想产兒”^③。但是，由于第一国际巴黎各支部的領導者有的是蒲魯东主义者，有的是布朗基主义者，由于当时法国还不存在一个馬克

① “巴黎圍城时期和公社时期在巴黎举行第一国际正式會議”，第189頁。

② 1871年5月24日“政府公报”。

③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1版，第26卷，第373頁。

思主义的工人政党，所以第一国际巴黎联合会沒有能成为巴黎公社的真正的組織和领导核心，沒有能成为1871年無产階級革命的思想 and 政治司令部。

* * *

巴黎公社时期在巴黎20个区中广泛展开活动的監察委员会、軍团委员会等社会团体也起了巨大的作用。可惜，目前流傳下来的文献資料中对这些革命組織的活动很少反映。但是，就逐从現有資料中可以提煉出来的有关这个問題的材料也已經具有重大的意义了。

監察委员会早在1870年9月就已經产生，它当时的任务是动員一切力量来保衛被圍的巴黎并監督执行叛卖政策的国防政府的活動，因为这个政府几乎一开始就遭到人民群众的理所当然的唾棄。監察委员会的委員都是一些工人組織和民主組織的著名人物(其中包括第一国际的會員)。

巴黎投降和軍事行动结束后，監察委员会进行了改組。在1871年2月20日和23日召开的全体大会上决定立即改組監察委员会，并从它的委員中清除所有小資产階級温和分子。

監察委员会活动的根据是2月19日全体大会通过的“原則宣言”。这个宣言表明了監察委员会的無产階級性質，但同时宣言中也包含着如“政治消灭和社会消灭”、工人获得“全部劳动产品”的权利等純粹蒲魯东主义的观点。宣言声明，監察委员会將大力維護共和制度并防止一切对这种制度的侵害。委员会委員还宣布，“在巴黎城內，除了由巴黎各革命的社会主义团体的代表組成的革命公社之外”，他們不承認“任何其他政府”。“在國內”，除了“由國內革命公社的代表和主要工人中心的代表組成的”政府之外，他們不承認“任何其他政府”。宣言的結尾部分着重規定，監察委员会的每一个委員都应当將“他所拥有的全部資

財用于有利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宣傳事業”^①。

这就是1871年監察委員會作为本身活动根据的思想政治綱領。这个綱領比国民軍中央委員會和它的地方机关的綱領更为激进一些，更多地具有無产階級的色彩。監察委員會積極参加了3月18日的革命，并在公社成立后成了它在区中的一个机关。

由堅毅果斷的、忠于革命事業的人組成的第18区監察委員會工作得特別積極。委員中包括有著名的布朗基主義者費勒兄弟（沙里·費勒和泰奧菲爾·費勒，其中一個后来成了公社委員），女教師路易莎·米歇爾（英勇的公社女社員外号“蒙馬特爾紅色女郎”）。路易莎·米歇爾在回忆录中証明，“第18区監察委員會委員根据本区全体工人居民的意見在3月18日后曾坚决要求国民軍中央委員會立即进攻凡尔賽，以便消灭这个反革命的窠穴，并且不讓梯也尔政府喘息”^②。可是中央委員會沒有这么做。馬克思在1871年4月12日致顧格曼的一封信中批評巴黎公社社員的这个致命的錯誤时写道：“他們由于講良心而放过了时机。他們不願开始內战，仿佛令人髮指的敗类梯也尔在企圖解除巴黎武裝时並沒有發动內战似的！”^③

其他工人区（如巴黎第19区貝尔維爾）的監察委員會也積極展开活动。应当指出，第19区的監察委員會是建立社会保安委員會的創議者之一。在4月二十九日，根据第19区監察委員會的建議，該区第1分区（馬賽曲分区）向公社提出了請願書，要求立即設立“拥有广泛权力的”社会保安委員會，“以使用法令来巩固胜

① 波尔金：“巴黎公社和中央委員會（1871年）”，載“历史杂志”，1925年第9—10月号，第15—16頁。

② 路·米歇爾：“巴黎公社”，莫斯科—列宁格勒1926年俄文版，第76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2卷，苏联外国文書社出版社1955年中文版，第464頁。

利并保証公社有貫徹自己法令的必要力量”。請願書中指出，這種强有力的权力机关之所以有設立的必要，是因为“巴黎的处境日益严重”，“必須随着危险的增長，表現得更加坚决果断”^①。

这个請願書在4月26日，也就是在公社委員儒勒·米奧在公社会議上提出轟动一时的設立社会保安委員會的建議之前兩天，就已經登在报上为巴黎人所知悉了。在历史著作中往往对米奧在这件事上的作用作过份的渲染，而米奧則可能是在貝尔維尔区領導区監察委員會的先进工人和民主主义者的直接压力下提出这个建議的。特别是由于米奧正好是該区选入公社的委員，因此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就显得更大。不管怎样，貝尔維尔区監察委員會在这个重要問題上所起的积极作用是無可怀疑的。

巴黎公社时期，某些軍团委員會也表現得非常积极。軍团委員會是一个經选举产生的組織，它的成員由本区国民軍各营队委員會的代表(每营兩名)和駐在本区的各营全体指揮官組成。

印刷工人、社会主义者讓·亞勒曼在回忆录中提供了第5軍团委員會活动的宝贵材料。亞勒曼本人就是这个委員會的主席。根据委員會的提議，在該区实行了坚决措施来对付奸細、逃兵、投机商人、娼妓和敌視公社的僧侶教士^②。

應該特別指出的是，并不是軍团委員會的一切工作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在某些区里，公社的敌人曾利用区委員會同軍团委員會之間的爭权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

在各区里区委員會也进行了巨大的工作。第4区的公社委員亞尔都尔·亞尔奴在他的一本著名作品“巴黎公社的人民历史和議會历史”(1905和1919年的俄譯本不正确地把它譯成“巴黎

^① 1871年4月26日“社会报”。

^② 讓·亞勒曼：“一个巴黎公社社員的回忆。从街垒到監獄”，巴黎法文版，第40—50,59—61,68—69頁。

公社的人民历史”）中提供了有关第4区委员会工作的有价值的材料。亞尔奴在書中說：“第4区委员会有12个委員，他們的姓名和面貌我今天仍能記得清楚。这十二个公民在兩個月的期間內不顧疲勞，不顧時間輪流在区市政局里渡過白天和黑夜。”亞尔奴接着說：“区委员会每周在晚間开会一次，并邀請公社委員參加，以便确切地告訴他們本区所完成的各項工作，說明区内各机关的狀況，并討論本区應該进行的改革和改良方案。有一天这个区委员会的委員向公社委員提出了一个請求，要求輪流給他們24小时的休假，以便讓他們在这段時間里到前綫去就任本区的国民軍營队里同士兵們一起杀敌，同时亲自去檢查一下战士是否拥有一切必需的物品，傾听他們的意見和要求，然后把它們反映給公社”^①。这个建議說明了巴黎劳动者对公社事業的無限忠誠，它当然被採納執行了。

亞尔奴在談到被同志們推選为第4区国民軍軍团助理指揮的希列特中校时描繪了一个工人出身的公社積極活动家的光輝形象。他說：“希列特是一个家具繪画工人，……大約有28岁。3月18日他参加了第4区市政局并積極从事选举的准备工作。在公社时期，他成了軍团的助理指揮。这兩個月中，他每天24小时都在值班，夜間他和衣躺在办公室屋角的旧褥子上，他那本来就蒼白的帶病容的臉，显得更加消瘦了。他和妻子很少見面，只有在極少有的閒歇時間里，他的妻子到区市政局来在他那里躺上几分鐘。一听到警報，他总是第一个挺身而出，毫不顧惜他的疲憊不堪的身体，跳上馬站在队伍的前列，以便把本区的营队帶到战斗地点。他貢獻了自己的全部力量，不仅如此，他还惊人地消耗着

^① 亞·亞尔奴：“巴黎公社的人民历史”，彼得堡1919年俄文版，第222—223頁（引文已对照原文經過訂正。——本文作者）。

自己的生命。”^①希列特直到最后始終忠于公社的事業，他战死在公社的最后一批街壘中。公社的主要支柱，公社的積極活动家——工人們就是这样地工作和战斗的。

但是应当指出，在一个区里同时存在几个不同的权力机关和社会团体，而它們之間的职权又沒有明确的划分，使得它們在实际工作中不时發生冲突，并互相牵制。結果有时造成了不利于事業的混乱状态。公社的地方机关和国民軍中央委员会的地方机关在工作中的机构重叠現象造成了特別不良的后果，这种情况有时变成了彼此爭权。乱視公社的分子有时就鑽这个空子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②。如果存在無产階級革命政党的統一指导力量，那末这种互相牵制和机构重叠的現象是不难迅速消除和完全克服的。

* * *

巴黎公社时期巴黎劳动群众的政治積極性也表現在他們写給革命报纸編輯部和各种政府机关的大量信件中。在这些信中，他們就各种各样的、但往往是大家关心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建議、劝告和批評，因此历史学家对这些信件非常感到兴趣。

大批信件是寄給报館的。同讀者保持密切的联系，这是公社报纸的一个特色。其中“杜歇老爹报”收到的信件特別多，这张报纸的發行量达到了7万份，这个数目在当时說来是相当大的。在第44号“杜歇老爹报”上編者写道：“每天早上和晚上当杜歇老爹打开他設在印刷館主索尔涅家門口讓爱国者投稿的信箱时，

^① 同上，第224—225。

^② 例如在第17区有一个名叫弥列的人（看来似乎是凡尔赛的好細），在騙取軍团委员会的信任后，尽管在該区公社委員的反对之下，但还是窃据了軍团指揮部的重要职位（見“1871年巴黎公社大事記（記录）”，第2卷，第36，53—54頁）。

他看到信箱里塞滿了望不見底的大疊信件。這種情況使他感到萬分欣慰；因為它說明愛國者在讀他的報紙；這份報紙在人民的協助下正循着正確的道路前進。善良的公民向報紙報導了城市中發生的一切事情並提出了應該替人民辦的事項”^①。

在這些信件中，有12封信原件保存到了今天（保存在聯共（布）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研究院檔案館中），並於1933年編印在“巴黎公社工人通訊員的信”文集中。但這些信只不過是1871年巴黎“杜歌老爹報”和其他革命報刊編輯部所收到的大量信件中的極小的一部分。

具有革命情緒的公社報刊讀者在來信中都表達了這樣一種共同的精神，這就是：深信自己事業的正確，熱望幫助公社，痛恨凡爾賽分子。

有一個讀者給“新共和報”編輯部寫信道：“過去20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從那些慣說花言巧語的人那里究竟可以得到什麼。現在當工人階級掌握政權後出現了一個問題：工人階級能不能比律師先生們更好地辦事？對於這個問題，我毫不動搖地給予肯定的答復。因為同以往一切舊的政治包袱毫無瓜葛的、熱望進步和幸福的工人階級將毫無偏見地實行社會輿論所提出的一切有益的改革”^②。

“誰將獲得勝利，擁有警察和憲兵的凡爾賽政府呢還是擁有共和軍的公社？”——工人、第一國際巴黎一個支部（斯蒂文遜支部）的書記歐提恩·阿爾勃朗在4月16日給“杜歌老爹報”編輯部的信中這樣問道。他接着聲明，我寫這封信的唯一目的“是要說明，巴黎工人對凡爾賽政府抱着什麼樣的態度”。他說：“聯合起來反對公社的保皇派反動勢力想第三次絞殺共和制度，並通過

① “杜歌老爹報”，第44號，1871年4月29日版。

② “新共和報”，第19號，1871年3月31日版。

新的內战为他們中間的一个野心家开辟登基称帝的道路。共和主义者面临着重遭1851年12月慘禍(監禁、槍杀、放逐和貧困)的危險”。如果公社胜利,那就会是另一种情况,“……工厂和作坊都将开工,自由將得到保障,工作和生活的权利將得到挽救”。在信尾阿尔勃朗满怀热情地号召給予“凡尔賽匪徒”以武力反击。他說:“巴黎市民們,拿起武器!必須記住,我們要拯救共和制度。共和制度下的法蘭西將是偉大而繁榮的,而君主制度下的法蘭西則永远是頹辱而且灾难深重的”^①。

在“無产者报”刊登的一封讀者来信中,木器鑲金工克·法佛尔痛斥了凡尔賽政府和它的一些要員,特别是梯也尔。他說:“难道你們这帮惡棍真的認為英勇的巴黎人民竟会这么天真,以致一听到你們在凡尔賽宮發表的‘共和制是法国唯一可行的政体’这类演說居然信以为真?不,哪有这样的事!难道你 Фугрик^②真的認為人民会忘記你一手制造的特蘭斯諾宁街的大屠杀^③和你在議會中就里昂發生的运动所說的話^④?……不,絕不如此,人民清清楚楚地知道你的嘴臉,因此不相信你。你的那个政府無論你叫它什么都行,但實質上是謊言、罪惡、野蛮、虛偽、欺詐的淵藪,換句話說,是 Тартюф^⑤的政府”。

法佛尔表示坚信公社將战胜凡尔賽。他說:“我們所进行的正义战争將在大旗的揮舞下把各族人民解放和團結的思想傳布

① “巴黎公社工人通訊員的信”,1938年俄文版,第32—33頁。

② 这是梯也尔的渾名,無相当的字可譯。——本文作者。

③ 指1894年4月14日鎮压巴黎共和党人起义事件。——本文作者。

④ 指1834年4月的里昂起义,当时梯也尔在議會中說:“不必害怕,我們要派军队到那里去,里昂人需要受一点教訓。”——本文作者。

⑤ 这是莫里哀喜劇中的一个主人公,后来被用作伪君子、假冒伪善的人的化身。——譯者。

到最遙远的国度里。”^① 在其他工人通訊員的信中也表露出这种信心。

公社報紙的編輯部和公社政府机关收到的信中也有許多是貫穿着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的。工人通訊員对公社的主要責难是公社的行动不够果断，它在推行既定的措施上，在同凡尔赛反革命势力作斗争上，在镇压匿居巴黎的凡尔赛奸細和走狗上都表現得不够坚决。巴黎劳动者都是本着爱护与自己血肉相連的工人阶级政权的精神出發来批評公社政府的，他們热望工人政权的胜利，并为它所遭到的失敗和挫折感到痛心。例如在4月19日有一个署名儒·勃的人从貝尔維尔区給“杜歇老爹报”編輯部写信說：“亲爱的杜歇公民：我对您今天就不經公社允許就逮捕、征發和搜索私人的問題提出的建議感到非常滿意，因为这一类現象是很有害的。……因此您全力抨击这个薄弱环节是正确的；現在已經是應該使这个貧穷的公社哪怕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問題的时候了。現在已經是使它成为一个真正的政府的时候了，因为人們已經开始埋怨，說情况并不好，真是見鬼！……这样，我們把希望寄托在您的身上，希望您能像俗話所說的，給公社加一把油，督促它一下”^②。

公社对逃兵和逃避兵役义务的人沒有展开坚决斗争，也屢次遭到物議。4月6日“公社报”报导，它接到第2区居民的一封信，信中建議“解除一切不願参加保衛巴黎的人的武裝”。4月11日第107营志願兵路易·尼多給“人民呼声报”編輯部写了一封信，信中說，公社制定的关于把19岁到40岁的男子全部編入补充連的法令在第10区里並沒有执行，因为那些小業主都躲在后备連

① “無产者报”，第4号，1871年5月24日版。

② “巴黎公社工人通訊員的信”，第52—53頁。

中”^①。

工人和職員寫給革命報刊編輯部的信中也對公社沒有同逃兵展開堅決鬥爭，沒有對隱藏在巴黎的奸細和階害分子採取足夠堅決的措施提出了不少責難^②。關於這一點，巴黎勞動者也給公社政府機關寫了不少信。

值得注意的，是一個女公民在5月4日寫給當時公社的軍事代表羅塞爾上校的一封信。這個具有深刻愛國主義內容和貫穿著對公社無限忠誠精神的文件一開頭這樣寫道：“公民！一切政府的首要職責是保證本身的法令遵行；如果一個政府在這方面不夠堅決，那末敵人就會利用它的懦弱，而朋友、甚至是最親密的朋友也會感到泄氣。當前的情況就正是如此。共和主義者的優秀分子在那裡流血，而大批身健體壯的男子卻對法令毫不介意，他們不但心安理得地在干自己的私事，甚至嘲笑戰士。”這位婦女接着寫道：“我的丈夫在141營第7補充連服役，他從4月30日這個星期日起就在伊西前綫為我們的權利而戰鬥。對於這一點，我毫無怨言，相反地，到是我自己動員他這樣做的，因為這是他的天職。正因為如此，所以當我看到只有志願上前綫的人才去打仗這種情況時，心中感到非常難過。懦夫和逃兵們都逍遙法外不受懲罰。”^③

斯大林指出：“巴黎公社社員對待凡爾賽派太溫和了，因此，馬克思當時有充分理由責備他們。他們因為自己態度溫和而付出的代價是：當梯也爾攻進巴黎的時候，數萬工人被凡爾賽派槍

^① 參看1871年4月11日“人民呼聲報”。

^② 參看“自由巴黎報”，第37號，1871年5月13日版（蒙馬特爾區第32營國民軍戰士的來信）；“復仇者報”，第30號，1871年4月25日版（“老共和黨人”的來信）以及其他等等。

^③ 道班：“巴黎公社時期的社會背景”，巴黎1873年法文版，第205—206頁。

杀了。”^①

巴黎劳动者在许多信中批评公社委员对敌人过份温和的态度。在5月1日的公社会议上，费勒提出了第18区居民的请愿书，居民们坚决要求公社采取严厉的措施来回答凡尔赛分子在貝尔—艾平对4个被俘国民军战士的野蛮折磨和虐杀。费勒在提出这个请愿书时指出，凡尔赛分子的残暴在全区居民中激起了无比的愤怒，因此我要求把请愿书转交给公社司法委员会。

两星期后，在5月17日的公社会议上，鉴于凡尔赛分子野蛮地屠杀了国民军的女医务人员，决定立即执行4月5日通过的关于在凡尔赛分子枪杀一个被俘的公社社员时，杀掉三个被押的人质作为抵偿的法令^②。但是就连这个决议也没有切实执行。只是在公社存在的最后时期，当凡尔赛军队在巴黎大街上枪杀成千被俘的公社社员时，才根据里哥、费勒和公社某些其他领导人的命令枪毙了公社当局当时拘押的几十个反革命分子。

巴黎劳动者也非常关心加强革命首都的防御能力的问题。1871年4月12日“复仇者报”披露了公民辛斐朗和基尔—普蘭南寄给该报编辑部的信。信中指出，奥泰伊尔车站附近的哨兵有时偶然地把隐蔽在地下的穴门大炮暴露了出来，因此建议军事当局检查一下巴黎的整个防御工事地带^③。

有一个“伏齐拉尔的居民”写信给“公社报”总编辑抱怨说：“炮兵缺乏领导”。“我们的堡垒里配备有重炮和远射程炮，可是它们却没有使用。它们能够摧毁那些轟击伊西和凡夫的凡尔赛炮台，因为它们的射程要比炮台大炮的射程远3公里。这样，伊西炮台就会没有什么事可做了，因为我们城堡里的炮台能大大地

① “斯大林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01页。

② 参看“1871年巴黎公社大事记（记录）”，第2卷，第388页。

③ 参看“复仇者报”，第14号，1871年4月12日版。

減輕它的負擔”^①。

另一個讀者在4月25日給“公社報”編輯部的信中提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軍事機關不利用塞納河艦隊的炮艦來保衛巴黎。“其實這些炮艦能大大地幫助我們反擊皮佑多、庫爾貝華、涅伊、培根的炮台。我們光榮的水兵由於指揮官的庸碌無能竟身不由己地整日無事閑蕩”^②。公社的軍事機關採納了這個建議，後來利用了塞納河艦隊來從事防衛工作。

革命巴黎的勞動人民在遇到使他激動或憂慮的事情時，都寫信告訴公社的報紙。工商企業的職工會寫信給報紙編輯部，控訴雇主的迫害。4月5日蓬一努凡爾林蔭大街一家啤酒店的兩個職員來信說，他們被雇主辭退了，那個雇主公然揚言：“我不能容忍在我的職員中有一個擁護公社的人”^③。5月初“杜歇老爹報”編輯部收到了鐵路工人的來信，他們控訴極端惡劣的勞動條件和公司經理對他們的無止境的剝削^④。

公社報刊的許多讀者來信控告了經常發生的違反公社關於緩繳房租的法令的情況，並揭發了具體的違法者——房主、治安法官和法院執行員^⑤。

4月18日蒙馬特爾區有一個姓皮扎爾的居民來信說，巴黎工人區的許多住宅遭到凡爾賽炮火的猛烈轟擊，結果住宅中的居民不得不離開那里。皮扎爾建議征用空閑的私人住宅來安置這些無家可歸的人^⑥。這封信受到了公社當局的重視。公社政府在

① “公社報”，第42號，1871年5月1日版。

② 同上，第38號，1871年4月27日版。

③ “人民呼聲報”，第33號，1871年4月8日版。

④ 參看“巴黎公社工人通訊員的信”，第54—56頁。

⑤ 在“杜歇老爹報”的讀者來信中談到這個問題的特別多。

⑥ “人民呼聲報”，第52號，1871年4月22日版。

好些这里开始把城内炮火射击区的居民安置在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空闲住宅里。

斯大林指出，“在全世界上，只有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才不仅把自己的政治果实，而且把自己的物质果实显示给人民看了。在过去的一切工人革命中，只有一次工人革命勉强取得过政权。这就是巴黎公社。但是巴黎公社并没有存在多久。固然，它也曾企图打破资本主义的枷锁，但是它没有来得及把这种枷锁打破，尤其是没有来得及把革命的物质生活幸福的果实显示给人民看。”^①

当我们读到巴黎公社时期巴黎劳动者对自己的贫困的物质状况抱怨的信件时，应当始终记住斯大林的上述指示。当时这一类信件是为数不少的。寡妇杜蒙诉苦说，她没有能找到工作，因而无法抚养自己的两个幼年子女^②。女工罗斯—普兰斯给“杜歌老爹报”编辑部写信说，在德国人围困巴黎时期，我“一贫如洗，既没有钱，也没有工作。……衣服襤褸不堪，把一切仅有的东西：衬衣、床单、有的时候十分需用的黑披巾、外衣……都送进了当铺。”“我知道，我们光荣的公社有许多事情要做，但是满足人民的需要也不容延缓。……请您让我们来招贴共和国的传单吧，我们不怕给炮弹击斃”。这一位妇女还要求把穷人典押在当铺中的东西无偿地归还给他们^③。

5月6日，公社真的实行了这样的措施；失业女工罗斯—普兰斯的呼声已被公社当局所听到了。

许多信批评了公社的财政政策，并要求对法蘭西銀行这个

①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647页。

② “复仇者报”，第29号，1871年4月27日版。

③ 参看“巴黎公社工人通讯员的信”，第25—26页。

“反动派的基地”^①采取坚决措施。有一个国民军战士的寡妇在给“人民呼声报”编辑部的信中提出了一个问题，要求不但给国民军战士的妻子、而且给他们的守寡的母亲发津贴，因为“她们非常需要这种津贴”^②。但是这一项措施没有能实现。

公社报纸编辑部收到的许多来信着重指出了革命的巴黎同外省建立联系的重要性。不少信认为必须向凡尔赛士兵解释这场战争的真实性质，以便把他们吸引到公社方面来^③。有一位读者建议从氢气球上散发传单，向凡尔赛军队士兵解说巴黎的实际状况和“共和政府较之以征兵制为基础的君主政府的优越性”^④。

同教权派作斗争的问题在读者来信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4月27日伊丽涅·道奇耶给“杜歇老爹报”编辑部写了一封很有意思的信，其中有一段如下：“杜歇老爹，现在您不是不知道，所有那些神父都在法国各地的小公社里因巴黎公社颁布那个曾使您感到十分满意的政教分离法令而同巴黎公社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如果农民了解了事情的真相，那么他们就不会再对公社的共和制原则和法令表示愤慨了。老爹您看，结果是怎样呢，这批判光了头的人在干些什么呢；他们在策动农民反对巴黎哩”^⑤。

上面所引的信中的这一段话不仅谈到了天主教僧侣的反革命活动问题，而且谈到了农民对公社的态度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牵涉到公社生死存亡的问题。

① 1871年4月15日“新共和报”。

② “人民呼声报”，第50号，1871年4月20日版。

③ “复仇者报”，第11号，1871年4月9日版。

④ 同上，第54号，1871年5月22日版。

⑤ “巴黎公社工人通讯员的信”，第190页。

斯大林指出：“法国1848年革命和1871年革命所以失败，主要是因为农民后备军站在资产阶级方面”①。

* * *

巴黎公社社员在巴黎城郊的前哨阵地和炮台中，以及后来在巴黎城内街垒中英勇杀敌的事迹，公社战士坚决保卫自己的工人政权并抵御残暴的凡尔赛反革命匪徒的事迹，不但从公社的参加者和朋友的口中传出，甚至连公社的最凶恶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燕妮·马克思在4月18日致顾格曼的信中说：“就连一贯忠于职守、尽力污蔑巴黎无产者的伦敦报纸如今也只得承认，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看见过比他们更英勇无畏地为原则而战斗的人”②。

5月10日第5区59营11连战士给公社的决心书中写道：“与其忍辱为奴，不如洒血牺牲！”③这个口号同1940——1944年法国游击队的口号“与其苟且偷生，不如光荣战死！”的口号是一脉相传的。

巴黎公社社员抗击凡尔赛反革命势力的两个月武装斗争史中，充满了革命首都保卫者的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公社委员赛拉叶在4月12日给住在伦敦的妻子写信说：“我无法描述走上前线的国民军的激昂情绪”④。从前线写给革命报刊编辑部的信中报导了公社战士英勇顽强的战斗事迹。梅奥门炮台保卫者的无畏精神曾被当作神话传诵一时，这个炮台的司令柳卡上尉给“公社报”写信道：“我们经受住了敌人向涅伊桥头堡垒的炮火射击。……孩子们都表现得像大人一样。13岁半的欧仁—列昂·瓦克

① “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4页。

② “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国际”，第190页。

③ 道班：“巴黎公社时期的社会背景”，第171—172页。

④ “巴黎公社时期的第一国际”，第188页。

西維尔虽然左手受伤了，但仍在前哨陣地的一門炮上帮忙。17岁半的路易·方坦、17岁的奥斯卡尔·繆勒和18岁的昂利·雅克都以罕有的勇气經受住了炮火的考驗。小希尔曼被炮彈炸伤了，但仍同他父亲一起在一門炮上工作。我也不能漏掉237营战士爱弥兒·顧昂公民，他不顧身上的伤势，已經連續四天守在大炮旁不願离开。我們这里大家齐心协力，每一个人都激励并鼓舞旁人。我們全体决意为偉大的自由事業而肝腦塗地。

P. S. 水兵多蘭治同国民軍战士列奈一样，是一个百發百中的神槍手”①。

兒童也不稍遜于大人，他們同大人一样創造了英勇無畏的奇迹。5月15日公社的報紙刊登了一个表揚的命令：“第6軍团司令下令表揚115营的兩個少年战士杜南兄弟——恩斯特·杜南14岁，菲里克斯·杜南17岁。這兩位少年在进攻伊西公园时表現了偉大的鎮定。在相距100公尺的情况下，他們經受住了凡尔賽分子一个多小时的炮火射击，接着他們同第1連的同志們一起冲锋，夺得了穆里諾堡壘；这件事發生在5月9日星期一。当弟弟恩斯特在堡壘頂上插上营旗时，被子彈击中牺牲了。菲里克斯立刻跑上前去想拿回軍旗和弟弟的尸体，不幸在堡壘前也中彈扑地。這兩位少年英勇牺牲了。他們的父亲虽然万分悲痛却没有掉淚，他紧紧地握住槍杆，要为自己的兒子报仇。……

第6軍团司令康巴特茨”②。

另外还有一个文件也証明了巴黎劳动者在公社存在的偉大日子里的熾热的爱国主义。这就是5月16日国民軍177营战士奥古斯特·茹浪給“国民軍事代表”德列克留斯的一封信。信中說：“公民：請原諒我給你写这短短的一封信，同时請不要拒絕我的

① 1871年4月12—13日“公社报”。

② 1871年5月16日“政府公报”。

請求。我有三个兒子在国民軍部队里服务；長子在197营，次子在126营，三子在97营；我自己則在177营。但我还有一个小兒子，他快滿16岁了；他一心想参加某一个营队作战，因为他已經向我和他的哥哥們宣誓，要拿起武器来保衛我們年輕的共和国，不讓凡尔賽劊子手們侵害。我們相互之間已經約定，并彼此起誓保証，当我们中間的一个人被敌人的子彈打死时，其他的人將对这帮杀害兄弟的凶手复仇。公民，請接受我的最后一个兒子；我全心全意地把他獻給共和国，獻給祖国；請你随意安排他吧，請你自己决定把他安插在一个营队中吧，这样，你就給我帶來了最大的幸福”①。

巴黎妇女大批参加保衛公社的英勇斗争也在1871年無产階級革命史上写下了最光輝的一頁。

当时的人都証明了巴黎劳动妇女在保衛公社的战斗中的表現的惊天动地的英勇事迹。1871年的革命報紙中經常提到在敌人的炮火下英勇無畏的妇女——女看护、女医务人员、女随軍商販和女战士的名字。1871年4月初，一家公社的報紙报导：“66番的随軍商販拉希斯女公民是一位英勇無双的妇女。她应当受到巴黎的感謝，而我們非常荣幸能够对她表示这种感謝。这一位人民的勇敢的女兒連續三天在夏基里昂平原不倦地战斗，同时又給予那些被凡尔賽宪兵击中的战士以最迫切需要的帮助。她既是战士，又是医生！真是一位英勇的妇女！她的血管里流着獅子的血！”②

由于沒有統一的無产階級的革命政党，公社沒有能充分利用巴黎無产者的这种革命英雄主义。同时，不建立正規的軍事机关，要充分利用这种英雄主义也不可能。公社的文件（包括公

① 1871年5月17日“政府公报”。

② 1871年4月8日“人民呼声报”。

社会議的記錄)都証明, 它的軍事机关工作得很差, 許多行政机关和軍事机关內部乱七八糟, 公社軍事委员会和国民軍中央委员会在工作中机构重疊、互相牽制对巴黎的防衛造成了極坏的影响。

5月21日, 武裝到牙齿的凡尔賽軍隊一万多人突破了大炮轟开的巴黎城牆缺口冲进了巴黎(这个地点是潜伏在城內的梯也尔的大批奸細中的一个指点給凡尔賽軍隊的)。但是凡尔賽分子化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時間才把公社社員的反抗压倒。

根据公社的命令, 巴黎全体劳动居民一致奋起保衛革命首都。在城市的街道上和廣場上筑起了成百的街壘。工作日夜不息地进行, 除了男子以外, 还有妇女和兒童参加。

英勇的公社保衛者坚守每一个陣地, 直到流尽最后一滴鮮血。

但是, 缺乏統一的無产階級革命政党, 在这些日子里产生了特別有害的影响。德列克留斯在5月21日發出的傳單起了極坏的作用, 因为这个傳單認为建立集中統一的軍事領導是沒有任何意义的, 它盲目崇拜自發的街壘战。

尽管如此, 凡尔賽分子要前进进一步都得付出極大的代价。

同少年人、成年人并肩作战并为了公社而英勇牺牲的还有老年人——工人运动的老战士。例如亞勒曼就曾提到他們中間的一个人說:“有人告訴我, 凡尔賽分子正循着烏尔姆大街挺进。我立即帶上四五个决心战斗到底的老兵到那里去。这些老积极分子中有一个名叫佛尔的公民, 他是一个排字工人, 在印刷所中他的綽号‘納凡’是人人皆知的。……他曾經同巴尔貝斯并肩战斗过^①, 并参加了1848年6月的战斗和1851年12月的战斗。現在

① 指1839年5月由布朗基、巴尔貝斯和貝那尔領導的“四季社”起义。——本文作者。

他肯定地說，我归天的日子到来了。凡尔赛分子运来了兩門大炮并对准了街壘直射。我們努力瞄准炮手射击。佛尔一面射击一面对我說，他再也不到別的地方去了。……‘如果你倖免遇难，我的年青的朋友，那末不要忘記告訴一切向你問到納凡的同志們說，他像一个老革命者一样地在战斗中牺牲了。’他在說这几句話时，臉上帶着笑容，真是一个善良的老工人！”过了几分鐘后，炮弹把这位革命斗争的老战士炸得粉碎^①。

就連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最凶惡的敌人，凡尔赛军队的总司令麦克一馬洪元帅也不得不在国民議會調查委員會的會議上說：“叛乱者的情緒十分激昂。有些人以难以置信的毅力頑強战斗。也有一些人手中握着紅旗倒在街壘旁。看来他們認為为巴黎的独立而战斗是他們的神聖义务”^②。

据路易莎·米歇尔的証明，在1871年5月的日子里有一万个妇女在公社的街壘里战斗^③。在某些据点里（不过数量不多），公社社員的抵抗是很有組織的，而且坚持了相当長的时间。这种胜利地进行街壘战的例子之一就是公社委員勃留奈尔上校指揮下守衛协和廣場的国民軍部队的行动。5月22日，勃留奈尔在廣場西北面的各个入口处筑上了街壘，并在廣場上修起了三座強大的多面堡壘，从而掩护了自己的兩翼。勃留奈尔率領数百勇士和12門大炮坚守这个障地整整50小时，击退了近兩师敌兵在60門轟击廣場多面堡壘的大炮的側面掩护下的瘋狂进攻。

駐守在塞納河左岸天文台地区的公社营队在巴黎公社的一个杰出活动家工人瓦尔倫的领导下在兩天内以非凡的頑強精神巧妙地击退了凡尔赛分子的进攻。

① 亞勒曼：“一个巴黎公社社員的回忆。从街壘到監獄”，第124頁。

② “議會对1871年3月18日起义的調查”，巴黎1872年法文版，第2卷，第25頁。

③ 參看路·米歇尔：“公社”，第141頁。

在公社存在的最后日子里公社保衛者武裝斗争的一段最可歌可泣的事迹，就是符魯布列夫斯基將軍指揮下的部队在5月24—25日給予敌人的頑强抵抗。符魯布列夫斯基率領3,500士兵抵御了凡尔賽軍几乎整个第二軍团的进攻，堅守陣地36小时。

5月28日，巴黎公社的最后一批街壘陷落了。資產階級反革命势力兴高采烈地庆祝他們血腥地扑灭了仇視他們的短衫汉的起义。在法国的全部内战史中从来没有看見过战胜者对战敗者实行如此殘酷的虐杀，从来没有看見过如此駭人听聞的暴行。約有3万巴黎人民的优秀兒女不經审判就遭到虐杀和槍斃。如果把槍杀的、監禁的、流放的、驅逐出境的、被迫亡命国外的人都計算在內，工人的民主巴黎約丧失了10万多人。

在貝尔—拉希斯公墓發生了一場最后的决战，殘酷的战斗进行了两个小时。堅守貝尔—拉希斯公墓的2百个公社社員大部分在战斗中壯烈牺牲了，余下的一些被俘人員也在墓地的一堵牆前全部被槍杀了。

甚至公社的最凶惡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認，被俘的公社社員昂着头，唱着“馬賽曲”，高呼“公社万岁！社会共和国万岁！”的口号从容就义。

公社社員在敌人的軍事法庭的被告席上也表现了英雄气概，堅毅不屈。下面是費勒在法庭上的一段發言：“作为巴黎公社的委員，我落到了它的战胜者的手里。他們要我的头，——那末讓他們拿去吧。我絕對不会作出卑鄙無耻之事以求苟且偷生！我活得自由，死得也自由。我只不过要补充一句：命运是反复無常的，我囑咐后人記住我，并为我报仇”^①。公社委員工人特蘭凱說：“我是由我的同胞派到公社里去的，我决意牺牲我的生命，我

① 科斯塔：“存在了的公社”，第2卷，第60頁。

曾在街壘里參加戰鬥。……我是起義的參加者，我並不否認這一點”^①。1848年6月起義的參加者、第一國際會員、公社時期政治案件偵查員、工人讓湯說：“我不想隱蔽事實，我直截了當地說，在帝國時期，我為共和國而奮鬥，而在資產階級共和國時期，我將為社會共和國而奮鬥。……現在隨便你們怎麼辦吧”。他鎮靜地聽法官宣讀了死刑判決，並就這一點說：“我的命運早就很清楚了”^②。路易莎·米歇爾在法庭上理直氣壯地說：“人家說我是公社的參加者。是的，確實如此。需知公社所追求的，首先是社會革命，而社會革命正是我的最崇高的抱負。我以我曾經作為社會革命的宣揚者而感到自豪。……對於自命為軍事法庭和自命為我的審判官的你們，我只有一個要求，這就是死，到我的兄弟們就義的地方沙多里去死。……因為任何一顆為了自由而跳動的心都只有一項權利，這就是得到一丸鉛彈的權利，因此我要求得到自己的一份。……你們要不是懦夫，那就殺了我吧”^③。

被放逐到遙遠的殖民地年復一年地在驚人惡劣的環境下受折磨的公社社員也一直堅持不屈。死亡使得流放者的隊伍不斷縮小，但他們並沒有投降。每年3月18日他們舉行集會、發表演說來紀念公社。在埋葬死去的同志時，他們高呼“公社萬歲！”

* * *

直到今天，巴黎公社社員的光榮的戰鬥傳統仍舊活在法國工人的心裡，他們每年把3月18日當作本階級歷史上最有意義的一個日子來紀念，而在5月底他們到貝爾—拉希斯公墓舉行群眾性的遊行；並在1871年無產階級革命最後一批戰士殉難的地点——公社社員牆獻花圈。

① 利薩格雷：“1871年公社史”，彼得堡俄文版，第336頁

② 1848年1月18、22—23日“法院日報”。

③ 1871年12月18日“法院日報”。

研究巴黎公社的經驗、教訓和錯誤對於推進國際工人運動起了巨大的作用。布爾什維克黨的天才領袖列寧和斯大林無論在第一次俄國革命時期或是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和蘇維埃政權在我國勝利後的時期，都仔細地研究了巴黎公社的經驗。列寧在1918年寫道：“我們是巴黎公社的後繼者”^①。

巴黎公社失敗的原因，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著作中已有十分詳盡的說明。公社沒有得到農民的支持；它在技術上和經濟政策上犯了許多嚴重的錯誤；它對敵人過份溫和；由於沒有一個無產階級的政黨，它沒有能充分利用勞動群眾的政治主動性和革命積極性。

本文所引用的事實和文件都清楚地證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一個著名原理：如果沒有統一的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切實領導，就連最高漲的群眾政治積極性也不能保證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公社時期巴黎存在的各種各樣的社会團體，由於沒有一個強大的無產階級的政黨把它們聯合起來並克服它們綱領和行動中的分歧，因而各自為政，互相牽制，並且不能經常很好地進行工作。這就是這些團體工作中的薄弱方面。

斯大林着重指出，1871年革命的主要弱點在於這次革命的領導是“由兩個黨分担的，而其中哪一個黨也不能稱為共產黨”^②。正因為如此，所以1871年的公社雖然是無產階級專政，但是，如斯大林所說的，“是不完全不鞏固的專政”^③。列寧指出：“要進行勝利的社会革命，至少需要具備兩個條件：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和無產階級的準備程度。但是在1871年，這兩個條件都不具備。法国的資本主義還很少發展，而法國當時主要是一個小資

① “列寧全集”，俄文版，第27卷，第109頁。

② “斯大林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3頁。

③ 同上，第8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46頁。

产阶级(手工業者、农民、小業主等)的国家。另一方面,沒有工人的政党,工人阶级沒有准备,沒有受到長期的鍛煉,其中大部分甚至还没有清楚了解自己的任务和实现任务的方法”^①。1871年的巴黎無产阶级絕大部分是在小作坊中工作的工人,只有一小部分(約1/8)是在大工業企業中工作。因此,在巴黎劳动者中間蒲魯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十分强烈,这种思想对于公社的生存和活动造成了極不良的影响。由于所有这些历史原因,1871年的巴黎公社失敗了。但是無产阶级的事业并不会灭亡,资本主义繼續發展的过程必然会使無产阶级进一步發展,使它的斗争进一步加强。斯大林指出:“正因为無产阶级是个發展着的阶级,所以馬克思主义者也就指靠着無产阶级。而且他們並沒有弄錯,因为大家知道,無产阶级后来已由一个不大的力量發展成了历史上和政治上头等重要的力量”^②。公社的事业已經在我国获得了胜利。它一定会在全世界获得胜利。

(李嘉恩譯自“历史問題”杂志,1951年第3期,第3—31頁)

①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17卷,第113頁。

②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44頁。

从孤单的独唱到雄偉的合奏

——紀念巴黎公社73周年

盧 燕

远在1892年巴黎公社的21周年，恩格斯曾經說过：“人們以为已經被遺忘的公社，以为已經被永久毀灭掉的公社——它存在于我們中間，而且比在1871年增加了二十倍。”距离恩格斯講述的时间已經五十二年，距离公社的誕生則已經七十三年；尽管时日流駛，岁月遞嬗，但我們仍有着足够的根据宣称：公社存在着！因为它正激励着我們作新的斗争。

从公社存在的七十二天，从这一次革命人民震蕩全歐的历史行动中，我們將要汲取一些甚么样的教訓呢？科学社会主义的創始者，十月革命的領導人，对于公社的意义都有过極为精当的評价；尤其是列宁和斯大林更把公社的經驗光輝的运用在十月革命中。馬克思認為：“工人階級反对資產階級及其国家的斗争，因巴黎的斗争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不管其直接結果如何，一个有世界历史重要性的新出發点是已經取得了”（“法蘭西內战”）恩格斯更說明了巴黎公社就是“無产階級專政的樣子”（同書，引言）。这些論斷的精確，使得后来的每一次革命經驗都只是証明了，他們的意見是如何忠实的反映了公社的斗争，他們对于公社斗争如此卓越的理解，对于事变如此明徹的洞察。一般的来复述他們对公社的意見，或者是概略的来叙述斗争的經驗与教訓，都显得是累贅而多余的事情。这里准备从斗争的經驗与教訓中抽

取出一点来作較詳盡的考察，虽然还不能反映全面的斗争，但就从这些地方，我們也同样可以获得很多新的啓示。

一

“只有在农民群众加入無产階級底革命斗争的条件之下，無产階級才能成为在为民主制而奋斗中获得胜利的战士。”(列宁：“两个策略”)

当梯亥尔为首的国防政府正蓄意挑起反革命的国内战争，企圖把偿付給普魯士的五十万万法郎的軍費，轉嫁在中小农民的身上，公社在第一次的宣言上面就宣称：战争的負担，应当由它的真正罪人来担当。公社要解放农民的“血租”，給他們以廉价的政府，要除去乡村里面的乡警，宪兵与公所的專橫，廢除教会对人民的稅收，用选举出来的对公社負責的，雇佣的公社官吏去代替那些吸血鬼——公証人，律師，法官之流，公社的这些号召，是完全符合于农民的需要与要求的，过去像惡魔和瘟疫样威压着大家的，公社正为他們解除着。

除了这种切合农民利益的号召外，当时的法国还有着公社与农民結合的有利条件。在波拿巴当政时繁重的賦稅，城市的高利貸，法国的农民已經在“农業底累进的惡化与耕种者底累进的負債”下愈益革命化，正企圖冲破他們的社会生存条件。过去对拿破侖所存的怀念和幻想，在第二帝国的統治下，已經很快的消失掉。这一些条件都应该使得法国农民更广泛的起来，响应公社的号召，用行动来配合公社的斗争。但考察当时的情形呢？我們只看到里昂，馬賽，吐魯士(Toniouse)納勃(Nabonne)这些城市响应了公社的斗争，却很少看到当时农村对公社的声援。巴黎的革命人民也始終是作着光荣的孤軍苦战。

当时的法国，客观的环境既有利于工农的结合，而且公社自始即发出有利于农民的号召；甚么力量阻止了这种结合呢？

恩格斯在分析到当时公社的两种领导力量时，曾指出勃朗基主义者因为向来就受教育于阴谋派学校，主张少数坚决英勇的先鋒队底阴谋行动；所以他們不去进行团结，组织，武装，教育，训练广大工农群众的艰苦工作。至于普鲁东主义者，他們反对政治，他們反对革命政权，他們反对组织，他們以無政府的空想引导工人阶级，阻止了工农的坚强联合。当时公社的斗争，大部分是根据于革命群众的無产阶级的本能。因为当时的领导者，沒有正确的路綫，不能正确的领导工人阶级；尽管有适合于农民要求的号召，却無法造成工农坚强的联合。

除了领导的錯誤以外，阻止公社与广大的农民群众相结合的还有客观的緣因；法国的“地主們很知道，如果公社的巴黎能同外面各省自由传达消息，那末只要三个月，就会引起全体农民的起义。所以他們如此怯懦地急于用警察来封锁巴黎，以阻止傳染病的散播。”（“法蘭西内战”）这种封锁自然是收到了他的效果，因为缺乏各地的响应与声援，梯亥尔就能够从容的镇压里昂，馬賽的革命，并且有充分的余裕讓他們聚集力量，来摧毁公社的巴黎。

停留在这些叙述，似乎还不够說明全部真象；尤其是对当时的法国农民，他們的生活条件，革命的要求和革命化的程度，他們对于公社的态度……为着进一步的探索这些問題，我們就不能不追溯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他們的处境。

封建制度的森严統治下，农民和广大民众受到沉重的压迫，加上封建反对欧洲的干涉……在这样的基础上爆發了法国大革命；因此，它进行得那样尖銳，那样广泛与深刻。恩格斯說这是“第一次实行斗争到底，直到交战的一方（贵族）被消灭，而另一

方(资产阶级)完全胜利。”在1789至1794年，尤其是在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时期，彻底的推翻了封建制度，消灭了农奴制度最后残余，将土地交给农民。1793年6月，山嶽党人取得政权时，就会以法令宣布：一切的公共土地分属于居民的全体或公社的全体；每一公民包含农村的劳动者及在公社一年的人，同样有分受土地之权，十年之内分给每个农民的土地不得因债而被没收。稍后又颁布法令取消旧日领主的征收，旧时保留底特权，毫无代价的取消；一切已被废除的地契，应当销毁。旧时髒污已一扫而清，法国的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所有者。“大革命中，法国破毁了封建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的统治；其古典的纯粹性，是欧洲任何其他的国度所不能比拟的。”（“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恩格斯序文）。

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专政，依据革命的民主主义用急速，坚决的方式，向着自由的农民所有制转移；乡村的土地，分成一个个小的单位，农民可以不受阻碍的在取得的土地上从事生产；使得他们过去寤寐求之的愿望得到满足，这种小块土地的所有制，长期的在法国的乡村里生了根，在19世纪初，这种所有形式曾是法国农村解放和富裕的条件。一直到路易·腓力普（Louis philippe）王朝的末期（1830——1848），法国总人口三千五百万中，城市人口仅九百万，其余二千六百万均为乡村居民，约占全法国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一直到1870年后，这种比例才有了显著的变化。城市的人口逐渐增多，农民所占的比例相对的减少。

但我们如果仔细的研究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可以看到，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并不是使所有的法国农民都得到土地；他们把封建的土地，给予农民为自由财产，造出一个小资产的农民阶级，但农村的无产阶级却仍旧存留着；农村的无产者，既然存在，并没有取得土地，自然只能继续出卖其劳动力以维持生活，虽然

他們對革命的要求比較強烈；但因為大部分農民取得了小塊土地，就使得法國農村維持了比較長期的穩定。

小塊土地的所有制，曾使得到土地的農民更堅決，更徹底地從事革命鬥爭，這就使得封建制度失掉它底賴以支持的力量“小塊土地的分界石成為資產階級抗御其舊日統治者任何攻擊之自然堡壘”（“拿破侖第三政變記”）。小塊土地上耕種的生產方式，規定了法國農民的基本特性，在劃分的土地上，雖然他們生活於相仿的狀態中，但相互之間，卻沒有複雜的關係。當時法國交通條件的困難，更加深了他們的隔離。他們耕種的是小塊土地，自然用不着甚么細微的分工與科學的管理，更無法使科學應用在生產改良上。在這一小塊土地上固定着農民和他的家族，另一塊土地上，固定着另一農民與他的家族，每一塊土地都像和整個的法國隔絕起來，他們也就活動在這一塊劃定的天地里。憑借他們自己的勞動力，直接生產出消費品的一大部分；他們自身所需的生活資料，不是從社會交換中取得，而是得自與自然的交換。馬克思曾說：“法國民族的主要群眾，是由相同的數量簡單加起來的，好像馬鈴薯一袋是由袋中的馬鈴薯所構成的樣。”（“拿破侖第三政變記”）。在這種个个馬鈴薯湊合成的農村中，他們中間僅有地方的關聯，並沒有在相仿的生活中形成一種共通的利害關係，也沒有使他們由分散的個體變成一種凝聚的整體；自然更沒有構成一個階級。

小規模的經營與土地的分散，限制了農業生產力的提高；農村里資本主義的發展顯得非常遲緩。過去熱誠於革命的農民，現在已經變得保守，自私，因為他們生怕失掉得來不易的土地。路易·波拿巴就利用法國農民的保守，和他們對於“拿破侖固定的所有形式”的懷念，在1848年12月的選舉中獲得了勝利。馬克思曾說這次選舉是“農民對於國內其他階級的反應，是農村對於城

市的反映。”这就使得“那个平庸而不像样的人物可能扮演一个英雄的角色”。波拿巴虽然利用农民对拿破侖的幻想取得了选举的胜利，但他能代表的也只是一部分落后的农民，不是代表农民的理性，而是代表农民的偏見；不是代表农民的将来，而是代表农民的去。波拿巴严酷的統治，很快的使得农民摆脱了对拿破侖观念的幻想。过去曾使得法国农民获得解放和丰裕的“所有制”，已經变成了奴隶化和贫穷化的法則。城市的高利貸者代替了旧时封建的領主；旧时的封建义务，被土地的抵押所代替；貴族的土地所有权被资产阶级的資本所代替。“农民的利益，已不再像拿破侖时代那样，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相协调，与資本相协调，而是与资产阶级利益相对立，与資本相对立。”

法国民族主要构成的农民，已經逐渐由过去对波拿巴的幻想中觉醒。由自私和保守轉向革命化；另外一部分企圖冲出他們社会生存条件（小塊所有地）的农民，更从城市的無产阶级身上找到他們的同盟者和領導者。因此，法国的乡村已經醞釀和激發起很多农民的反抗，虽然这种反抗多半是平庸的，呆笨的，但法国的农民畢竟开始走向斗争了。于是，波拿巴要以武力来保衛这种“物質的”制度；在乡村里普遍的依賴着宪兵，施行暴虐和卑劣的統治。这种宪兵統治的結果，使得这些未成熟的民众，受到了極大的摧殘与腐化，这不仅压抑了农民們刚开始萌芽的反抗的生机，更使得此后法国农民們的斗争变得那样微弱和迟緩。

經過了这一路来的叙述，我們回头来看一看公社的斗争；巴黎的革命人民，沒有获得广大的农民的响应，其原因不仅应求之于当时革命的領導，和梯亥尔反动力量对巴黎的封鎖；而更应当追溯到法国农民，長久的从事小塊土地上的生产，由保守和对拿破侖观念幻想过渡到意識斗争的时间底短暫；而且这种斗争初起时就受到波拿巴的镇压。因此，我們看到里昂，馬賽等城市

对公社的呼声，但我们却没有看到法国农民对公社的声援与响应。

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要争取广大的同盟军——首先是农民群众；除了西欧的社会民主党人，把无产阶级的斗争看作没有同盟，没有支援的战斗外，过去的革命斗争已经屡次地证明了这种经验。无产阶级如果不能保证与农民的联盟，就无法成为“获得胜利的战士”。公社的巴黎，却正少了这种和农民群众广泛地结合。

还在1852年撰写“拿破仑第三政变记”时，马克思曾经作过这样的预言，那时距离公社的发生虽然还是二十年以前，斗争的历史却更加证明他英明的远见：

“在对于拿破仑的王政复古感到绝望之时，农民将舍弃自己对于自己小块所有地之信仰，于是建筑在这小块所有地上的整个国家构造，也就要崩溃了。那时无产阶级革命，就得到了合唱，而如果没有这合唱；那末，在一切农民国度中，无产阶级的革命底独唱，就会变成哀歌了。”（“拿破仑第三政变记”）

二

在梯亥尔雇佣军队的铁腕下，公社的巴黎是被镇压下去了；工人阶级固然遭受到极大的牺牲，农民群众的生活也不能再像旧时的平静了；农业的恶化和累进的负债，第三共和国并没有使得法国的农民比波拿巴时代的生活好些。过去；他们紧抱住自己的一小块土地，紧抱住那分在从各方面压迫他们，威胁他们的社会中，作为他们救命的一分产业；已经逐渐失掉了对他们的魅感性。过去小块土地上生产出他们大部分的生活资料，现在由于生

产的萎縮生活变得更加惡化了。都市已經成了农民所憧憬的地方，他們夢想着都市可以使他們获得固定的工資和較优的生活。从乡村和都市人口的变动中，更可以看出这种变动的趋向。在1911年，法国总人口三千九百万中，都市人口已增至一千七百万（1840年为九百万），农村居民則减少为二千二百万。仅在1921至1926年的短时期中，农村减少了九十万人，他們都被城市和工业吸收去了。到1930年，城市的人口上升到二千万，法国人口已經被分成两个相等的集团。

一方面是农民生活的惡化，大量的往城市迁徙，一方面是資本主义的浸入农村，改变了农村的社会关系；土地愈来愈集中于少数人的手中，大田庄的总面积不断地增加，半数以上的耕地是握在这种大地主的手里。

在大地主的并吞，資本主义浸蝕下，小块土地的所有者逐漸貧穷化，变成农村的無产者，部分农民已逐漸轉化为城市的工业無产階級。就是現在的小农，也逐漸的改变了他們的保守，自私，和馬鈴薯似的散漫。这就使得农业生产者逐漸团結，农民与工人階級的团結也日益扩大与增强。

要了解农民崩解的緣因，还不能忽視第三共和对殖民地的掠夺。从1883年第三共和国的掠夺埃及起，殖民地的掠夺就成为近代法国史的重大回目，寻求殖民地的目的在于扩大国外的市場；但殖民地用甚么来偿付他宗主国輸入的工业品呢？自然只有殖民地的生产品，粮食，原料。但法国的农民虽然不断的轉化，不断的衰退，仍旧是法国的基本民众，虽然因为因襲的束縛，長期的桎梏，使技术和新的生产方法都很少改进；但就在这样的基础上也帶來了粮食生产过剩的危机；譬如1933年法国的丰收，法国自身的粮食生产量就超过了十万万公斤，从殖民地非洲又輸入了三万万公斤；虽然法国政府曾規定有較为合理的价格；但供过

于求，农民又無力使粮食長久的存儲，結果，“每个小麦生产者要从磨坊主获得优先待遇时，只剩了一种方法——这就是把价格抑得比別人更低”。这就使得农民們在粮食售价上遭到極大的損失。

資本主义把生产品出售給殖民地，获得巨額利潤，但同时又貶低殖民地輸入的粮食和原料品的价格，以加强他們的榨取；这又使得法国农民的生产品的价格和殖民地样同时被貶低，結果殖民地虽然成了資本主义財富的来源，但它又成了法国农民破产的原因，这更加促进了法国农民的崩解。

資本主义对农村的浸蝕，加速了农村的分化，使得他們逐漸向城市轉移，殖民地的榨取又加速了中小农民的衰敗和崩解；公社的巴黎虽然沒有作到和广大农民的結合，但他已經奠下了这种結合的基础；未完的任务留給了公社的子孙。透过了农民的分化与崩解的画圈，我們已經預見到这种雄偉合奏的前景。

三

为着惧怕公社在广大的法国人民中間获得声援，梯亥尔封鎖了战斗的巴黎；为的是“阻止傳染病的散布”。

因为惧怕战斗的革命群众，梯亥尔要解除“巴黎的武裝”，帶着淫虐与凶殘，用大炮去轟击巴黎，法蘭西真正保衛者。同时又用那抽掉了脊椎骨的背去向着战胜的普魯士軍隊。他們向俾士麦的軍隊屈膝哀求，簽訂屈辱的投降和約，宁願割讓亞尔薩斯和勞倫兩省，賠償五千万万法朗的巨額軍費；但却不願意相信人民，武裝巴黎的劳动群众，真心的保衛法国，保衛巴黎。在他完成了出卖法国的任务之后，第一椿急于要作的事情是要鎮压公社的革命群众。他們感到“巴黎工人武裝一天，有产階級——大

地主与资本家——的统治就一天要受到危险。”（“法蘭西内战”，恩格斯引言）。

历史在梯亥尔这一类法蘭西的叛徒身上已經釘上了耻辱牌，任隨怎樣的祈禱，都不能使他們得到人民的寬假。但對於梯亥尔的子孫——人民面前的暴君，敵人面前的軟骨虫，历史的鞭击似乎还没有使他們清醒过来。1940年的魏剛，賴伐尔都还在重复着梯亥尔的古智；出賣法蘭西但又不能不裝幅欺騙法國人民的咀臉。他們宣稱：“我們不能讓法國落在共產黨手里，這是我們對國家的責任。”（引自安德烈·西蒙：“誰出賣了法國”，時與潮社譯本）帶着他們詭辯的飾詞，他們使法蘭西再一度受到屈辱与奴役；他們沒有忘記他們祖先梯亥尔干过的勾當，轉而鎮壓那不甘屈辱的人民，帶着罪惡与血污的双手，充當着希特勒絞刑吏的帮凶。

远在1871年，巴黎的工人階級和革命的人民就以無限的忠誠，保衛着巴黎，保衛着法蘭西。在1870年9月2日波拿巴在色當被普魯士的軍隊戰敗后，巴黎的人民就于9月4日推翻了第二帝國，宣布成立共和政府。巴黎的民眾所以容許資產階級取代政權，就是以他們保護法國為條件的。當時的革命領導者勃朗基曾說：“敵人當前，不能有黨派，也不能有紛歧意見。”他甚至以“祖國瀕危”作為他的機關報的名稱。就當時的法國言固然顯示巴黎工人階級還沒有高度的覺悟；但另一方面却充分表現巴黎的工人階級是真正為保衛自己的祖國而戰的。在人民熾熱的鬥爭情緒下，梯亥尔為首的國防政府也不能不“言不由衷”的喊着要抵禦外侮；但他們真心要作的不是抵禦外侮，而是挑動內戰，去阻止真正的工人階級的運動。面對着梯亥尔這種詭詐的陰謀，“巴黎的無產階級，看到統治階級的失敗与叛變，知道他們應該起來，將社會事務的管理權拿到自己的手里以拯救國家的時間已

經到来了……他們懂得他們有至高的責任与絕對的權利来做他們自己命运的主人翁，并把政权拿到自己的手里。”（“法蘭西內战”）。历史曾經不止一次的証明过，只有广大的劳动人民，才是保衛祖国的决定力量，才是忠誠不屈的战士。

被貝当，賴伐尔出卖后的法国同样的証明了这一点。在希特勒和維琪政府的虐杀与追踪下，法国工人階級的党是最先揭起反抗的旗帜；向一切劳动人民，向一切繼續忠实于爭取进步自由的英勇傳統的人民，發出了战斗的号召。流行在法国人民中的共产党宣言，有过这样的一段話：

“在目前严重的困难，恐怖和痛苦的时候，共产党人和过去一样，在任何情况之下和人民站在一起。人民的命运即是我們的命运。我們对于我們人民的力量和前途，抱着無限的信心。我們的人民是不能被摧毀的。卖国賊，投机者，劫掠者和征服者的黑暗势力，决不能破灭我們人民爱好自由的精神。”

由于梯亥尔的封鎖，由于法国农民長期受到波拿巴的鎮压，由于工人階級还没有坚强的领导的党，七十三年前的公社因为势單力薄的孤軍苦战而失敗了；但历史不会重复，貝当，賴伐尔虽然襲用梯亥尔故技，簽訂他們的卖身契，但今天的法国工人階級，法国的人民已不再是可以被封鎖，被禁錮孤軍苦战的公社战士了。

如果七十三年前公社的巴黎还只能有“深受陰謀教育”的勃朗基，小农与小手工業的社会主义者蒲魯东为领导的話，今天法国工人階級已經有組織严密，领导坚强的政党在领导他們了；在地下活动中，它是唯一保存了組織機構的政治团体，在灾难深重的法国人民中間它是希望与信念。如果七十三年前公社的巴黎得到的是普魯士对梯亥尔的暗地支持，幸灾乐禍的观望；欧洲

其他国家的疑恨与反对；在今天，紅軍的胜利已經是法国人民的支援，同盟国的援助也使法国人民的胜利获得更有力的保証；今天，加萊和多佛海峡虽然还是“水波不兴”，但不久間来自西方的桅檣，將帶給希特勒暴君，貝当的奴才統治以死亡的命运。更重要的是：今天法国的工人阶级已經不是孤單的独唱，而是雄偉的合奏了；在希特勒的魔手下，法蘭西的爱国人民分嚐着共同的苦难，在共同的斗争中，已把反抗的力量匯集起来了。法蘭西人民的斗争已在不是七十三年前样的势單力薄而是波瀾壯闊；法国工人的怠工，罢工，破坏，已經成为帶有極大的流行性与群众性的运动，游击运动更是野火燎原地發展起来，工人们成群的参加了游击队，农民們为反对占领軍的需索，拿起了槍杆，知識分子們，爱国的資产者……都参加到游击队，“这些輝煌的男女志士虽然职业不同，出身不同，但他們的秘密軍队正在这时候重新締造着爱国团结”。到去年秋間，已經有十五到二十万組織严密的游击队，自有情报和軍事組織。他們不但是一支龐大的队伍，而且有着坚强的組織：“法国各游击队伍已成立中央組織，处理人員之訓練及奇襲之計劃，出版报纸，并發布每日公报”。

这种强大的斗争力量，这种广泛的团结；使我們有充分的根据相信，旧的法蘭西在污濁的血腥中瓦解了，但新的，民主的法国將会像涅槃的鳳凰样，从烈火里新生。摩利斯·多萊士已經明确地肯定了这种自信：

“我們知道战斗是艰苦的，可是，我們相信我們一定要胜利的。”

（选自“群众”，第9卷，第6期，1944年3月25日出版）

1871年巴黎公社司法委员会

法学副博士 A·T·巴热诺夫

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奠基人，在自己的著作中不只一次地強調了巴黎公社在無产階級为摆脱資本主义枷鎖的解放斗争中所起的卓越作用。

虽然巴黎公社存在的時間很短而且斗争条件又十分困难，但是它在打碎旧的資產階級的国家机器和建立新的革命政权机关方面仍然进行了(在頗大程度上是自發进行的)巨大的工作。

司法委员会是巴黎公社所建立的新的革命政权机关之一。它是在1871年3月29日所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同劳动与貿易、外交、財政、保安以及其它几个委员会一起通过选举方式建立起来的〔1〕。

各个委员会的任务是組織对巴黎公社的国家和經濟活动各方面的管理工作。在1871年3月29日的会议上还选举成立了公社的执行委员会，以协调各委员会的工作和监督公社法令的执行。在公社3月30日作出的一项決議中，授与各委员会“……以最广泛的权力……可以采取他們認為维护公社利益所必須的一切措施”〔2〕。

各委员会是革命的政权机关，是为代替已被廢除的“国防”政府(实际上是美国政府)的各部而建立起来的新的部。

巴黎公社的一切措施都遭受到反革命資產階級及其走狗的忘工抵制。这种情况使得公社必須从速采取措施組織新的国家

机关并吸收新的人员(主要从工人中吸收人员)来参加国家政权机关的工作。公社也重新组织了司法机关。在执行这些措施时，司法委员会起了重要作用。无论从司法委员会的任务方面说，或从它实际执行的职能方面说，它实质上就是巴黎公社的司法部。

公社委员右派布朗基分子蒲洛特被任命为司法委员会的代表。我们可以说这就是司法部长〔3〕。

司法委员会有没有组织公社司法机关的某种具体纲领呢？

有些研究公社的历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在谈到司法委员会的活动时，他们只是指出公社在司法组织工作方面所采取的某些措施。例如，阿里贝尔·鸠鲁良写道：“司法委员会建立了审判员选举制并给予被告以充分的辩护权，这样来实行司法改革。它改善了监狱制度，严格地追究一切滥用职权的行为。”〔4〕

另外一些历史学者认为，司法委员会及其代表蒲洛特，从公社的一般原则出发，实行了司法机关的根本改组，建立了本质上是新的司法制度体系。例如，马龙写道：“蒲洛特对法国司法制度进行了彻底改革。”〔5〕

在我们看来，司法委员会的活动，完全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委员会是有一定的公社司法机关组织纲领的。

审判机关活动的各项基本原则貫徹着巴黎公社司法方面的全部政策，这些基本原则是规定得很明确的，虽然在执行上有时候不够坚决和彻底。审判活动的最主要的原则是：审判对任何人一律平等；审判员的选举制及其责任制与撤换制；规定审判员以及其他职员每年最高工资额为六千法郎，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相当于普通工人的工资〔6〕；将执行吏，公证人和其他的司法辅助人员都列为公社的职员；保证受审人有广泛的保障，其中包括辩护自由；审判公开；简化诉讼手续和减低诉讼费用。公社在

“告法国人民書”中，这样規定了自己在审判方面的原則：“組織自己的法院，在个人負責以及公社实行經常監督并有权撤換的条件下，选举或选派公社的司法人員及其他職員”，“絕對保證个人自由”〔7〕。

值得指出的是我們在公社的选民委托書中也看到了与此大致相同的一些原則。例如，第十四区的选举會議給被选出来的公社委員彼里奧尔·杰康納和馬魯切尔的委托書中，就載有以下几項：选举具有被严格規定下来的裁判权的調解法院；民事与商务方面的案件免費訴訟；根据选拔的方式更換一切文職人員；職員的絕對責任制〔8〕。由此可見，就是在审判問題上，巴黎公社，包括它的司法委員會，也是作为工人政府而进行活动的，它細心傾听选举了它的巴黎劳动群众的呼声和关心他們的需要。

上面所列举的审判組織原則的实施，實質上正是意味着粉碎旧的司法机器并在無产階級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司法制度。

巴黎公社交給司法委員會的是哪些任务，而且这些任务实际上又是如何实现的呢？

組織普通法院是司法委員會最重要的任务；当公社会議上發生关于設立某一司法机关的問題或任何其它法院組織問題时，公社总是把這些問題提交司法委員會先行审查，例如，在公社4月1日的會議上，公社委員列菲夫尔提議廢除审判员常任制的原則，这个提議就被提交司法委員會〔9〕；在4月3日的會議上，利果（保安委員會的代表，以后被任命为公社的审查官）提出了建立刑事法院的建議，这个建議也同样提交司法委員會进行审查〔10〕。

后来，司法委員會起草了关于起訴陪审团的条例，这是公社在普通法院組織方面和訴訟手續方面的基本法律。在这个条例中，明显地反映出整个公社和司法委員會在审判机关組織方面

的根本立場。

由公社通过的起訴陪审团条例，大大地扩展了訴訟的民主範圍，这就是从資產階級形式的、不完全的民主，即給予富人的民主轉变到真正的、廣泛的、無產階級的民主。起訴陪审团条例卓越的历史意义就在于此。同时在起訴陪审团条例中，也暴露出巴黎公社的整个政策中所具有的一項主要缺点，这就是崇拜“純粹的民主”，迷恋“最高正义的夢想”。例如，在陪审团条例的序文中規定，民主的司法原則——“审判对任何人都一律平等，陪审員的选举制，辯护自由”，即公社所說的“社会利益与正义的原則”——“不受任何情况的限制”，也就是說不論在那种政治情况下都必須遵守。因此条例就完全沒有規定在对待有关人質案件的报告——凡尔賽的走狗們，即無產階級的公开和秘密的政治敌人时，訴訟保障有縮小的可能。在內战进行的条件下，缺乏上述的規定不仅是不适当的，而且是直接对革命有害的。

公社在对待階級敌人方面表現了它本身所固有的温和与寬大。这种政策在巴黎公社存在的整个时期內沒有改变。对于反革命的白色恐怖，固执地不愿意采取对付手段；对階級敌人鎮压不力，——这是巴黎公社最大的錯誤之一。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經典著作家曾不只一次地指出过这一点。斯大林說：“巴黎公社社員对凡尔賽派太温和了，因此，馬克思当时有充分理由責备他們。”〔11〕

为实现公社关于在选举和更換制的基础上建立新法院的要求，司法委員會进行了調解法院的組織工作。4月18日司法委員會的代表浦洛特，在“政府公报”中公布了一个关于即將举行調解法院和商業法院人員选举的通告〔12〕。以后不久，即在4月22日，由于战争情况不允許于最近时期內組織調解法院的选举，于是司法委員會号召調解法官以及司法輔助人員們恢复工作，但

是要求采用3月18日革命所确定下来的立法方面的新原則〔13〕。在1870年9月革命以后，从第二帝国那里接收下来的旧調解法官們显明的資产階級成分，注定这个号召要失敗的。因此，司法委員會在实行調解法官选举以前便采取了一項临时措施，向执行委員會提出了、后来又向社会拯救委員會提出了替換調解法官的职务的大批候补人員，而这些人員也都被批准了。于是按着这种办法任命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十、第十七和第十八区的調解法官。

司法委員會在組織調解法院方面表現首創精神的同时，革命群众也表現了非常可貴的首創精神，他們認識到在非常的局勢下必須自己來任命調解法官。巴黎公社的偉大成就在于發揮了下層群众建立政权机关的首創精神，或者如馬克思所說的，在于靠人民自己的幫助來管理人民的發展趨勢。群众在組織新的法院以代替官僚資产階級的司法机关方面的活动就是这种过程的一个表現。

我們可以回想一下在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当第一批关于法院的法令还没有公布的时候，在許多地方就已开始廢除旧的仇視人民的司法机关，而按照劳动人民群众自己的倡議建立起新的法院。弗·伊·列宁对这种現象給了很高的評價：“……革命的群众在1917年10月25日以后，就走上了正确的道路，并証明出革命的生命力，他們在尚未頒布解散資产階級官僚司法机关的任何法令以前，就已开始組織自己的，即工农的法庭。”〔14〕由此可見，俄国劳动群众在十月革命以后，广泛而卓有成效地實現了曾被巴黎公社社員所采用过的在当时还处于軟弱和萌芽状态的司法制度的組織办法。

司法委員會也进行了巴黎公社民事法院的組織工作以及它們的干部配备工作。司法委員會徹底执行了建立手續簡單，收費

很少，便利群众的审判和訴訟程序的方針。例如，4月23日巴黎公社通过了浦洛特提出的关于把各种法院的司法执行吏、公証人、鑑定委員和秘書改为領取一定工資的公社職員的法律草案〔15〕。馬克思完全肯定地称贊了公社的这项措施，在“法蘭西內战”一書的初稿中談到巴黎公社帶給法国农民的利益时，馬克思写道：“巴黎公社用靠劳动領取工資而不是靠牺牲农民利益發財致富的公社職員代替了吞食农民大部分收入的寄生的司法机关——司法檢查官，公証人以及其他等等。巴黎公社撕破了束縛法国农民的司法罗網，在这个罗網上棲息着吸吮法国农民的血的資产階級蜘蛛——律師和市長們。”〔16〕

由司法委員會擬訂并于5月12日經社会拯救委員會通过的关于建立民事审判法院的決議中規定：一切案件將按簡化的程序处理，允許双方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进行辯护。

公社把一項最重的任务委托給司法委員會，这就是監督監獄，監督对偵查阶段中的囚犯的給养，監督一切逮捕的执行是否合法。公社采取了許多措施保證公社的公務人員严格执行調整逮捕和搜查程序的法令。例如，执行委員會在4月7日就曾根據公社4月5日关于审查国民近衛軍中央委員會和社会拯救委員會所执行的一切逮捕案件的命令，公布了一項決議，“……建議司法委員會迅速提出关于这些逮捕案件的数目和性質的报告并迅速命令釋放被捕者或將被捕者交起訴陪审法院处理。司法委員會必須特別注意这一直接关連到共和国最重要的原則之一——自由——的事情”〔17〕。

为了維護人身权和保障防止濫用职权的行为，公社还頒布了一个关于逮捕手續的法令。在这个法令中确切地規定什么人具有逮捕权和进行逮捕时必须遵守的訴訟形式〔18〕。在这一法令的基础上浦洛特于4月18日起草了一个十分詳細的关于逮捕記錄

編制办法的訓令。这个訓令虽然是由他自己签署的，但是以公社的名义作为一个決議公布在“政府公报”上面〔19〕。

由此可見，司法委员会以及整个公社，一貫力求在进行逮捕时遵守法定的訴訟形式，以便保証逮捕是有根据的和正确的，并要求有关的公职人員遵守这项規定。馬克思特別指出过公社在保障人身不受侵犯方面采取的措施，他說：“在3月18日革命之后，所有的政治犯立刻都被釋放。因为巴黎公社了解，在路易·波拿巴和他的合格的后繼者国防政府时代，很多人毫無罪名地被作为政治嫌疑犯投入監獄。因此，公社委托自己的委員之一，即浦洛特，进行适当地审理，他釋放了一百五十人。”〔20〕

公社在制止非法逮捕和这一切濫用职权的行为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在某种程度上类似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新政权机关，特别是彼得堡軍事委员会和司法人民委员会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將巴黎公社旨在保障人身不受侵犯权利的各項法案和十月革命后苏維埃国家立即頒布的类型法案相比較，应该再一次地作出这样的結論：只有無产階級專政才有真正維護公民的合法权利与利益的真正法制。

必須指出，整个委员会以及委员会的一些委員也执行偵查职能，甚至执行审判职能。但是司法委员会及其偵查机关，对一般犯罪偵查，特别是对反革命犯罪案件的偵查工作，却是組織得很差。由于缺乏行动計劃，目的性不够，注意力集中在不关紧要的一些刑事案件上面，因此，就使暗藏的与公开的革命敌人的破坏活动一直沒有被司法委员会所察覺。

司法委员会除了这些基本职能以外，还担负許多重大职责，例如监督执行公社关于国家与教会分离的法令，而且也管理外国人的入籍案件。几种职能的如此結合，确切一些說，几种职能的如此混合的現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是由于巴黎公社存在

的时间很短，总共才有七十二天，而且它的主要力量是用在組織軍事防衛，抵抗資產階級世界——凡尔賽政府和普魯士人——的聯合力量。在这样的条件下，巴黎公社不能够建立（它既沒有充分的时间，也沒有必要的經驗）具有确切規定的职权範圍，排除機構重复或不同职能結合在同一机关的現象的廣義的国家管理机关。

总结：

一、司法委员会在建立巴黎公社的普通法院方面，进行了十分积极和多方面的活动。

二、司法委员会是由两个政治派别——布朗基派和蒲魯东派——的成員組成的。他們都不是馬克思主义者。因此也就沒有正确的爭取工人階級解放的斗争綱領。但是，由于当时既成的情勢，正如列寧指出的，“工人階級革命的本能違反錯誤的理論而爆發出来”〔21〕，因此，委员会在自己的活动中实行了旨在消灭旧的剝削者的司法机关并在無产階級广泛民主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审判机关的革命的措施。馬克思指出了公社在粉碎資產階級所虛構的使統治階級能够掩盖审判机关压迫本質的法官獨立原則方面所采取的措施的重大意义。

三、司法委员会建立了严格的革命法制，亟力教育群众尊重公社所頒布的法令和決議，要求所有的人，首先是公社的公职人員和国民衛軍遵守这些法令和決議。

四、然而，在司法委员会活动中，也有許多重大的缺点，有的是一般原則性的，有的是實踐性的，其中必須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不了解社会發展的客觀規律。司法委员会以至整个公社，显然过低估計了在与階級敌人作斗争中鎮压的作用，而这种鎮压首先是通过剝夺資本主义私有财产的办法（如众所周知，公社毫未触动法蘭西銀行。因此，恩格斯批評了公社）。

第二、司法委员会对說服、道德影响因素的意义过分夸大，司法委员会遵循公社的总的政策，沒有对反革命分子毅然采取鎮压对策。

第三、司法委员会在执行已經通过的決議和法令方面，組織工作做得不够。因此，它的措施实现得緩慢和不徹底。

这些缺点的發生，首先是由于巴黎公社沒有以先进理論武裝起来的能够实现对所有国家机关的活动进行领导的統一的革命政党。

缺少工人階級統一的革命政党，不仅是巴黎公社在其生活和活动一切領域中，其中也包括司法領域中政治上和实践上各項錯誤的原因，而且也是巴黎公社灭亡的主要原因，因为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們說：“……若沒有这样一个不受机会主义沾染，对妥協者和投降主义者取毫不調和态度，对資產階級及其国家政权持革命态度的無产階級革命政党，無产階級革命的胜利，無产階級專政的胜利便是不可能的。”〔9〕

〔1〕“巴黎公社議事記錄”，党出版社1933年莫斯科版，第21頁。

〔2〕同上，第28頁。

〔3〕同上，第158頁。

〔4〕阿里貝爾·哈魯良：“1871年巴黎公社”，1919年彼得格勒版，第49頁。參閱：里沙卡尔：“1871年公社的历史”，聖彼得堡版，第194、156—198頁；阿里突爾·阿爾奴：“巴黎公社的人民的歷史”，1919年彼得格勒版，第156頁。

〔5〕B·馬龍：“法國無產階級的第三次失敗”，1871年Neuchâtel版，第173頁。

〔6〕參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第1卷，蘇聯外國文書出版社1954年中文版，第463頁。

〔7〕“巴黎公社議事記錄”，党出版社1933年莫斯科版，第374頁。

〔8〕G·A·多邦：“公社的社會基礎”，1873年巴黎版，第59—60頁。

〔9〕“巴黎公社議事記錄”，党出版社1933年莫斯科版，第41頁。

〔10〕同上，第50頁。

- [11] “斯大林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01頁。
- [12] “政府公报”(巴黎公社机关报)，第301頁(4月18日)。
- [13] “政府公报”，第372頁(4月25日)。
- [14] “列宁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96頁。
- [15] “巴黎公社議事记录”，党出版社1933年莫斯科版，第213頁。
- [16] “馬克思与恩格斯文庫”，党出版社1934年版，第3卷(8卷本)，第337頁。
- [17] A. H. 馬洛克：“1871年巴黎公社的文件与材料(选集)”，国立政治書籍出版社1925年莫斯科版，第361頁。
- [18] “政府公报”，第272頁(4月14日)。
- [19] 同上，第312頁(4月19日)。
- [20] “馬克思与恩格斯文庫”，党出版社1934年版，第3卷(8卷本)，第307頁。
- [21]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8卷，第181頁。
- [22]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簡明教程”，参看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468頁。

(林陽譯，沈其昌校。原載“苏維埃国家和法”杂志，1955年第2期)

“法蘭西內战”

馬克思的天才著作，在这部著作中在深刻分析和总结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的基础上，发展了关于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这个著作于1871年6月在伦敦由总委员会委员签字用英文出版，标题是“法蘭西內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法蘭西內战”是由馬克思根据对巴黎公社社员英勇斗争的新鲜印象写成的。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具体事件，说明了公社的世界历史意义，公社标志着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发展中的新的阶段。列宁指出，馬克思“……不仅因公社社员们显出如他所說的‘冲天’的英勇精神而表示欢愉。虽然这次群众革命运动没有达到目的，可是他在其中看见有极重大意义的历史经验，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一个相当进步……”^①

“法蘭西內战”共分四章：第一章说明了国际政府（1870年9月4日——1871年5月），如馬克思所說的，国防政府一产生起就变成为对法国人民执行叛卖政策的叛国政府；第二章說到了公社的产生及由凡尔赛政府挑起的內战的开始；第三章说明了公社及其活动的意义；第四章说明了公社英勇失败的历史，揭穿了“统治阶级为了在外国侵略者庇护下发动內战镇压革命而进行的陰謀……”^②。馬克思的著作充滿了对凡尔赛刽子手，对叛国

^① “列宁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91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1卷，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局1954年中文版，第519—520頁。

政府的深刻痛恨。馬克思指出，法國資產階級把自己自私的階級利益擺得高于民族利益，与自己不久以前的敵人——普魯士政府結成聯盟，以共同窺殺法國無產階級的起義。馬克思指出，只有工人階級才是真正愛國主義的唯一代表者。“這樣，既然公社是法國社會中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亦即真正民族的政府，那末，由於它同時又是工人的政府，爭取勞動解放的勇敢戰士，它就是十足國際性的。”^①

“法蘭西內戰”是馬克思關於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的發展中的一個新階段。公社光輝地証實了馬克思早在1852年提出的思想：必須打破舊的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②。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得出了結論，代替被打破了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式應當是巴黎公社類型的國家。

馬克思指出，公社是新型國家——無產階級專政的雛型。“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於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對占有者階級進行鬥爭的結果，是終究發現了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③。公社所採取的措施是在官職人員由選舉產生，可以更換和對人民負責的基礎上建立新國家機器的第一次嘗試；公社消滅了資產階級國家物質權力的工具——警察和軍隊，而代之以全民武裝。如馬克思指出的，公社的社會經濟措施是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而執行的，目的在於摧毀資產階級的經濟命脈。

馬克思還揭明了公社的弱點和錯誤，這些弱點和錯誤是公社失敗的原因之一。公社沒有建成和農民的鞏固聯繫，採取了防

① 同上，第505頁。

② 參看同上書，第309, 496頁。

③ 同上，第501頁。

守的策略，对凡尔赛派过于温和，沒有將銀行收归国有等等。馬克思說明公社是新型国家时，在自己的著作中致命地批判了資產階級国会制度，指出不仅在第二帝国类型的波拿巴王朝中，而且在資產階級共和国中，普选权都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一次解决統治階級中哪一个人应在国会里代表人民和鎮压人民……”^①。但是，如列宁指出的，馬克思同时認為無产階級政党应当利用“甚至資產階級国会，尤其是在显然沒有革命形勢的时候……”^②。1907年列宁在給馬克思致庫格曼書信的俄文譯本写的序言中对“法蘭西內战”作了很高的評价，認為这本著作是工人階級在爭取解放的斗争中最好的指南，是無产階級階級敌人的最可怕的武器。

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的新历史条件下丰富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和無产階級專政的學說，并把这个學說提到了新的更高的阶段。他建立了新的完备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論，关于社会主义可能在單独一个資本主义国家中取得胜利的學說。列宁根据兩次俄国革命的經驗，發現了苏維埃政权是無产階級專政(其萌芽是巴黎公社)最好的历史形式。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的學說在斯大林(列宁事業的天才繼承者)的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發展。根据苏維埃国家發展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設的丰富經驗，斯大林建立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設时期無产階級專政的职能和任务的新學說，并論証了在共产主义制度也必須保存国家，“……假如那时資本主义包圍尚未消灭，而外来的武裝侵犯危險尚未鏟除的話”^③。

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战”發行了許多版。在馬克思写这本书

① 同上，第500頁。

② “列宁全集”，俄文版，第25卷，第394頁。

③ 斯大林：“列宁主义問題”，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70頁。

的那年(1871年)就在日内瓦出版俄文版(秘密的民粹派团体的版本)。1891年在柏林出版了有恩格斯写的导言的纪念20年的德文本,恩格斯的导言被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导歪曲了。1905年出版了由列宁编辑的“法蘭西内战”的俄文译本(敖德薩“海燕”出版社)。“法蘭西内战”载“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2部(1949年);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的最新版本载“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1卷(1949年)。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前,在俄国共出版了13版。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截至1950年年中为止,在苏联用俄文、苏联各民族文字及外文出版了44版,总印数1,434,000本。在苏联国外,这个著作用英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丹麦文、荷蘭文、挪威文、芬蘭文、瑞典文出版了72版。第一个德文版于1871年用恩格斯的譯文出版。在人民民主国家中出版了14版。

(黃良平譯自“苏联大百科全书”,第2版,第12卷)